出 版 说 明

《罗马尼亚近现代史》是苏联弗·恩·维诺格拉多夫、恩·伊·列别杰夫、叶·德·卡尔佩辛科、阿·阿·亚齐科娃四人合著的，于1964年由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维诺格拉多夫还著有《罗马尼亚1907年的农民起义》、《俄国和多瑙河诸公国的统一》等书；列别杰夫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马尼亚》、《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罗马尼亚》等书。

本书主要叙述罗马尼亚自1848—1849年革命起直到1963年的历史，对1848年以前的罗马尼亚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到土耳其人入侵），作者在第一章中作了极为简略的概述。作者在本书中着重叙述了1848年以后土耳其帝国的黑暗统治和罗马尼亚人民反抗外族侵略和统治、争取国家统一和独立、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斗争。1878年罗马尼亚取得独立之后，以国王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统治着这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罗马尼亚站在协约国一边同德奥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保皇法西斯分子使罗马尼亚成为希特勒德国的附庸，参加了法西斯战争。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的斗争，于1944年8月23日举行武装起义，赶走德寇，推翻法西斯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作者对新罗马尼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进行的斗争和取得的成就作了比较系统的叙述。

必须指出，在罗马尼亚近代史上，沙皇俄国曾不断地对它进行侵略和掠夺。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就在他的未发表的文稿《关于罗马尼亚人的札记》中谴责沙俄帝国通过和土耳其做的一笔交易在1812年控制了比萨拉比亚①。沙俄也是镇压罗马尼亚1848年革命的刽子手。齐奥塞斯库同志指出："外国的干涉是致使蒙特尼亚（即瓦拉几亚——译者）以及罗马尼亚其他地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国内反动派害怕革命取得成功，便求助于外国反革命力量的支持。对罗马尼亚各公国分别实行统治的两列强——奥斯曼帝国和沙

---

① 参见马克思：《关于罗马尼亚人的札记》，罗马尼亚科学院出版，1964年12月。

皇俄国——这时便勾结起来镇压蒙特尼亚的革命。”①

但是，作者在叙述罗马尼亚近现代的历史中，竭力隐讳沙俄帝国对罗马尼亚的侵略罪行并为其辩护，极力鼓吹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和修正主义。如作者对沙俄帝国侵占比萨拉比亚（今苏联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全境和敖德萨州的几个区）、镇压瓦拉几亚和罗马尼亚其他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的罪行讳莫如深，竭力回避史实，为老沙皇涂脂抹粉，把沙俄帝国描绘成为是与奥斯曼帝国和西欧列强对立的、是帮助和保护罗马尼亚的邻邦。在叙述罗马尼亚的成就时，恣意宣扬苏联的作用。

本书材料比较丰富，对了解和研究罗马尼亚近现代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此翻译出版。

1974年8月

① «1973年6月16日齐奥塞斯库同志在布加勒斯特八万群众隆重举行纪念罗马尼亚1848年革命和1948年工业国有化的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73年6月18日。

目　录

序　　言

5

同我国友好的社会主义强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广阔土地，展现在苏联西南边界近旁。罗马尼亚得天独厚。在从多瑙河向北伸展的丘陵和平原上，到处是美丽的耕地、牧场、菜园和葡萄园。喀尔巴阡山脉耸立在罗马尼亚的中部和北部，山上长着茂密的森林，它自古以来就是罗马尼亚最重要的财富之一。喀尔巴阡山矿藏丰富，有煤、铁、锰、有色金属和贵重金属。喀尔巴阡山脉碧绿的峰峦环抱着一个高原——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南部蕴藏着最丰富的乌金——石油。就其开采量来说，早在几十年以前罗马尼亚就已占欧洲第二位。罗马尼亚南部边界是蓝色的多瑙河，关于这条河流传着许多传说和故事，很多多依纳①歌曲为她而歌唱。

---

① 多依纳——罗文直意为抒情民歌，人民借这种歌曲形式抒发自己的怀念、痛苦、爱情等。——译者

罗马尼亚人民的近现代史，是一部连绵不断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编年史。1848 年革命，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主义势力同在封建制度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势力之间最大的一次搏斗。这个年代通常作为罗马尼亚历史上近代时期即资本主义时期的开端。

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把资产阶级及其掘墓人——工人阶级推上了历史舞台。伟大的十月革命唤醒了全世界的——其中包括罗马尼亚的——强大的革命力量。从这时起，罗马尼亚劳动人民久经考验的领袖——共产党便领导他们去进行斗争，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反对反动派和军事冒险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被它的法西斯头目拉进了反苏战争，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这时苏联及其强大的军队前来援助罗马尼亚人民以及欧洲其它许多国家的人民。这样一来就为实行最深刻的革命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那时起二十年已过去了。在这些年代里，在罗马尼亚的土地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罗马尼亚人民实现了他们祖先千百年的宿愿，赶走了压

迫者并着手建设新生活。许多新工厂的烟囱冒着浓烟。成千上万台联合收割机和拖拉机奔驰在集体的土地上。剥削制度的遗产——文盲和文化落后状态消灭了。罗马尼亚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切成就，就是因为它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同苏联并肩战斗、共同工作的结果，苏联人民多少世纪以来就同罗马尼亚各族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联系。

6

*　　*　　*

苏联史学家第一次向读者提供一本罗马尼亚近、现代简明史。

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够出版，是由于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历史科学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和著有成效的结果。

罗马尼亚真正的历史，即人民群众的、战士的、创造者的历史，只是在人民政权建立之后才开始研究。在旧罗马尼亚，有关农民起义和工人革命斗争的文献被视为绝密，严加封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要做细致而耐心的工作，才能揭开和公布那些阐明人民群众革命运动最重要阶段的档案材料。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公布了很多文献，阐

明罗马尼亚共产党人的光辉历程，工人运动史，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1821年起义，1848—1849年革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统一，1877—1878年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罗马尼亚人民同俄国联盟并在它的援助下争得了民族独立），1888年和1907年的农民起义。档案材料在加紧进行研究。发表了一些阐明罗马尼亚近、现代史上关键问题的专著和文章。1955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向学者们提出一项任务——编写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罗马尼亚通史，这项任务现在正在顺利地完成着。

关于罗马尼亚近、现代史，首先是它的人民民主时期的历史，苏联出版了几本书并发表了许多文章。苏联的研究人员除了利用罗马尼亚的档案材料和文献资料以外，还广泛研究我国拥有的有关罗马尼亚史、俄罗关系史和苏罗关系史方面的大量档案材料。

已经完成的工作使我们有可能在苏联着手编写罗马尼亚通史著作。我们提供的这本简史就是在这方面的第一个尝试。作者们考虑到它的篇幅不大，因而不可能把罗马尼亚史的各个方面都包

括进去。书中就缺少文化史的章节。

作者们对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研究所参加讨论本书手稿的研究人员表示感谢。借此机会，作者们对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附属党史研究所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们在布加勒斯特讨论这本书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7

第一章 1848—1849年革命

居住在富饶肥沃的罗马尼亚土地上的人民的历史，发祥于远古时期。在今天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领土上，最早有关人类生存的可靠遗迹属旧石器时代后期（约在十万年前）。在新石器时代，原始人村落遗址已遍及全国各地。公元前二千年开始的时候，许多游牧部落从东北部进入多瑙河流域。由于他们和当地居民混合的结果，便出现了达契亚—杰蒂人，即现在罗马尼亚人和巴尔干其它某些民族的祖先。勤劳而和平的达契亚—杰蒂部落，多次遭受外族统治的折磨和侵略者的侵袭。

在罗马，直到今天还保存着炫耀图拉真① 皇帝形象的古代石柱。刻满柱上的浮雕叙述着罗马

① 图拉真(Trajan or Marcus Ulpius Traianus, 公元 52—117 年)，罗马皇帝，公元 98 年即位，曾两次(公元 101—102 年，105—106 年)侵略并打败达契亚，多次侵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译者

军人征服遥远的多瑙河北岸国家达契亚的故事：穿盔甲的罗马军人正在横渡多瑙河，包围着达契亚人的主要要塞萨尔米塞热图扎，身材魁梧、满脸胡须的人们跪在地下，站在他们身边的是举着剑的罗马军团的士兵。这是达契亚领袖德凯巴鲁斯的被俘战士。图拉真进行了两次战争，才于公元106年在达契亚人的土地上建立了罗马的一个省。对这样一次大捷，罗马庆祝了123天。

多少年代过去了。可怕的侵略者定居下来，同当地居民混合在一起，变成和平的农民和牧民。公元274年，当时已陷入严重危机的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士兵渡过多瑙河回国去了。“民族大迁徙”的时代到来了。分散在以前的罗马的一个省达契亚土地上的稀稀落落的农村公社，已不能顽强地抵抗侵略者。哥特人、阿瓦尔人、朗哥巴尔德人、斯拉夫人、布加尔人、匈奴人、贝琴涅戈人、库曼人、鞑靼人都通过了罗马尼亚的土地。其中斯拉夫人部落留下的痕迹最深。在大迁徙的过程中，斯拉夫人向南部即向多瑙河右岸迁移，在六世纪下半叶和七世纪里，他们分散到今天的罗马尼亚境内各地，部分人定居在那里，同当地的达契

亚—罗马居民混合在一起，以斯拉夫人的素质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和语言。

罗马尼亚民族的形成、最早几个公国和省的建立(十世纪)，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个过程在十四世纪由于两个独立的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建立而完成了。特兰西瓦尼亚省在这以前就从属于匈牙利王国，在这个省里除了达契亚—杰蒂人以外还住着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

十四世纪，巴尔干遭到土耳其人侵略。在科索沃平原一次可怕的大血战(1389 年)以后，塞尔维亚人落入苏丹的统治之下。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保加利亚人头上。1394 年，瓦拉几亚大公老米尔恰的军队同巴雅集德苏丹的军团进行了第一次激战，结果瓦拉几亚人胜利了。米尔恰同土耳其人打了三十年仗，但因得不到欧洲其他君主的支持，终于同意向苏丹缴纳沉重的贡税。摩尔多瓦反对土耳其奴役者的斗争更加顽强。摩尔多瓦大公伟大的斯特凡(1457—1504 年)领导这一斗争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在浴血的战斗中多次击溃土耳其人。但是他也被迫承认自己是苏丹的进

贡者。

在残酷的莫哈奇战役(1526年)之后，匈牙利王国不复存在了。它的首都布达变成了土耳其巴夏辖区[1]的中心。从匈牙利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特兰西瓦尼亚变成了自治公国(1542年)，但必须向奥斯曼帝国进贡。

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居民多次起来反对外族压迫者。十六世纪几乎是在不停的战争中度过的。在这一斗争中，瓦拉几亚的督军勇士米哈伊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在卡卢加雷尼战役(1595年)中他击溃了土耳其军队，1600年他在一个短时期里曾把三个公国都统一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然而，封建内讧很快地使这些胜利化为乌有。农民以前曾是公国军队的骨干，他们遭受奴役之后就破坏了公国的军事力量。这一切使土耳其政府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统治加强了。至于特兰西瓦尼亚，这个地区在土耳其人同奥地利、俄罗斯、波兰、威尼斯的战争失败之后，根据1699年的

① 巴夏辖区(пашалык)—旧土耳其、埃及的行政区域，相当于省。——译者

卡尔洛维茨[1]和约，它和匈牙利一起并入了奥地利帝国的版图。

*　　　*　　　*

9　土耳其在多瑙河各公国的统治有其显著的特点。这些公国没有被划分成巴夏辖区，它们仍然保持着当地的大公和行政机构。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奥斯曼统治的性质和这种统治对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生活的有害影响。在这里也和在其它地方一样，这种统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维护了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妨碍了自然资源的利用。

在所谓法纳尔分子统治时期（从十八世纪初延续到1821年），情况特别严重。在1711年彼得一世的普鲁特远征期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居民支援了俄军；为了对这种支援进行惩罚，苏丹决定让居住在伊斯坦布尔法纳尔街区的希腊富豪登上雅西（摩尔多瓦）和布加勒斯特（瓦拉几亚）的大公宝座。法纳尔分子是靠贿赂、玩弄阴谋和拍马屁而登上大公宝座的，因此他们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召回、被流放、甚至被处以死刑，因而他

① 卡尔洛维茨在南斯拉夫境内，是塞尔维亚的一个小城市，现在叫卡尔洛瓦茨。——译者

们便把所占的职位首先当作自己和左右亲信发财致富的源泉。掠夺被提高到国家政策的地位。居民除了缴纳沉重的贡税以外，还要给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要塞提供粮食和建筑材料。奥斯曼政府把公国对外贸易的垄断权攫为己有，这样就破坏了它们同欧洲贸易关系的自然发展。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不铸造自己的货币。它们没有军队，而大公掌握的外国雇佣军是用来镇压人民的，以防他们的不满情绪的爆发。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先后爆发的几次革命震撼了欧洲。人民起义反对暴君。而在受土耳其枷锁束缚的罗马尼亚的土地上，中世纪严酷的黑暗势力仍然统治着一切。农民遭受封建大贵族的奴役。城市很不发达，国内市场狭窄，而公国同国外市场则断绝了联系。因此，罗马尼亚平原上的无边的草原，只是稀疏地有一些种着小麦和玉米的耕地。除盐以外，有益的矿产都没有开采，因为怕土耳其人征收附加税。工业只限于手工业作坊和少数的手工工场，而资本则主要用来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土耳其要塞的驻军是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严重的封建停滞状态的军事保障。

革命前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

然而，即使在多瑙河公国不满现存制度的力量也成熟起来了，如果可以用"制度"这个词来称呼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一系列行政的、司法的和财政的专横行为的话。许多熟悉西欧情况的小贵族，是了解遭受封建锁链束缚并同西欧隔绝的自己祖国的农业落后性和缺陷的。商人不满国内市场狭窄和同国外市场失去联系的现象，因为同外国的贸易主要是用走私方式进行的。捐税负担沉重和由于当局毫无限制的任意横行而深受其苦的手工业者怨声载道。作为这时革命主力的农民，由于贵族的贪得无厌、土耳其人的压榨和国家苛捐杂税的重压而受苦最深。

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瓦拉几亚1821年起义，是不满情绪的强有力的爆发，它既反对土耳其人的统治，也反对国内一小撮有势力的封建主的横行霸道。起义被土耳其大兵以空前残酷的手段镇压下去了。但苏丹还是被迫撤去了占据布加勒斯特和雅西大公宝座的法纳尔分子，

任命当地贵族的代表担任他们的职务。

公国的“安宁”为时不久。1828年俄国同土耳其又一次爆发了战争，它对罗马尼亚人民以后的全部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巴尔干半岛的发展中，俄国起了特殊的作用。尽管沙皇政府抱着侵略的目的，但二百年间几乎没有停过的俄土战争，对欧洲这个多民族的角落的各族人民具有肯定的后果。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强大势力一步一步地遭到破坏，从而动摇了土耳其在巴尔干的统治。

结束了1768—1774年战争的库楚克—开纳琪①和约，在土耳其统治体系上打开了最初一些还不大的裂缝。苏丹答应不再频繁地更换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大公，停止任意征税，禁止土耳其人在多瑙河左岸（罗马尼亚一边）定居；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有权在奥斯曼政府面前为两公国说话。

1829年的阿德里安堡和约②，对于摩尔多瓦

① 库楚克—开纳琪是保加利亚境内多布罗加地区的一个村庄。——译者

② 阿德里安堡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现名埃迪尔内。——译者

和瓦拉几亚来说在这方面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和约载称:“上述公国享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完全的安全,人民将独立自主的治理国家,拥有不受阻碍的贸易权。”奥斯曼帝国政府放弃任意征收粮食和建筑材料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得到一定数目的金钱。土耳其的要塞应予拆除,土耳其驻军防守的城市归还当地行政机关管理。公国有权拥有本国的武装力量。苏丹政府放弃它对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公国可以进入欧洲市场,而这对两者来说都是互相需要的。

11 俄国军队驻扎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达六年之久(1828—1834年),彼得堡任命的专员行使最高权力。起初担任这个职务的是不很称职的帕连伯爵和热耳土欣将军。但后来领导公国的是帕·迪·基谢列夫伯爵,他是一位有名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公国建立了本国的军队,稍稍整顿了司法制度,规定了警察的薪水(以前警察全靠掠夺居民为生),安排了邮政工作。以前任意处理国库钱财的大公,规定由王室费供养,取消了国内的关税,城市里建立了自治机关和商务法庭。甚至还宣布了

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原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基谢列夫还战胜了传染病霍乱，为了消除霍乱病他调来了医疗队，成立了检疫所。

所有这些改革的施行，在关于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国家体制的专门文件中，即所谓"组织法"(1831和1832年)中都有明文规定。

这些文件同前此在公国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比较，在一定意义上算是前进了一步，因为以前的制度可以说是一种任意专横制度，即地主的、行政的、司法的和警察的任意专横。正因为如此，所以商人和那些卷入商品经济的地主起初都欢迎这些文件。

在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起义和触动了土耳其人在罗马尼亚公国统治基础的阿德里安堡和约之后，以前的封建停滞状态结束了。城市开始兴起；商业和手工业人口不断增加；在法纳尔分子统治时期消失了的本国武装力量又恢复了；国内贸易活跃起来。国外市场扩大了，优良的多瑙河小麦又出现在西欧粮食交易所里：和约中有一条规定废除以前土耳其对公国对外贸易的垄断权。仅仅在三年之中(1831—1833年)，出口就从

2,560万列伊增加到4,340万列伊。港口城市加拉茨、布勒伊拉迅速建设起来。马克思指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贸易“发展得非常迅速，开始与俄国竞争”。①

在两公国里，多少世纪没有触动的作为牧场的土地开始耕种起来。例如，在摩尔多瓦，种植小麦、黑麦和玉米的土地在三十至五十年代增加了两倍以上。然而，经济高涨并没有使农民的命运有什么改善。相反的，需求的增长却激起贵族更加加强了对农民的农奴制剥削。

沙皇政府出于自己的阶级本性，在两公国里依靠最落后的顽固反动的封建势力，即依靠最大的贵族农奴主。

12 组织法把全部政权都保留在“大贵族”手中，他们完全不适于经营高产的、以自由的雇佣劳动耕种土地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去购置耕畜、农具和修建房屋，还需要有自由的劳动力。并且，耕地面积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7页。(作者在这里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为："……**发展得非常迅速，开始在俄国一向据有的几个生产部门中与俄国竞争**"，作者将“**在俄国一向据有的几个生产部门中**”删去。——译者)

越大，为使农业转入资本主义轨道所必需的费用就越高，因而这个过程就更加复杂和困难。所以，列宁指出，农奴制大土地占有制是“奴役性小农业的支柱，决不是大生产的支柱”。①

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大贵族的大地产是田连阡陌，占地几千和几万公顷。很容易想象，要保证用自己的耕畜和农具来耕种这些土地，那需要多少资金啊！因此，大土地占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严重障碍。

最后，资本主义生产需要有一些惯于从事雇佣劳动的人们，“需要把农业组织得象其他各种工商企业一样，而不是象老爷们的家务那样”。②

由于寄生生活而腐化了的“大贵族”，在最粗放地经营农业的情况下也得到巨额收入，并且在国家机关中还占有很多高薪厚禄而清闲的职位，所以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而且他们也很少有“余”钱。

罗马尼亚的贵族刮去大胡子，脱去祖传的旧式长衫，摘下大得几乎进不去轿式马车门的皮帽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0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61页。

子，开始研究欧洲“社会”的风俗习惯，兴高采烈地醉心于新的生活。在城市里，在古老的木房子的地基上建筑起漂亮的独家住宅；在农村地区，精致的别墅耸立起来代替比较朴素的房屋。贵族的住宅里空前的奢侈豪华。一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家具、地毯、镜子、轿式马车、糊墙的花纸、妇女的服装。打牌之风盛极一时。到西欧各国首都去旅行和到舒适的疗养地去休养已经习以为常了。

而作为事物的反面的是地主们债台高筑。十九世纪中叶，他们的私债和不动产抵押贷款高达四亿六千五百万列伊。因此，贵族们不敢自作聪明，而宁愿对农民采取旧的农奴制的剥削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组织法”中载明贵族试图转入商品生产的轨道，而不放弃古老的经营农业和压迫农民的方法。农民使用的土地数量同十九世纪初期比较，削减了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三①，而贵族的耕地则扩大了。为了保证贵族耕地的劳动力，徭役增加了。

① 1805年，摩尔多瓦农民的份地是7.9公顷到19.3公顷不等（取决于农民拥有牲畜的数量多少）；根据组织法规定，农民份地是3.4到7.68公顷。

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多瑙河各公国的土地关系以后得出一个结论：徭役在这里实际上是没有限额的。他公正地把“组织法”称为“徭役劳动法典”①。

但是，在两公国里，不满一小撮大封建主（在瓦拉几亚他们总共是70家，在摩尔多瓦不到300家）主宰一切的力量在逐年增长。

在农村里，农民发生了分化。他们当中分化出富裕的上层，拥有余粮并卷入商品关系中。封建羁绊妨碍这些发财致富的农民把土地变为私产，阻碍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手工业生产发展起来了：三十年代建立了约3,000个企业，四十年代建立了2,000个以上。这些企业中大多数都是不大的作坊，酿酒场，半手工业的锯木场和榨油场。但在两公国里也有较大的工厂——呢绒厂、煤矿、盐井、造纸厂和硬脂厂、砖瓦厂、农具制造厂。在雅西，在革命前夕的1847年，一台蒸气磨面机开始生产，用一家报纸的话说，它对当时的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诚然，利用蒸汽力量的大企业还是极少的，人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9页。

们把这种大企业看作海外奇观。稍迟一些时候，1850年在布加勒斯特发生的一个故事在这方面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叫做阿桑的人，从国外运进一些机器装备，建成了一台大磨面机。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了这个事业的时候，发现没有人到他那里去定货：迷信的面包师无论如何也不愿在"魔鬼的"冒火的机器上磨面。老天爷搭救了阿桑：冬季严寒，水磨的轮子不转了，因此面包师们不管愿意或不愿意都只好去找阿桑了。

总的说来，工业中还是手工业者占统治地位；工场手工业还不发达，机器生产刚刚开始。独立自主的雇主和小业主的人数比雇佣工人的人数还要多几倍。①

资产阶级最坚决的一翼——工业家——在多瑙河两公国里是最弱的。在资产阶级当中，同大土地所有者联系在一起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代表人物占优势。无论就两公国来说还是以后就统一的罗马尼亚来说，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是很典型的。差不多每一个大资产者同时

① 关于四十年代的数字很分散，也不确切。1859—1860年两公国约有6万手工业者和23,200雇佣工人。

又是土地所有者，我们这样说大概是不错的。资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是出身于地主的，而发了大 14 财的资本家又赶快购买地产。美国教授戴维·米特兰尼在论述罗马尼亚的土地关系时，认为这是罗马尼亚人对土地的“祖传的愿望”。而事实上其所以如此，原因简单得多，而且更多地是为了追求实利，因为即使在半封建剥削的情况下，土地也提供大量的收入，所以资本家乐意向土地投资，更不用说拥有庄园能满足暴发户的虚荣心，使他们能够取得仅仅有钱还不能得到的那种“社会”声望了。

地主和资本家这样的“结合”无疑地缓和了他们之间所产生的矛盾。最后，还应当考虑到，罗马尼亚的资本家登上历史舞台是很晚的，这时他们的西欧同行已经历了同无产阶级进行冲突的锻炼，而在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他们是不反对依靠君主政体和地主土地所有制这样一些封建时代的残余的。

常到西欧去旅行，注意了解那里发生的事件，使罗马尼亚资产者能够吸收他们在先进国家的同行们所积累的经验。因此，罗马尼亚资产阶级的

编年史没显出什么英雄的革命功勋；相反的，它的每一页上几乎都记载着争取妥协的尝试。

在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就是同不满大封建主在两公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主宰一切的自由贵族一起行动的。

罗马尼亚的贵族十分之九属于中小贵族。他们的地位同“大贵族”的地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生产方式来说他们仍然是封建主，因为他们土地的耕种方法也和大地产所有者一样。但是，有限的占地面积也决定了相当微薄的收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认为，农奴制剥削在经济上是不利的。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阿·格·戈列斯库—阿拉皮列写道：“各地经验证明，自由劳动的生产率比强制劳动高，”为了确定这一点，他引用了统计材料，结果证明法国的谷物收获量比摩尔多瓦高一倍，英国的高两倍，虽然这两个国家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同多瑙河公国的条件都不能比拟。

这一部分地主对“大贵族”的统治抱着仇视的态度，因为后者力求维护封建关系，把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行政、财政、警察和司法制度弄到彻底崩溃的地步。这一部分地主痛苦地感到缺乏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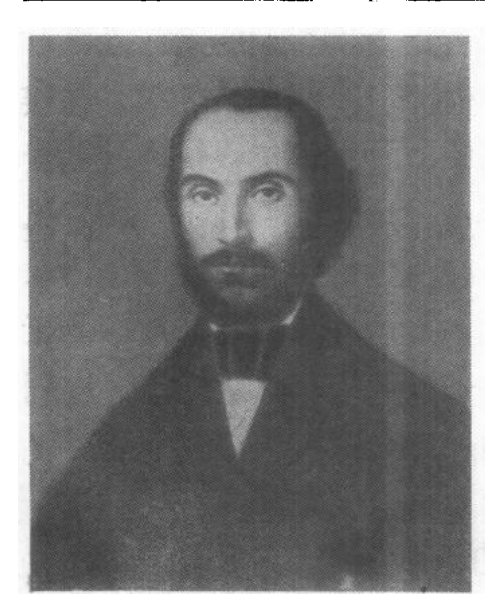
一的货币制度①和银行信贷，普遍的贪污受贿和盗窃国家资财，道路坏得可怕，因此他们很容易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自由地主很快地就同资产阶级找到了共同语言。尽管他们在态度和意见[15]方面有各种细微的分歧，他们联盟的基础是力求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让人民群众通过革命反映出自己的要求。这一派的领导人之一伊·埃利亚代一勒杜列斯库用一句名言反映了这种情绪："我仇恨暴政，但害怕无政府状态！"

同自由资产阶级的妥协派（实质上是向地主低头的投降派）相对立的，是代表人民下层、首先是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民主派②。它的主要代表是尼古拉·伯尔切斯库(1819—1852年)，他把火热[16]的心灵中的全部热情、罕见的组织者的才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杰出才干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伯尔切斯库出身于小贵族，从青年时代就参

① 在两公国里有70种(!)外国硬币流通。

② 简短的篇幅迫使我们对参加革命的各种力量只能作这样的划分，虽然这种划分也没有反映出它的全部复杂性。还可以提到以康斯坦丁·罗塞蒂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这一派在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很多方面表现得很坚定，但在土地问题上就没有表现这么坚决。



罗马尼亚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古拉·伯尔切斯库。

加革命运动。他二十一岁时就因参加一次密谋而被捕，这次密谋的目的是废除贵族特权，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建立共和国。

三年的监禁没有折磨倒年轻的伯尔切斯库，相反的，却锻炼了他的意志。他刚出狱就参加组织一个新的秘密团体“兄弟会”，其成员都宣誓为反对封建制度而斗争。

伯尔切斯库认为自己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使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把土地分给他们。他相信，这将是建立一个独立、强大和民主国家的前提。伯尔切斯库写道：“贵族不知道爱土地是怎么一回事，在贵族看来，土地就是监狱，他把农民关进狱中，以便借助自己的仆役和租户来剥削农民。”他指出，摧毁封建关系将使贵族们在国

家中的权力也随之垮台。

伯尔切斯库的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历史条件的缘故。他认为可以赎买地主的土地，并且相信把土地分给农民以后，不仅穷困和赤贫现象将要消失，而且人剥削人的现象和阶级斗争也将没有了。

不言而喻，伯尔切斯库在罗马尼亚历史上的作用，不是由这些完全可以理解的弱点来决定的。正如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伟大之处一样，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为推翻封建制度而斗争，激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他写道："自由不会从皇帝的宫廷里来到人民之中，自由的取得不能依靠压迫者和暴君的仁慈，它将是罗马尼亚人紧密团结、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举行总起义的结果。"

由于公国当局的迫害，1846 年伯尔切斯库离开了祖国，侨居巴黎。在 1848 年 2 月暴风雨般的日子里，他同起义者一道冲进了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的王宫。但他的一切信念是同本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伯尔切斯库懂得把所有罗马尼亚土地上革命者的力量团结起来是多么重要，所以，他召集侨居巴黎的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人开会。会

上讨论了革命纲领。但是，当伯尔切斯库建议所有的人都到瓦拉几亚去，以便联合起来在那里举起革命斗争的旗帜时，他遭到了拒绝。摩尔多瓦的代表决定单独行动。

于是，伯尔切斯库回到布加勒斯特(1848 年 4 月)，并加入了准备起义的委员会进行工作。

17 摩尔多瓦事件

到 1848 年年初，国内局势已很紧张。农民不能忍受根据“组织法”规定而大大削减他们的份地。1847 年发生了可怕的旱灾，而到收获时节又出乎意料地下起倾盆大雨。那些没有干死的谷物都被连绵霪雨泡烂了。除了这些灾害以外，有些地区还发生了蝗灾。从 1847 年秋天起，农民经常拒绝服徭役，背井离乡，四处逃荒，甚至跑到国外；地方性的起义也不断发生。弗尔契乌县的一个贵族抱怨说：“叛乱和不服从情绪以及无政府状态现在在居民中占统治地位……”。

在资产阶级当中不满情绪也非常严重。商人公开不满贵族享有这样一些中世纪的特权：不纳

捐税，有权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建立企业，并且分文不交就取得营业执照。缺乏有组织的信贷，道路状况恶劣，行政混乱，全国各级国家机关里贪污受贿和盗窃资财之风猖獗，这一切使局势紧张起来。

备受苛捐杂税压榨的城市下层人民和农民，是准备参加革命战斗的主力军。

资产阶级很快地就同许多中小地主找到了共同语言，因为后者不满实际上已把他们排斥于政权之外的一小撮“大贵族”。这些地主由于在摩尔多瓦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的横行霸道而受的损失，也不亚于资产阶级。

在摩尔多瓦社会上层统治者之中也有深刻的分歧。占据大公宝座的米哈伊·斯图尔扎是全欧洲有名的掠夺者和盗窃国家资财犯，而在那时摩尔多瓦无官不贪的情况下，这就不那么简单了①。有关改革的事他连听也不愿听，而改革的必要性甚至一部分大贵族也懂得了，他们对大公的独断

① 后来，当斯图尔扎住在国外时，他的财产价值二亿法朗。他拥有很多工业企业的股票，他在巴黎、尼斯、索伦托、巴登—巴登都有豪华的住宅，甚至在巴黎—马赛铁路线上还有一节私人车厢。

独行的统治方法和专制表示不满。因此，摩尔多瓦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同上层的反对派运动结合起来了。

1846 年，“爱国协会”这个秘密团体产生了，其目的是推翻斯图尔扎，它的参加者是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出身的人。对协会的迫害，逮捕它的领导人和把他们流放到国外，并不能阻止摩尔多瓦革命情绪的增长。1847 年夏天，大公谘议会（大公下设的谘议机关——作者）的竞选运动，伴随着反对派反对斯图尔扎的激烈的政治斗争。这次发难是以农民运动为背景发展起来的，证明摩尔多瓦的革命形势已经形成了。

然而，人数很少的资产阶级和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地主既想进行合乎愿望的改革，但又不要群众帮助，这种企图在摩尔多瓦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里，商人和作坊老板有一半是外国臣民，而作为外国臣民他们受领事裁判权管辖，享受免税权和其它特权[①]。因此，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气氛就比邻近的瓦拉几亚微弱。害怕农民惩罚的恐惧心情

① 列强同土耳其帝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适用于摩尔多瓦。

在贵族当中也很严重：在近在咫尺的加利茨亚，1846年“暴动的农奴”用地主的鲜血写成了自己的土改纲领。这一切迫使资产阶级不敢依靠人民群众，而向具有反对派情绪的大贵族寻求同盟，从而对摩尔多瓦所发生的事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巴黎革命的消息是雅西开展运动的信号。

3月27日①，约有一千名贵族、商人、教师、律师和教士在“彼得堡”大饭店开会。他们向米哈伊·斯图尔扎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即包括三十五条要求的改革纲领。这个文件以要求严格遵守“组织法”开始。接着就列举资产阶级的改革：保障人身不可侵犯，改革学校，废除体罚和书报检查制度，实行责任制内阁，释放政治犯，解散外国雇佣军，成立国民自卫军等等。关于摩尔多瓦全部生活的主要的、根本的问题，即土地问题，在请愿书中只是顺便说了一下，并且措词很不明确。它的作者认为必须迅速改善农民的生活境况，调整他们同大地主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但关于废除徭役和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要求却只字未提。资产阶

① 我们引用的罗马尼亚近代史上的日期，是按当时罗马尼亚采用的旧历。

级向封建主让步，采用即使最温和的反对派也能接受的形式表达了这一条。

不言而喻，用这样残缺不全的纲领来鼓舞人民并引导他们跟着自己走是不可能的。正如一个请愿者指出的那样，“衣衫褴褛的人是不会为了维护‘组织法’而进行革命的。”

在革命面前吓得惊慌失措的米哈伊·斯图尔扎，忘记了自己不久以前发出的威胁——谁敢向他提出改革方案就把谁赶走，慌忙接受了三十五条要求中的三十三条，但拒绝解散自己的雇佣军和改选现存的大公谘议会。

19

温和的大贵族反对派满足于此了。但一些资产阶级和附和他们的地主的代表人物却要求全部履行纲领。这样就发生了分裂。运动最坚决的参加者开始在雅西居民中散发请愿书，力图动员他们起来进行斗争。个别人认为，斯图尔扎反正不会变成立宪统治者，因此甚至希望拿起武器来干。弗吉卡说：“很明显，大公在侮弄我们，就象多年以来一直侮弄我们那样。我们不要丧失时机，不分老少都武装起来，明天早晨八点钟由总主教领导我们去对付暴君的武力，让他和我们一起流血；以

便把国家从专制制度下拯救出来。”

我们一方面指出这类号召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它的幼稚性。不言而喻，要推动老迈龙钟的总主教梅列蒂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去“对付暴君的武力”，这种思想本身就是荒唐的。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反对大公的各种力量很分散。

在雅西的大街上，人民聚集起来并掀起风潮。扎哈里亚·莫尔多维亚努号召市民宣布成立共和国。有人还试图用改善农民痛苦处境的诺言来吸引他们参加运动。但是，没有一个摧毁农奴制的明确纲领，资产阶级革命家既不能引导城市下层人民跟自己走，更不能引导农民，也不能引导主要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民警部队。

参加运动的各种成分之间的深刻矛盾是它的致命弱点，这一点斯图尔扎很快地就察觉到了。3月28日夜间，约有一千名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即消防队员和外国雇佣兵，由大公的两个儿子带领着，在城内进行搜捕。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贵族马夫罗科尔达托家里被捕了，因为他们正在那里开会。其余的人是在自己家里被抓到

了。大兵们对他们毫不客气，把他们从床上直接拉起来，任意毒打，拖到宪兵队里。第二天，一些被打得遍体鳞伤、五花大绑的“罪魁祸首”被送到加拉茨，从那里押送到奥地利，另一些人则被押送到土耳其。

斯图尔扎向“自己心爱的市民们”庄严宣布，“具有叛乱思想气质的不成体统的人们”被制服了，“秩序”恢复了。

但是，大公庆祝胜利太早了。农村里农民运动的浪潮方兴未艾。有人报告大公说，农村里发生了“政治传染病”，农民认为分贵族土地的时候到来了。在福尔泰什蒂村（科武尔卢伊县），农奴拒服徭役并痛打管理人。在科兹纳村（弗尔契乌县），发生了“叛乱”，兹拉塔里（巴克乌县）的自耕农反对司法机关。在布丘梅尼（罗曼县），贵族的谷仓被捣毁了。在巴克乌、尼亚姆茨、罗曼、苏恰20瓦、瓦斯卢伊、图托瓦等县，农民开始武装起来。农民队伍聚集到格罗泽什蒂村（弗尔契乌县）附近的森林里。在尼亚姆茨县的山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人民把在墙上到处张贴的斯图尔扎的“胜利”宣言销毁了。惊恐万状的大公派出武装部队

去镇压农民，他怕自己的力量没有把握，又向尼古拉一世求援。

沙皇政府早就不安地注视着“叛乱”的烈火正向俄罗斯帝国边界烧来。因此，事先准备好了的军队便渡过普鲁特河；摩尔多瓦被占领了，那里刚刚开始的革命被绞杀于萌芽时期。

摩尔多瓦流亡者的活动

但是，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不能到这里就中止了。对于隐藏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布科维纳的摩尔多瓦流亡者来说，他们吸取的严重教训不是无益的，——他们懂得了，向大公提出请求和递送请愿书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在他们当中，一个重新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件的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开始了。自由资产者和地主一方面力求摆脱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又惧怕人民起义，因为后者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不仅要扫除农奴制，而且还要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两种思想在他们脑子里展开了斗争。因此，摩尔多瓦流亡者的文件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其中最坚决的一个文件名为“我们

改造祖国的原则”(1848年5月),它是在特兰西瓦尼亚革命的影响下起草的。它的形式简短有力,内容是真正革命的。这个文件规定废除徭役和各种形式的封建义务;把土地分给农民而不要任何赎金;废除等级特权;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管理国家;统一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

但是,正是摩尔多瓦农民运动的发展,加利茨亚的一些激烈事件(那里农奴惩罚地主没有注意他们政治观点的细微差别),巴黎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加强了摩尔多瓦流亡者当中的动摇性,结果使改良派占了上风。8月间,米哈伊尔·科葛尔尼恰努(1817—1891年)发表了他根据同志们的委托而写成的“民族党的要求”。这里详细论述了广泛的资产阶级改革纲领,甚至说到人剥削人的现象是不人道的。但土地问题规定用“给予原地主以公平补偿”的办法来解决,即必须缴纳赎金。

科葛尔尼恰努解释说,关于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问题“今天还取决于我们”。从这里得出一个结论:必须自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在不远的将来,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毋需经过我们,而且

要血流成河。"科葛尔尼恰努把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统一和建立一个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称之为一切改革的精髓。这表明资产阶级和自由地主越来越渴望不是在革命的烈火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这个科葛尔尼恰努断言："随着革命的爆发，文明就要停止发展"），而是用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办法来达到。

总的来说，摩尔多瓦的运动具有有限的革命性质，这是由于资产阶级软弱，惧怕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在土地问题上的投降主义立场所决定的。

由于没有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纲领，首先是没有摧毁农奴制和把土地分给农民的纲领，革命者想吸引人民群众参加运动的个别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

瓦拉几亚革命的爆发

在瓦拉几亚，格奥尔基·比贝斯库大公的专制统治方法引起了不满的暗潮。比贝斯库不愧为他的摩尔多瓦的同行米哈伊·斯图尔扎的伙伴。为了杜绝反映反对派观点的一切可能性，他封闭

了所有的报纸。私人通信受到检查。对“有嫌疑的人”实行警察盯哨。

在一定的时期里，抗议表现为农民反对残酷的农奴制的暴动，表现为组织秘密的密谋团体，其参加者主要是小贵族。

西欧革命的消息使瓦拉几亚的局势白热化了。由各方面代表人物——从未来的投降派领袖埃利亚代①到伯尔切斯库——组成的特设革命委员会开始准备发难，购买武器。手工业者（首先是制革工人和屠宰工人）和商人组成了武装小组，每组10—20个“弟兄”。革命委员会还把一部分军官争取到自己一边。它准备在佛耳恰和普拉霍瓦两县以及布加勒斯特和伊斯拉兹（小瓦拉几亚）同时举行起义。

局势的发展正好是这样：在伊斯拉兹的一个村镇里发生了成为革命开端的事件。驻扎在小瓦拉几亚的军队是由接近运动领导人的军官们指挥的。6月9日，在村镇附近的广场上，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向成千上万的农民和由普列肖亚努上尉指

① 埃利亚代后来写道，他加入革命委员会是想阻止起义，防止实行过激的改革和革命者的“好战热情”。

挥的、排列整齐的一连士兵宣读了一个宣言(史称伊斯拉兹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在法律面前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废除爵位和等级,成立责任制内阁,实现出版、言论、集会自由,施行累进所得税,使12岁以下的所有儿童普遍受教育。宣言还规定制宪会议实行"直接、广泛、自由的选举",以便做到只有"能力、道德、品行和公众的信任"才能使一个人进入国家议会。大公实质上变成了共和国总统,因为宣言中说大公"将从……任何一个等级中"选举产生,任期五年。纲领反对死刑和侮辱人的尊严的体罚。它宣布废除茨冈人[①]的奴隶制,而在第十三条中谈到要从农奴制束缚下解放农民并把土地分给他们(给地主以补偿)。 22

固然,由于伊斯拉兹宣言是集体创作的产物,而参加起草宣言的人又具有各种不同的信念,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投降派都有,所以这个最重要的条款表达得很不明确,既没说地段大小,也没说赎金多少。但把这个要求列入纲领之中,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重大的革命化的意义。聚集在伊

① 茨冈人也叫吉卜赛人,原来是印度的一个民族,过着游牧和半游牧生活,后散居于欧、亚、非各地。——译者

斯拉兹的农民欣喜若狂。而当革命者在宣布成立新政府之后，在军队和人民的陪同下经过卡腊卡耳和克拉约瓦前往布加勒斯特时，一路上到处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群众祝贺他们宣布了自由。

* * *

与此同时，大公比贝斯库于6月初在首都开始大逮捕，企图使运动失去领导。6月10日比贝斯库在乘敞篷马车外出时遇刺。大公没有受伤，但刺客失踪了。

比贝斯库企图利用这个事件来为自己服务。他到各个兵营里，号召官兵效忠于他。但谁也没有对他表示同情，而在步兵团里，军官们向大公声明，他们准备保卫祖国，抵御敌人，但不去参加骨肉相残的战争。

第二天，伊斯拉兹事变的消息传到了首都。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直接在大街上向人民宣读宣言。成千上万的市民和郊区农民聚集在宫前。在“我们要正义！宪法万岁！”的震耳欲聋的呼声中，代表团带着宣言去见比贝斯库。他抗拒了一会儿。人数众多、声势逼人的群众场面吓坏了大公，他坐在革命委员会的两个委员中间在宣言上签了

字，于是宣言就变成了国家宪法。当场就任命了政府，参加者当中有几个是伊斯拉兹运动的发起人。

仅仅过了两天，比贝斯库由于不愿实行他自己签署的改革纲领，就放弃了宝座而逃往国外。这使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在瓦拉几亚教会首领内奥菲特总主教的号召下，“大贵族”当中狂暴的反动分子集合到他那里开会。布加勒斯特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在策划反革命阴谋。几千人包围了总主教的教堂，于是，内奥菲特被迫走到阳台上，吻着三色的革命旗，宣誓效忠宪法。

23

这时又改组了政府。运动的领导人表现出妥协的倾向，让总主教内奥菲特领导政府，而此人的反动性同逃亡的大公是不相上下的。农奴制最坚决的敌人尼·伯尔切斯库和阿·格·戈列斯库改任次要的秘书职务，以伊·埃利亚代、什·戈列斯库和赫·泰尔为首的“温和派”占据了最重要的职位。

政府迅速地、毫不拖延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废除了文官官衔、书报检查制度、体罚、死刑，宣布了新闻自由，写着“正义和博爱”字

样的三色旗被宣布为国旗，通过了成立国民自卫军的决定。

6月15日，在菲拉雷特广场（从那时起改名为自由广场）上召开了人民大会，这次大会变成了革命力量的大检阅。三万市民和农民集会在这里。手工业者以行业为单位在旗手的率领下前来开会。印刷工人用大板车把机器运来，当场就印刷和散发革命的诗歌。人民兴高采烈地宣誓效忠宪法。

但是，仅仅采取这些措施还不足以巩固革命。农民对废除官衔不感兴趣；他们同书报检查制度也不发生关系，因为根本就不识字。他们迫切关心的是土地和自由问题，即废除封建义务和把份地变为自己所有的问题。只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使抛弃农奴制枷锁的人民，产生那种为反击国内反动派和消除笼罩在边境上的外国干涉危险所必需的革命热情。可是，运动的领导人走上了向地主让步的道路。他们向地主保证说，他们将照顾地主的利益。在伊斯拉兹举起斗争旗帜的革命者，还在前往布加勒斯特的路上就发出号召，劝说农民保持安宁，继续为贵族劳动。6月16

日，布加勒斯特政府颁布了关于私有制原则不可动摇的决定，并且声明土地问题只有制宪会议才能解决。政府肯定地说，贵族绝不是农民的敌人，并号召“农民兄弟”在三个月内还要履行他们对地主所承担的一切义务。

*　　*　　*　　24

两星期的时间——直到6月底——都在同一个接着一个的反革命阴谋作斗争。

1848年6月19日，奥多贝斯库上校（军事大臣）和索洛蒙上校（首都卫戍司令）带领两连士兵进入宫中。他们占领了宫中所有的进出门户以后，就冲进房里去追捕大臣们。幸运的是，军阀们全神贯注地在捉拿要人，而没有注意到宫中有些人悄悄地溜出去了并在城里发出警报。正当反动分子在匆匆忙忙地拼凑新“政府”的时候，人民群众开始聚集到广场上。士兵们动摇不定，让人民冲进宫里并逮捕了奥多贝斯库。但索洛蒙却把一部分队伍带到院子里。有人向人民开枪。退却的市民开始用石头、棍棒武装起来，拿到什么就当武器。勇敢的妇女安娜·伊帕泰斯库两只手都拿着手枪，高喊“处死叛徒！”，带领群众前进。显然不

愿制造新的流血事件的士兵们退回兵营里。被军队抛弃了的索洛蒙投降了。

然而，就是在公开的反革命政变尝试之后，政府也没有停止它的“和事佬的”努力。政府为了把某些军官争取到自己一边和打消他们叛乱的念头，给他们提升了一级。对于流血事件的组织者、叛徒奥多贝斯库和索洛蒙的处理，采取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宽大，只不过把他们开除出军队而已。

显然，这样处理根本算不上什么惩罚，只是鼓舞了反动派。贵族们散布的关于俄军侵入了瓦拉几亚的谣言传遍全城。贵族的狗腿子到处肯定地说，他们亲眼看见了干涉者。

政府惶惶不安地在讨论着，如果这些消息被证实了，那怎么办。胆小如鼠的埃利亚代坚决主张逃跑。伯尔切斯库要求组织抵抗。然而，内阁多数成员都没有表现出坚定的决心，而倾向于埃利亚代一边。6月27日，政府派遣自己的急使到北方去，以便弄清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急使快马加鞭跑到边界上，没有发现任何外国军队，又急速地赶回来了。

但是已经迟了：在布加勒斯特反革命得势了。

人们发现，还在28日，惊恐万状的埃利亚代就朝喀尔巴阡山方向逃走了。内阁其余的成员深夜开会，他们不顾伯尔切斯库的反对，决定步埃利亚代的后尘，号召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进入山中，在那里组织抵抗。当天夜里政府迁往特尔古维什泰。

6月29日早晨，惊异的布加勒斯特人发现，政权改变了。墙上挂着由总主教签字的布告，这个叛徒向布加勒斯特人祝贺“叛乱”的结束和“秩序”的恢复。反动分子急忙宣布成立总督府。 25

就在这一天，首都居民已能感觉到重新得到的“安宁”的一切好处。在城里，所有以前的警官都恢复了自己的职务。革命参加者开始遭到迫害。警察上尉科斯塔凯大声地吹牛说：“我要用罗马尼亚人的皮编我的马鞭子；我要用罗马尼亚人的血染我的马鞍子，以便让罗马尼亚人好好地记住，自由深入到这里的结果是什么。”市内建立起来的自由神像被打得粉碎。在警察局里，被捕者遭受严刑拷打。

但是，反动派得势的时间并不长。第二天，市民代表团就去见总主教，要求取消总督府。无数

的人民群众护送代表们。正如在这些暴风雨般的日子里多次发生的那样，手工业者和商人冲进了总主教教堂，而瓦拉几亚教会的这个背信弃义的领导人只好经受一些不愉快的时刻了。群众称他为违背誓言的人，强迫他废弃头天晚上签字的布告，解散警察，派遣急使去找政府。群情激昂的示威游行队伍走遍了全城。人民忍无可忍，冲进了那些可恨的反动分子家里，狂怒之下把它们捣毁了。第二天，布加勒斯特人前往兵营，因为恢复了军职的奥多贝斯库和索洛蒙企图在这里设防。炮兵们拿着点着了火的引火线守护在大炮旁边，但大炮的威严并没有吓倒布加勒斯特人，大群人冲上前去，冲散了士兵的队列，他们没有抵抗。就这样首都的劳动人民又拯救了革命。

此后进入了休战时期。贵族们遭到两次失败之后，各自东西，跑到世袭领地去了。而秘密急使则奔向北方和南方去找俄国和土耳其当局。反革命分子深知自己无能为力，便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外国入侵上。

回到布加勒斯特的政府开始进行正常的活动。废除了茨冈人的奴隶制，成立了一些委员会，

准备在教育、财政、行政、税务制度、农业和工业、商业和造船业等方面进行改革。在讨论制宪会议的组成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埃利亚代及其拥护者坚决主张成立等级制机关，这样贵族和倾向于同贵族妥协的资产阶级在这里就会有稳定的多数，并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农民。按照他们的方案，贵族、商人和农民各派100名代表参加会议。伯尔切斯库激烈抨击这个反动的花招，使它被否决了。在政府处境非常艰难的6月19和30这些日子里，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来，以致简直不可能硬把它限制在等级代表制的框框里。在持续了四小时的辩论之后，内阁多数成员站到伯尔切斯库一边。7月14日公布了关于召开由普遍的两级选举制产生的制宪会 26 议的法令。

又是根据伯尔切斯库的倡议，政府分别派遣自己的代表到各县去宣传和解释各项新法律。从自己方面来说，各地的代表团也来到首都，以便向新政权表示忠诚和保证自己支持它。在自由广场上聚集着成千上万的兴高采烈的布加勒斯特人，代表们在钟声的伴奏下当众向宪法宣誓。

首都所在地伊利福夫县代表团人数最多，色彩最为鲜明。代表团中每个乡都有自己的一辆大车，拉车的牡牛牛角都涂上了民族色彩。车上坐着美丽的姑娘，她们向所有的人展示农民的劳动工具——镰刀、大镰刀、锄头以及农产品。穿着民族服装的农民骑手围绕在车旁。

但所有这些节日气氛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革命的主要问题，即土地问题的解决还是原封未动。根据贵族和农民对等原则建立的讨论土地问题的委员会要到8月才开始工作，而到那个时候，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许多事件已经过去了，革命政府本身也不复存在了。

* * *

农村波动起来了。拒服徭役的情况经常发生。农民夺取贵族的粮食，在地主的草地上割草。有时事情发展到袭击地主庄园的地步。内务大臣尼古拉·戈列斯库不安地报告说："伊利福夫县大部分村庄的居民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不满，以致有些居民，即乌利梅尼村的居民彻底捣毁了土地所有者的庄园。"普拉霍瓦县出现了公开"叛乱"反对地主的苗头。

尼古拉·伯尔切斯库徒劳地向自己的同事呼吁，指出只有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才能挽救革命。他写道："……农民不相信诺言，而是问道：为什么现在不给他们（土地——作者）？我们犯了错误，本来应当利用胜利，即使暂时先消灭农奴制也好。否则我们的革命……如果不是完全失败，也将半途而废。"

然而，政府中的多数成员没有注意到，他们不坚决的、实质上是向贵族投降的政策怎样慢慢地破坏了他们自己的阵地。

同时，外国入侵的威胁越来越感觉得到了。

土耳其的武装干涉

27

政府中温和的多数派不去团结革命力量，而在对外政策上玩弄阴谋诡计。瓦拉几亚国家领导人一心想让沙皇政府同苏丹土耳其发生正面冲突。他们不了解，在镇压革命的共同任务面前，彼得堡和伊斯坦布尔之间存在的矛盾已退居第二位，因而他们企图取得土耳其苏丹谘议会的支持，使自己免遭沙皇政府干涉的危险。瓦拉几亚应缴

纳的贡税很快地送到了伊斯坦布尔。扬·吉卡作为政府使节驻在这里，他的使命是力争苏丹政府不干涉所发生的事件。土耳其人由于还没有准备好对瓦拉几亚进行武装干涉，所以就不给吉卡肯定的回答，而答应对既成的局势进行调查。这就使那些对奥托曼人的阴险奸诈还没有经验的大臣们产生一个希望：他们的计划还有某些成功的机会。当吉卡长期奔走于苏丹的办公厅并备尝艰苦之后受到皇帝本人接见时，他们大受鼓舞，精神振奋。

固然，力求同土耳其政府达成协议的瓦拉几亚政府成员的迷误为时不长。土耳其苏丹谘议会真的把自己的专员苏莱曼巴夏派到了瓦拉几亚。但是，“调查者”是在2万名讨伐军的护送下来到的，并于7月19日，开始把自己的军队渡过多瑙河开往朱尔朱。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照会，说明土耳其已进行武装干涉。

第二天，3万首都居民和郊区农民（农民们大批来到城里，安营驻扎在自由广场上）在自由广场召开了大会。大会的参加者坚决地要求土耳其军队从瓦拉几亚领土上撤退，指出，否则罗马尼亚人

将认为自己在土耳其政府面前不受任何义务的约束。一个专门代表团把这份有成千上万人签名的抗议书交给了苏莱曼。土耳其的大官装出“垂青”的样子听了代表们的意见，而第二天又有 12,000 名讨伐军渡河来到罗马尼亚。

苏莱曼在为“谈判”作了这个“预先准备”之后，便让自己的代表廷季尔—爱芬迪在布加勒斯特宣读他的信件。信中说道，罗马尼亚人采取了“非法行动”，推翻了自己的大公并迫使他逃走。土耳其政府要求解散临时政府并任命总督。只是在这以后苏莱曼才同意听取申诉和要求。他给罗马尼亚人 24 小时的时间进行考虑。实质上这封信就是不加掩饰的最后通牒。

傍晚，自由广场上又聚集了愤怒的首都居民和农民。人们呼吁再向苏莱曼派出一个代表团。[28] 成千名公民表示要护送代表团。以埃利亚代为首的惊慌不安的政府中的多数派劝说人民不要这样做，以免同土耳其人发生冲突。7 月 23 日，政府宣布自行解散。它突然表现得很温顺，在自己最后一个宣言中把苏丹称为“东方的解放者”。

1848 年 7 月 24 日傍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

有4万人参加的大会上选举了总督府。以前的国务秘书，其中包括伯尔切斯库，没有参加总督府。掌握大权的是一小撮胆小如鼠的妥协者，他们惧怕本国人民的革命行动远远超过了土耳其的干涉。根据苏莱曼的要求，他们在贴满全城的一些专门布告中宣布：新的、即革命产生的法律，只有经过苏丹批准以后才有效力。苏莱曼只是在把新政府缩减到三个人（埃利亚代、赫·泰尔、尼·戈列斯库），并要求按土耳其语称它为总督府之后，才"承认了"它。

尽管人民每天都举行群情愤慨的群众大会，苏莱曼还是很容易地就取得了总督府的让步。逃亡国外的反动贵族又回到了布加勒斯特。在土耳其大官的坚持下，宪法草案在各方面都遭到砍削，瓦拉几亚一个专门代表团把它送到伊斯坦布尔去请苏丹批准。

但是，在土耳其谁也不理睬瓦拉几亚的代表。在革命处于高潮时，他们的英法"朋友"未做一点事情来帮助革命。而当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法国大使馆的一个官员便认为自己可以挖苦地教训瓦拉几亚人了。他说："你们被征服了，不能再谈

什么革命权利了。”

土地问题委员会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由贵族和农民组成的制定土改方案的委员会于8月9日开始工作。委员会的多次会议暴露了异常深邃的矛盾鸿沟，使对立双方不可能搭起任何妥协的桥梁。

农民代表对贵族们进行了连珠炮般的控诉。兰尼库—塞拉特县农民代表、牧师尼亚古诉说贵族贪得无厌："如果恶霸能把自己的手伸到太阳上，他就会把太阳攫为己有，拿太阳的光和热向农民卖钱……如果恶霸能占据海水，他就会拿水来进行投机倒把，迫使农民苦于黑暗、饥饿和干渴，就象现在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而迫使他们挨饿一样。"布勒伊拉县代表利庞控诉说，当他的妻子生孩子的时候，警察怎样用鞭子抽打他，赶他下地干活。普拉霍瓦县的埃内·科若卡鲁指出，农民甚 29 至不能随意逃跑，因为士兵会捕捉他。他大声疾呼："农民就象生活在石砌的堡垒里一样，铁门紧锁，走投无路。"佛耳恰县的代表巴迪亚在举例说

明贵族的“公平”时控诉说，他搬运玉米一个星期，结果只算他一天的劳动。

罗马尼亚的农村迫不急待地等待着委员会的工作结果。各地都来了人数众多的代表团。仅普拉霍瓦一县就在牧师的带领下来了一千人。会议厅里经常挤得水泄不通，群情激昂，农民代表的发言博得深切的同情。

他们所提的要求具有非常温和的性质。他们坚决要求农民获得 4—8 公顷土地（根据地点远近和土壤肥瘦而定），同意对此付出高额的赎金。

然而，即使这些不高的要求也遭到了大地主的激烈反对。贵族罗贝斯库扬言：“我们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建议给农民一公顷（！）土地。而第三个委员甚至连一公顷也不愿给，声言只要给农民一个小房子和 20 平方俄丈土地就“够了”。在贵族代表中，只有雅洛米察县的齐奥塞斯库表示愿意给予农民足够的份地。但他孤掌难鸣。有些贵族的代表公开地对委员会的工作实行怠工，有些人装病不来开会，另一些人则干脆离开了布加勒斯特。委员会的第九次会议算是最后一次会议：总督府把它解散了，借口是它

“不是用和谐的精神来鼓舞自己，而是充满了敌对情绪”。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希望化为泡影，革命形势更加艰危了。

革命被镇压下去了

9 月初，苏丹政府以强硬的富亚德巴夏接替了“宽容的”苏莱曼的职务。入侵是不可避免了。新专员根本不愿同瓦拉几亚政府的代表谈话，而对贵族则热情欢迎。9 月 6 日布加勒斯特人民不满情绪的新的爆发，表现为烧毁“组织法”和贵族官位等级册。人民把这些可恨的文件装在出殡用的灵车上，在送葬曲的伴奏下运到总主教教堂里，扔到火堆上。

惊恐万状的总督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以平息即将发展为起义烈火的抗议火花。总督府继续散布幻想说苏丹怀有善良愿望，劝人民和平地出来迎接正向布加勒斯特推进的土耳其军队。9 月 10 日，约有 10 万市民和郊区居民在首都近郊搭起野营。连续等待了三天。最后讨伐军终于来到了，驻扎在不远的地方。9 月 13 日，富亚德召见 30

了总主教、大贵族、高级官吏、行会领导人和手工业者。一个人数众多的代表团去会见了他。土耳其专员向代表团宣读了一个严厉谴责革命的声明。他要求恢复旧秩序，并宣布任命反动贵族K·康塔库齐诺为总督。参加了代表团的伯尔切斯库提出了大胆的抗议。他指出，富亚德甚至践踏了他的前任苏莱曼已经批准给予罗马尼亚人的那些权利。

土耳其专员不愿同伯尔切斯库进行讨论。他建议凡是同意"组织法"的人退出代表团。响应这个号召的总共只有40个贵族。其余160人被士兵包围起来，并被带进科特罗切尼教堂。

土耳其人分几路纵队打着鼓向市区推进。有一队士兵在走近人民的野营时猛扑过去，践踏旗帜、军旗和圣经。但人们紧紧地站在一起，使步兵无法通过。步兵没有动用武器。于是土军指挥部就把骑兵调到前面。手无寸铁的布加勒斯特人便抓住马缰绳，但兽性大发的骑手们踩死和砍倒了几个人以后，就冲向城里去了。

真正的战斗是在罗马尼亚军队的营房附近激烈地展开的，一队土军在刚刚任命的总督和贵族

卖国贼的陪同下进抵营房。在这里起初是偶然地发生了互相射击，后来则变成激战。消防连表现得特别英勇，它遭受重大损失，只是在弹尽以后才放下了武器。

白色恐怖开始笼罩着首都。一个同时代人写道："9月13日一整夜，土耳其人打家劫舍，扒去男人、妇女和儿童的衣服并把他们杀死，捣毁教堂，并将其中的贵重物品抢劫一空。第二天，土耳其人在大街上拦路抢劫行人的钱包，在大小商店里他们抢走一切他们喜欢的东西，分文不给。"而当人民代表去见土耳其将军奥梅尔巴夏请他释放几个被捕者时，他回答说，这些人反正是在押的，因而他们比任何别的市民都更安全。

瓦拉几亚只剩下一个抵抗据点——图拉真广场上加强了防御部署的兵营。驻在这里的马杰鲁将军领导的军队总共有15,000人。当富亚德逼近布加勒斯特时，伯尔切斯库坚决主张把炮兵和骑兵调到这个兵营里。准备同敌人决战的农民也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虽然武器不够，但马杰鲁的军队还是一支威力很大的军队。当有人建议将军停止抵抗时，将军自己回答说，他是一个罗马尼

亚人，宁死也不做奴隶。9月26日，在检阅时士兵和农民要求出兵迎击敌人。

这时英国领事科尔孔出面干预。他的代表说服了马杰鲁解除武装，以防苏丹抛弃他对瓦拉几亚人的“善良”愿望。目击者回忆说，马杰鲁号召士兵和农民解甲归田，“它所产生的强烈印象，是任何最可怕的晴天霹雳都不能比拟的”。很多人都要进行说服才肯离去，他们诅咒，含着眼泪放下武器。

与此同时，俄国军队进入了瓦拉几亚，因为沙皇政府力图尽快地绞杀革命。此外，它怕土耳其利用占领地位在这里建立独揽一切的势力。

* * *

瓦拉几亚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资产阶级的软弱，它惧怕人民起义和倾向于同反动派妥协，不愿意和不善于把自己的力量同匈牙利革命联合起来，这些因素是这次失败的内因。异常不利的国际形势促成了革命的失败，因为瓦拉几亚这时处于欧洲两大反动堡垒——沙皇俄国和苏丹土耳其的夹击之中。

然而1848年仍将永远留在罗马尼亚人民的

历史上。正是人民群众、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干预多次拯救了处于危亡之中的革命。他们的要求决定了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

结果，反动派得势了。1849 年，根据土耳其同沙皇政府签订的巴耳塔—里曼[①]公约的规定，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甚至丧失了阿德里安堡和约及其附件中所规定的那些权利。彼得堡和伊斯坦布尔宫廷任命的大公骑在摩尔多瓦人和瓦拉几亚人头上作威作福，甚至像贵族谘议会这种对人民代表制的讽刺性的模仿机构都不存在了。尽管革命失败了，但它对封建制度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预先决定了它的灭亡。争取资产阶级改革的运动在新的条件下，即在争取多瑙河各公国统一和它们的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展开了。

革命前夜的特兰西瓦尼亚

1848 年革命以前，特兰西瓦尼亚是作为自治

① 巴耳塔—里曼是伊斯坦布尔附近的一个村庄。——译者

公国列入奥地利君主国的版图的。但事实上，这个广阔地区是由维也纳宫廷宰相府采用哈布斯堡王朝所特有的专制官僚手段进行统治的。当地国民议会的一切决议都要由维也纳批准。但奥地利32官僚当局认为这还不够，它竭力把国民议会尽可能排斥于国家事务之外。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国民议会总共有25年没有召开过会，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

整个奥地利帝国普遍存在的矛盾在特兰西瓦尼亚又由于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而加剧了。它的多数居民是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也大量地聚居在这里。然而，罗马尼亚居民在国民议会中却没有代表。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基本原则——“分而治之”——在特兰西瓦尼亚用得特别露骨。维也纳当局利用各民族杂居的情况，把这个地区划分成很多行政单位。特兰西瓦尼亚的主要部分划分为几省，此外，在居住着大量日耳曼人的东南部建立了所谓“国王辖区”，在边境地区则有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的边防团区①，后者是根据特别法律

① 居住在边境的农民都担负边防义务。

进行管理的。

大量的帝国武装力量(多达 2 万人)常年驻扎在特兰西瓦尼亚，时常爆发的农民暴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一个很典型的事例是，在行政机关的编制中有 31 名刽子手。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刽子手的薪水，比方说，就高于医生。从西欧到特兰西瓦尼亚来旅行的人，都怀着恐惧的心情看到许多居民点旁边设有绞架，而在自己的祖国他们早已不习惯这种景象了。

维也纳的统治者把特兰西瓦尼亚看作帝国发达地区的农业附属品和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奥地利的商品不受任何关税阻碍而涌进这里。下述数字对特兰西瓦尼亚和下奥地利的工业发展情况可以作一个对比的说明：在特兰西瓦尼亚，按人口平均计算每年工业品产值是 7 弗罗伦[1]，而在下奥地利是 77 弗罗伦，即高出十倍。

但是，不言而喻，任何预防措施和禁令都不能阻挡历史发展的进程。资本主义关系虽很缓慢但却在工业和农业中为自己开辟道路。有益的矿藏——煤、铁、银、金、铜、水银等都开始加紧开采。

① 弗罗伦是意大利的旧金币。——译者

冶金工厂扩大了。在矿山、矿井和工厂里开始采用蒸汽动力。金属加工企业首先是生产农具的企业建立起来了。棉毛纺织厂采用从国外进口的机器装备起来。利用当地原料的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制糖厂、酿酒厂、蜡烛厂、榨油厂、面粉厂、制革厂，发展较快。商业资产阶级也加强了。但是33也不应该夸大这些成就，因为总的来说，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工商业中，从业人员只占总人口的3%。

这个地区日耳曼、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资产阶级，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他们当中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都想首先依靠牺牲其它民族的竞争者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剥削范围。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寄希望于“本民族的下层人民”，力求利用他们的支持，利用他们在斗争中的革命积极性来争取加强自己的影响和势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尼亚资产阶级是处于特殊的条件下。侵犯民族利益，轻视文化，禁止在学校、行政机关和法院里使用本族的语言，政治上的不平等，——这一切深深地伤害了罗马尼亚人的自尊心。罗马尼亚资产阶级期望在争取民族权利的道路上捍卫自己的经济要求。它可以指望它

的关于争取民族平等的号召将得到所有罗马尼亚人的支持，因为罗马尼亚人大多数都是农奴，遭受[34]主要是匈牙利族地主的残酷压迫。

在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农奴制压迫加深了。逐渐卷入商业之中的贵族扩大了自己的耕地。因此，徭役也增多了。根据从十六世纪传下来的规矩，农奴每年必须用自己的牲口为贵族劳动52天（事实上要多得多）。此外，农奴还要把自己收获物的九分之一送到地主的谷仓里，担负运输义务，维修和建筑道路，为军队提供新兵，缴纳国税。

地主力求用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径来侵占农民的份地以扩大自己的地产。他们常常利用有时重新丈量农民所使用的土地的机会来达到这个目的。山林、草地和牧场也遭强占。农民编了一个谚语，把这种变革比作鞑靼人的入侵，关于后者的可怕回忆在农村里还一直流传着。1846—1847年的形势特别紧张，因为这时在“整顿”地界的借口下，地主试图把农民从他们祖传的土地上大批地赶走。

在罗马尼亚农奴的思想里，社会压迫是同民族压迫密不可分的。他们由于仇恨匈牙利地主，

所以就把民族斗争的口号领会为奋起反对匈牙利大地主的号召。

农民的领袖是一个人数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阶层，按照俄国的说法，他们可以称为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是下层教士、边境农民甚至农奴的子弟。在一个民族完全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他们很难找到使用自己精力、智慧和能力的地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人物、律师阿夫拉姆·扬库竟然找不到不要薪水的见习律师的工作。所以，正是从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争取民族平等的热情战士就不足为奇了。这个阶层的特点是，对农奴的疾苦深表同情，他们的很多代表人物，如上述的扬库、帕皮乌—伊拉里



阿夫拉姆·扬库——1848—1849年特兰西瓦尼亚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安、巴里齐乌、契帕里乌等，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并把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诚然，最后两个人在革命暴风雨的岁月里曾号召农民忍耐，并谴责他们强占贵族的土地。

布拉日的教师西蒙·巴尔努齐乌的立场接近于他们。这是一位值得一提的思想家，虽然他的观点也是非常矛盾的；他是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激烈的反对者，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到晚年时的政治信念则是共和主义者，主张进行相当广泛的改革(其中包括无条件地废除农奴制)。然而，巴尔努齐乌在争取罗马尼亚人民民族权利的斗争中却陷入了民族主义的泥潭。他是“达契亚罗马主义”这个理论的创始者之一，按照这种理论，在特 35 兰西瓦尼亚的公民中，只有那些血管里“流动着罗马侵略者的血液的人”（即罗马尼亚人）才能享受充分公民权利。他的这个观点反映了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资产阶级要在这个地区建立它的领导权的梦想。

罗马尼亚的大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它们希望用同哈布斯堡王朝勾结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高级官吏和上层教士都纠集在年轻的爱好

权势的主教安德烈伊·沙古纳周围，此人只不过要求进行一些温和的改革和在特兰西瓦尼亚建立独立自主的罗马尼亚东正教教会①而已，并且还期望从皇帝手中得到这一切。

特兰西瓦尼亚革命的开始

当匈牙利首都佩斯1848年三月事件的消息传到特兰西瓦尼亚时，它的形势就是这样的；在佩斯，人民举行起义，迫使奥地利皇帝斐迪南批准了一部革命的宪法，其中除了列举很多资产阶级改革以外，还规定废除徭役，表示希望匈牙利同特兰西瓦尼亚合并。

不言而喻，关于废除徭役的条款是革命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但宪法没有规定把土地分给所有的农民。实践的结果是，不顾地主的暗算全部或部分地保留了自己份地的农奴，就把这些份地变为己有，不过要付很高的赎金。而那些在地主土地上服徭役的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阶层，只得到了人身自由，因而不论条件如何还是要租种

① 它从属于巴纳特的塞尔维亚教会。

土地。

起初，革命的消息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人士中引起了狂喜。在克鲁日、阿尔巴一尤利亚、阿拉德、特尔古一穆列什、奥多尔赫伊、蒂米什瓦拉和其它地方都举行了示威游行。青年们不分民族差别，一致要求特兰西瓦尼亚议会赞成同匈牙利联合。

相反的，在议会中开会的匈牙利地主，则对匈牙利事件抱着审慎的态度。农奴不再无偿劳动的前景没有引起地主的任何喜悦。议会没有急于宣布联合（宣布联合就使“三月宪法”自动地扩大到特兰西瓦尼亚），而是拖延时间。但是，暴风雨般的事态进程迫使议员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民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了。这个地区土地关系的某些特点，使运动的规模和深度都超过了匈牙利本国。问题在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三分之二的农民都没有土地（在匈牙利是三分之一）。“三月宪法”给农民揭示出永做无地佃农的黑暗前途，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根据这部宪法的规定，特兰西瓦尼亚100万农民中有70万人一无所得。而其余30万

36

人即使是部分地保留了份地，也大声疾呼地要求地主把最近几十年间强占的森林、牧场和耕地还给他们。他们决不理解在佩斯所宣布的“平等”和“博爱”，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一些人田连阡陌，另一些人则一无所有。因此，早在1848年4、5月间，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民就开始强占地主的土地。农民——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声明，他们希望在他们之间兄弟般地分配土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们忘记了自己对“三月宪法”的不满情绪。他们看到，匈牙利革命政府坚定不移地在保护“秩序和财产”。5月2日，匈牙利内务部领导人塞梅里颁布了一项通令，严厉谴责侵犯“他人财产”的行为，声明强占地主土地的恶棍将受到“以儆效尤的惩罚”。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大地主们，在特兰西瓦尼亚同匈牙利联合问题上的立场改变了：他们认为，为了不致丧失自己的全部权利，牺牲部分权利还是明智的，而现时还是要全心全意地铲除“叛乱”。

国民自卫军被用来镇压起义农民。它卖力地恢复“秩序”。那些渴望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

上实现平等的“叛乱者”，遭到了用树条赤身抽打50至100下或坐牢的惩罚。

农村的愤怒情绪增长起来了。愚昧无知、备受压榨的罗马尼亚农民依然相信皇帝的善心，而教会和一部分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资产阶级则巧妙地支持这种信念。农民知道是斐迪南下令废除了徭役，因而相信这是“仁慈的”皇帝把他们从农奴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了，而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地主干扰实现皇上的善良愿望，仍旧迫使农民给地主当牛做马。可以想象，一贯善于玩弄民族矛盾的奥地利反动派在特兰西瓦尼亚是有多么广阔的活动场所！

匈牙利革命政府不愿承认除匈牙利族以外的其它民族，它的许多错误使局势更加恶化了。如果说，罗马尼亚的民主派以前认为，革命的匈牙利将变为各个平等民族的联邦，匈牙利地主和资产阶级以前的特权地位将告结束，那末，现在这些幻想已化为乌有了。在罗马尼亚居民中，“不联合（同匈牙利联合）即死亡！”这个口号开始被认为是企图保持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人们还没有明确地理解：实现国家的合并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革

命力量的联合是不同的两回事。主张同匈牙利革命者联合行动的人越来越少了。民主派的领导人 37 包括阿·扬库在内，都没有伯尔切斯库的眼界那么宽广，不懂得这种联合是胜利的唯一保证，而稍有动摇就有葬送革命的危险。

以维也纳宫廷为首的反革命势力利用了匈牙利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反动立场，巧妙地采取了思想攻势：根据4月25日奥皇签署的宪法，宣布了居住在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一律平等。

1848年5月3—5日
布拉日人民会议

5月3日，罗马尼亚人民会议在布拉日开幕。巴尔努齐乌事先为会议制定好了纲领。在他看来，应当宣布罗马尼亚民族独立，举行国民宣誓并反对同匈牙利联合。他的建议只字未提农民迫切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把他们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并把土地分给他们。

但是，事态的发展完全没有按照巴尔努齐乌的方案行事。

从5月3日清晨起，3万人民群众聚集在布拉日的一个大广场上。讲台上演说人的声音只有前面几排的人才能听到。因此会议逐渐分成为许多小组，知识分子宣讲员在各组发表演说。民主的趋势在会上显然占上风，会议的决议远远超出了事先规定的范围。会议主张在特兰西瓦尼亚建立罗马尼亚的行政机构和法院，设立各民族按比例产生的代表机关，在学校里用本民族的语言教学，在各种机关团体里使用本民族语言。会议要求立即无偿地废除徭役和为地主履行的一切封建义务，修改关于把农民土地、森林、牧场让给地主的决议。关于保障畅行无阻地从事商业和企业活动以及取消同邻国（即同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关税壁垒的条款，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会议宣布了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公民人身的不可侵犯。在布拉日通过的纲领的最后一条，即第十六条中表示反对同匈牙利合并。

同匈牙利合并

然而，特兰西瓦尼亚议会没有理会罗马尼亚

人在布拉日所提出的要求；5月29日它投票拥护同匈牙利合并。

在匈牙利本国，只有伟大诗人山多尔·裴多菲领导的《三月十五日报》对仓促采取这一步骤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因为特兰西瓦尼亚议会最多也不过代表几百个人，它采取这个步骤是违背大多数居民的意志的。

38

从5月29日起，匈牙利的“三月宪法”，其中包括废除农奴制法，开始在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全境生效。然而，地主马上就找到了拖延执行这一法律的办法。在根据法院判决划清农民土地同地主土地的界限以前，农民必须履行过去的一切封建义务。在农民土地同地主土地犬牙交错、混杂不清的情况下，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的法院和行政机关很容易利用土地丈量工作为地主谋利。不仅如此，地主还搬出多年前在代役租和徭役方面欠的旧账，强迫农民作工偿还。结果农民运动一天也没有停止。以前的农奴都不分民族区别，不等贵族法院的判决便占上了土地、草地和森林，宣布它们为自己所有。特兰西瓦尼亚变成了常常演成流血冲突的骚动的策源地。地方当局经匈牙利

政府批准严厉地镇压叛乱者。米哈尔察的农民要求把埃斯泰尔加齐伯爵强占去的草地归还他们，地方当局便派出一连匈牙利边防军去进行大屠杀，从而引起了整个公国的愤慨。凡是不服从的村镇就派驻防军去镇压，而“主谋者”则遭受毒打并被投进监狱。一位史学家写道：“自由的曙光在特兰西瓦尼亚却具有一些奇异的色彩，伴随她而来的是追使农奴履行封建义务的国民自卫军……是拷打、监狱和绞架。”早在6月间，政府的密探就从各地报告说，农民都武装起来了，拿到什么就当作武器。

罗马尼亚人、日耳曼人和塞尔维亚人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对匈牙利报刊的民族主义立场表示愤慨，《科苏特报》也赞成这种立场。它写道：“不幸的是，居住在资源丰富的匈牙利土地上的不是一个民族。”它还继续写道：“如果几千年来这个国家的主人马扎尔人，在那些过去就是他的奴隶的人们当中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人，那末，难道罗马尼亚人、斯拉夫人还能觉得这是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吗……”《科苏特报》在决定语言问题时是异常轻率的，它写道：“匈牙利语必须是唯一的国

语"。其它民族的人可以在自己家庭范围内使用本族语言。

当特兰西瓦尼亚当局指控布拉日会议领导人"唆使"群众不服从政府,并开始捉拿他们时,罗马尼亚人的不满情绪更加增强了。这些领导人中有些人被捕;另一些人则藏到罗马尼亚边防团区和山中。到1848年秋天,局势如此紧张,以致星星之火都可以引起骨肉相残的战争。

到这个时候,奥地利反动派又抬头了。1848年6月,文迪施格雷茨公爵使布拉格起义淹没在血泊中;一个月以后,拉德茨基元帅又在库斯托齐亚打败了意大利人;9月间,自己觉得更有信心的维也纳宫廷拒绝批准关于成立单独的匈牙利军队的法案。同月,霍尔瓦蒂亚的贵族耶拉契奇侵入匈牙利。仓促组成的以科苏特为首的"护国委员会"对他进行了反击。耶拉契奇的军队被赶出国境。城乡到处进行招兵。但在特兰西瓦尼亚招兵工作碰到了很大困难。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奸细在农民中散布谣言说,军队将把"仁慈的"皇帝所废除的农奴制枷锁重新套到农民头上。无地的农民——不仅是罗马尼亚人,而且还有匈牙利人

——声明：让伯爵们当兵去吧，他们是有财产需要保护的。可以说，军队是用战斗从居民那里强抓新兵的。仅在卢纳乡一地，在发生流血事件时骠骑兵就砍死了28人。

奥地利的奸细利用这种紧张局势，通过罗马尼亚边防团的军官进行活动。9月中旬，边防团军官召集了几次会议，与会者要求立即废除为地主履行的一切封建义务，拒绝承认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匈牙利，并宣誓效忠皇帝。这样一来，很得人心的反封建的口号便被用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了。

1848年9月15日，在布拉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一次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全副武装、拿着大砍刀和长矛来参加会议的，有些人还带着火枪。会议要求制止恐怖状态，取缔讨伐队，立即废除为地主履行的各种形式的封建义务。会议声明，它不承认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匈牙利，并主张建立新的特兰西瓦尼亚议会，让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根据自己人数多少按比例选出代表参加议会。会议还决定在各个村、镇成立罗马尼亚国民自卫军。

在这以后，锡比乌的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便把运动的权力交给哈布斯堡王朝掌握。匈牙利议会中一部分罗马尼亚议员（来自巴纳特和南布科维纳）还作出最后的努力，要求结束特兰西瓦尼亚的任意专横和滥用职权行为，试图防止骨肉相残的战争。

然而事态的发展迅猛异常。革命的匈牙利同哈布斯堡宫廷断绝了一切联系。1848年10月，帝国的驻防军开始解除武装。在特兰西瓦尼亚，解除武装演变成公开的武装斗争。匈牙利的骠骑兵和步兵不仅反对奥地利人，而且还袭击村庄和迫害无辜的人。对此，罗马尼亚的农民便联合成队伍，在锡比乌民族委员会任命的长官领导下进行战斗。他们转而进攻地主的庄园和匈牙利国民自卫军。斗争从双方来说都是空前残酷的，而且40用伯尔切斯库的话来说，具有野蛮性。有些地主全家被杀。有些与运动无关的人也被杀死。个别的冲突发展为真正的战役。

10月15日，在卢蒂察召开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会议；会上宣誓效忠革命。在这里成立的民兵队伍开始向雷金进发，在那儿击溃了奥

皇的军队。但后来一部分匈牙利农民便去攻打地主庄园，另一部分人则醉心于抢劫。军队事实上瓦解了。重整旗鼓的帝国军队于11月初在特尔古一穆列什击溃了匈牙利军队的残部。

军事优势转变了。现在匈牙利人不得不考虑防御问题了。他们设防固守在几个大的中心地区，其中包括克鲁日。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大部分地区，政权转入奥地利军官手中，锡比乌的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任命的一些人员充当了他们的助手。来到特兰西瓦尼亚的伯尔切斯库曾呼吁这个委员会摆脱奥地利的监督，但没有成功。

1848年11月，奥皇军队同罗马尼亚部队一起进抵克鲁日。匈牙利军队指挥部违背人民意志，不作抵抗就在11月18日交出了城市。根据投降条件，罗马尼亚起义者不准进入城市。

此后，领导奥军的普赫纳将军断定，抵抗被摧毁了，于是就急忙摆脱不可靠的罗马尼亚同盟者——农民，因为他们的一切念头就在于消灭地主制度。普赫纳最后通牒式地要求农民放下武器，解散回家。这样锡比乌委员会就开始收到自己政策的果实了。只是在特兰西瓦尼亚边境地区的一

个小地方，即特里亚·斯卡乌纳省还保存着革命匈牙利政府的政权。这个地区是由匈牙利边防军防守着，凡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加入了边防军。老幼妇孺都在工场劳动，制造火药、装具和武器。领导防御工作的是一位从人民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加博尔·阿隆，他当过边防团的炮手。

贝姆在特兰西瓦尼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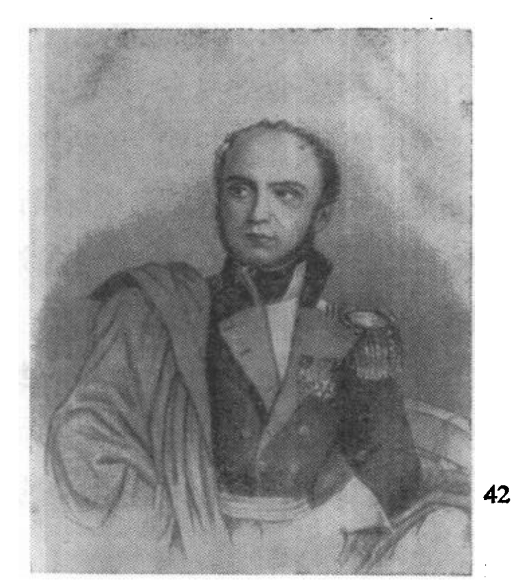
但是，1848年12月中旬军事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支由波兰人出身的热情的革命家约瑟夫·贝姆统率的匈牙利军队，进入了特兰西瓦尼亚。贝姆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国际的队伍，它包括匈牙利步兵，从革命的维也纳逃亡出来的人，以及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

贝姆在这支成份复杂的军队中建立了铁的纪律。占领克鲁日以后，他号召罗马尼亚人忘记过去，共同努力来反对专制制度。在几次胜利的战斗中他击溃了奥地利军队，并在三个月里把奥军和前来支援他们的沙俄军队赶出了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逃到布加勒斯特。在那

41

儿得势的反动派按照自己的方式迎接了“来自喀尔巴阡山的兄弟”：巴里齐乌、巴尔努齐乌、契帕里乌和其他许多人被关进监狱；只是在几个月之后他们才被释放并流亡国外。此后，委员会就变成了奥地利反动派的一个驯服的软弱无力的机构。

与此同时，贝姆用最大的精力组织特兰西瓦尼亚的管理工作。“当特兰西瓦尼亚为他控制的时候，他防止了马扎尔人特派员打算采取的毫无意义的和不讲策略的残酷手段，因而受到人们的尊敬。”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



匈牙利革命军将领约瑟夫·贝姆

42

遗憾的是，贝姆未能始终执行自己的路线，尤其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34—135页。

他很快地就到巴纳特[1]去了。大地主们故意提起被烧的匈牙利人的乡村和城市，如兹拉特纳、阿尤德，以便在匈牙利人当中煽起复仇的怒火。政府的特派员恰尼宣布贝姆所给予的大赦无效。特兰西瓦尼亚建立了许多“血腥的法庭”。缉拿队在全国到处搜捕，残酷惩罚所有被怀疑叛变革命的人。只是在行人难到的喀尔巴阡山里，即在西南地区还有一小块地方没有受匈牙利政府的统治。保卫这块小地方的是在阿夫拉姆·扬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部队的残部和山区居民。

贝姆忠于自己的和解策略，希望同扬库达成协议。经贝姆同意，布达佩斯议会的议员、罗马尼亚人德拉戈什同起义领导人进行谈判。1849年4、5月间，他们会晤了几次。在通过德拉戈什交给扬库的信中，科苏特答应给予罗马尼亚人公民权，同意在教会、学校和公共团体里使用罗马尼亚语言，大赦起义者。然而对扬库所请求的停战，科苏特却只字未提。

谈判悲剧性地猝然中断了。匈牙利的冒险主

---

① 巴纳特是塞尔维亚伏伊伏迪纳的一个地区，当时属于匈牙利。——译者

义分子哈特瓦尼带着一支非正规的部队，在路过阿布鲁德时冲进了城里，并迫害罗马尼亚的代表人物。异常愤怒的山区居民认为他们是上了圈套，德拉戈什是个叛徒。他们强占了阿布鲁德，在复仇的怒火中不仅消灭了匈牙利男人，而且还杀死了许多妇女甚至儿童。德拉戈什被处死了，他的尸首被肢解了。

匈牙利政府对起义者进行了几次远征。但几次远征都被顽强的抵抗所击败，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杰出的匈牙利革命民主主义者帕尔·瓦什瓦里也在这里丧失了生命。

伯尔切斯库争取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达成协议的尝试

在匈牙利人士中逐渐加强了这样的信念：不给以前被压迫的各族人民以民族权利就会葬送革命本身。匈牙利政府驻巴黎代表拉斯洛·泰列基向科苏特写信谈过这个问题。

1849 年 7 月，匈牙利的高级军官之一约瑟夫·西曼迪试图同扬库谈判，并得到了后者令人

兴奋的答复。尼古拉·伯尔切斯库不倦地极力争取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达成协议，把革命力量团结起来。伯尔切斯库和两个流亡的同志一起于1849年5月来到了革命军将领彼尔采尔的兵营，然后从那儿又到了佩斯。尽管革命的匈牙利这时已处于绝望的境地，谈判还是进行得异常缓慢。只是在7月14日，即在差不多作了两个月的努力之后，伯尔切斯库才说服了匈牙利领导人在民族问题上作出重大的让步。科苏特和伯尔切斯库在塞格德(匈牙利政府这时已迁到那里)签订了两个文件：和解方案和关于成立罗马尼亚军团的条约。根据和解方案规定，在罗马尼亚人占多数的地区，他们可以在行政机关和法院里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语言，国家必须在这些地区创办用罗马尼亚语教学的学校。罗马尼亚的起义者获得大赦，应在两星期之内放下武器，然后再去保卫匈牙利的独立。这个条约有几条涉及到农民：立即免除他们一切封建义务，地主利用权力强迫农民接受的一切契约均属无效，非法强占的土地应予归还，被烧的村镇必须修复。

关于成立罗马尼亚军团的文件有一个引言，

其中载明两个民族“必须互相援助，在一个旗帜下共同战斗……捍卫自由”。这个条约证明，罗马尼亚民族和匈牙利民族的优秀之士没有被民族仇恨所迷惑，而是把光辉的革命理想置于一切之上；条约的结束语是这样一些美好的词句：“军团宣誓效忠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它担负着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义务，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去反对别的民族的民族权利，即要为捍卫原则而斗争，这些原则对军团和对勇敢而豁达的匈牙利民族都是非常珍贵的。”

在这个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罗马尼亚”这个专有名词，证明瓦拉几亚的爱国者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建立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

然而，协议达成的时候，匈牙利的革命已临近失败的时日了。阿夫拉姆·扬库对1849年8月3日（即在匈牙利军队于希里亚〔维拉戈什〕向沙俄军队投降前十天）来到他的兵营里的伯尔切斯库说，共同行动的时机错过了。他只答应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保持中立。由此可见，骨肉相残的战争是停止了，但罗马尼亚—匈牙利的联合革命阵线也没有建成。

特兰西瓦尼亚的运动具有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农民起义者进行革命民主主义的、反封建性质的斗争，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依靠这些农民，为争取民族平等而斗争；另一方面，许多罗马尼亚领导人对奥国皇帝怀着天真的信任也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罗马尼亚起义者对帝国军队在维护哈布斯堡王朝政权方面给予了有效的援助，指望奥国皇帝为了抚慰他们所遭受的牺牲将把他们从农奴制压迫下解放出来，给予罗马尼亚人以民族平等。在贝姆于特44兰西瓦尼亚取得了多次胜利和击溃了奥军以后，罗马尼亚领导人分道扬镳了。有些人(如扬库)摆脱了奥地利当局的监督，明显地左倾了，表示希望同匈牙利人达成协议。另一些人同奥军的残部一起跑到了瓦拉几亚，滑到反动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去了。

最后，必须指出，许多住在匈牙利、南布科维纳、巴纳特的罗马尼亚人，都积极地参加了革命。佩斯的国民议会中的罗马尼亚议员(民主主义者)顽强地进行了斗争，争取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成千上万的罗马尼亚人在革命军的队伍

中进行战斗。在贝姆的军队中有很多个营（第29、49、55、58、73营等）全是罗马尼亚人组成的。许多罗马尼亚人在同奥军一起被俘以后就转到了革命队伍一边。

但是，自然不能否认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哈布斯堡反动派利用了存在于奥地利的深刻的民族矛盾，用罗马尼亚人的民族运动来对抗匈牙利革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奥地利反动派——在历史上这是第几次啊！——以其忘恩负义而使全世界震惊。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依然没有民族权利，而奥地利以及后来的奥匈帝国始终是居住在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大监狱。

45

第二章　多瑙河两公国的统一，1864年的土地改革和争得民族独立

阶级力量的对比

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并不能阻挡历史发展的进程。争取资产阶级改革的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着。

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把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运动各个击破了。这是一次严酷的教训，但它并没有白白地过去。伯尔切斯库写道，革命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它是“在狭隘的范围内作为地方性的运动而发动起来的”。他对以前的，即1848年的“正义、博爱”的口号，又补充了新的一条——“团结”。关于建立一个较大的罗马尼亚国家的问题，已成为人民政治生活的中心任务。两个多瑙河国家——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

的统一，是议事日程上的首要问题。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强烈地要求统一。弗·伊·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要求有广阔的、联合为国家的统一地域，只有在这样的地域里，资产者阶级，——和它在一起的还有它的死对头——无产者阶级才能分别团结起来，消灭一切老旧的、中世纪的、等级的、狭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界限"。①

席卷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争取统一运动，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但是，这个运动是在参加运动的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进行激烈斗争和尖锐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其中每个集团都力图用自己的要求来影响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两公国以后的发展道路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46

对罗马尼亚农民来说，统一是同进行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同推翻万恶的农奴制和把土地分给农民联系在一起的。伯尔切斯库代表了农民的要求，号召举行起义来推翻封建制度。他痛斥康斯坦丁·罗塞蒂之类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妥协情绪，鄙夷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9页。

地称罗塞蒂为"浪漫主义者"，因为此人把革命描写成大家都受感动和互相拥抱的时代，并且相信，"只要发表几篇演说和打动人心的宣言，一切矛盾、反对派和失败的政党的仇恨，都会消失在长时间的兄弟般的亲吻中。"

然而，33岁的伯尔切斯库因患肺病而死于异乡巴勒摩，并同象他自己一样的那些穷人一起葬在一个无名的坟墓里。由于伯尔切斯库的逝世，争取罗马尼亚公国统一运动中的民主革命力量减弱了。不言而喻，这不仅是因为伯尔切斯库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退出了政治舞台，而更主要的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分散在成千上万家小工场里的手工业无产阶级，不是一股独立自主的力量，没有能力去领导农民，它只是在人民群众的洪流中参加了运动。因此，如果说，群众——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无产阶级——是争取统一的动力，那末，同自由地主结成联盟的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就是这一斗争的领导者。

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吸取了自己本国和西欧的阶级斗争经验，这时已经右倾了；它在世界上最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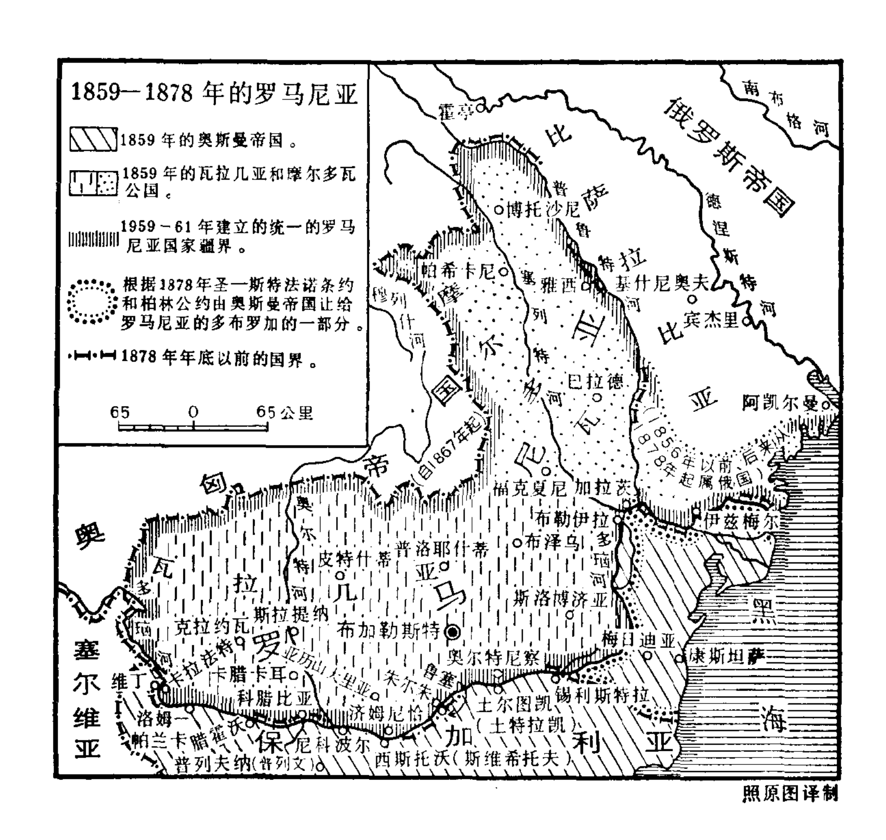
的就是革命烈火会侵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私有制原则。伯尔切斯库的一些战友放弃了革命活动。另一些人虽然还继续坚持民主信念，但在运动中已不起很大的作用了。

这时，在公国内部和在国外的流亡者当中，米哈伊尔·科葛尔尼恰努具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位学识渊博、很有教养的人，杰出的律师，著名的史学家，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拥护者。但就其观点来说，他是一个改革家。还在1848年事变以前科葛尔尼恰努就写道："……任何暴力的变革，任何突然的变化都只能产生不幸的结果。"他坚决主张进行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他说："根据我的信念，剥夺农民土地必然要使罗马尼亚面临可怕的灾难。"① 科葛尔尼恰努及其信徒，代表正在诞生的工业资产阶级和那些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优越性的地主的利益。

47

然而，大多数资产阶级和贵族并不赞成科葛尔尼恰努关于必须实行相当广泛改革的观点。他们当中有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扬·斯特拉特，忿忿地驳斥了说他们蓄意推翻现存制度的指责。他高

① 这里是指剥夺农民使用的土地。



1859—1878 年的罗马尼亚

声嚷道：“这是毫无意义的诽谤！”他写道：“所谓革命家并不是大多数欧洲国家所理解的那种革命家。他们的要求并没有超出每一个法治国家都存在的那些最起码的条件的范围，而如果把一切都闹得地覆天翻、本末倒置，那种情况也不是正常

状态”。

斯特拉特准确地表达了两公国里许多同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主要阶层血肉相连的革命领导人的观点，他们被1848—1849年的革命烈火吓破了胆，因而狂热地寻求同农奴主的妥协，变成了“尽可能”改革的拥护者。

有些流亡者不去开展广泛的争取建立罗马尼亚的运动，而是经常出入于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的政府办公厅，希望利用列强的分歧和竞争来浑水摸鱼，以取得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统一。他们这时慷慨地许下各种诺言。杜米特鲁·布勒蒂亚努答应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把两公国变成“一个富裕的谷仓，英国可以分文不花利用这个谷仓来供应自己，因为罗马尼亚人没有自己的工厂，将乐于用自己的农产品来换取英国的工业品”。扬·布勒蒂亚努（1821—1891年）向路易·拿破仑皇帝保证说，法国将在罗马尼亚拥有“殖民强国的一切特权而毋需为此付出代价”。

48

这一部分流亡者认为，他们同顽固派贵族的分歧是某种“家务事”，应当通过相互让步来解决；而他们自己的目的则希望在争取摩尔多瓦和瓦拉

几亚统一的斗争中来达到，而不靠“危险的”革命试验。这就为成立自由党奠定了基础。

大贵族的许多代表从自己方面来说也不反对和解、放弃某些中世纪的特权，如免税权，担任高级官吏的垄断权。他们懂得，在民族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如果谁要反对两公国的统一，那必将被指控为民族叛徒；因此，他们宁愿加入运动之中，从内部来影响运动。这一部分人是统一拥护者当中的保守派。不言而喻，他们同自由派的分歧，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消除①。但双方都竭尽一切努力，以便友好地解决分歧。自由资产者和地主为了表示“亲善”，干脆把这个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从争取统一的斗争日程上取消了。

在两公国里，分裂派的人数是不多的。他们是一些“大贵族”，高级官僚，同大公有密切联系的高利贷资产阶级的代表。统一会损害其利益的分裂派的人数，在摩尔多瓦比在瓦拉几亚多。新国家的首都将是迅速发展起来、处于商业交通要道的布加勒斯特，而不是小小的雅西，这一点也使惧怕

① 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详谈。

商业衰落的摩尔多瓦商人感到不安。许多贵族害怕异常庞大的国家机关将要缩减，瓦拉几亚人将把他们从收入优厚的差事中排挤出去。

然而，即使在摩尔多瓦，分裂派也始终是一个狭隘的小集团，他们主要是指靠国外强有力的支持。

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统一的准备工作

49

革命失败以后两公国处于厄运之中。只是到1851年占领军才离开了公国。但没过几年克里米亚战争又爆发了，多灾多难的公国又变成了战场。起初是俄国军队占领了公国。1854年，奥梅尔巴夏从南部侵入，不久以后，根据和伦敦、巴黎、伊斯坦布尔政府达成的协议，奥地利军队进入了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从各方面来看，奥军是真正准备在那里长期地扎下去。奥地利人急忙从布加勒斯特修筑通往本国边境的道路，着手加深多瑙河的航道，这条河上的航运也由奥地利公司经营，其利润由政府给予保障。维也纳的大银行以优惠的

条件贷款给准备在雅西和布加勒斯特修建房屋的奥地利臣民，而路特希尔德则对修建克鲁日—布勒伊拉铁路发生兴趣。奥地利宰相布奥尔得意洋洋地说："公国已是囊中之物"。维也纳的政治家们已在梦想把居住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罗马尼亚人同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联合"到一起了。

奥地利统治代替土耳其统治的严重威胁笼罩着罗马尼亚的土地。

当1856年2月俄、奥、土、英、法、撒丁和普鲁士的全权代表聚集巴黎的土伊勒里宫进行和平谈判时，局势就是这样的。对沙俄政府来说，和约条件是很苛刻的：它同意以缔约各国的集体"保护"来代替它自己对多瑙河两公国的保护。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禁止军舰通行。总之，俄国不得在黑海拥有舰队。它还被迫把比萨拉比亚南部让给了土耳其。

罗马尼亚的流亡者向巴黎和会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请求列强协助公国的统一。问题被列入议程并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奥地利和土耳其代表坚决反对统一。

哈布斯堡王朝担心，随着公国的统一它在这个地区的势力将迅速衰落。《敖德萨通报》在1859年2月12日写道："一个独立自主和强盛的国家……就会很容易砍断奥地利伸向多瑙河土地上的毒手"。下述的考虑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奥地利境内居住着200万以上的罗马尼亚人，他们遭受着残酷的民族压迫。一旦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建立起来，就会加强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对于统一的向往，从而对哈布斯堡王朝布头帝国①领地的完整就是一个现实的威胁。

土耳其全权代表的立场也是很清楚的。他们担心，强盛起来的罗马尼亚国家将迅速抛弃附属于奥斯曼帝国的桎梏，并给在名为土耳其欧洲领地的监狱里受苦受难的其它民族提供一个"有害的"先例。 50

英国外交人士在稍事犹豫之后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英国统治集团在同俄国争夺近东的势力范围时是依靠土耳其的。软弱的苏丹政权正便于英国人在奥斯曼帝国经济中主宰一切，使它债务缠身，强迫它接受奴役性的贸易条约。因此，伦

① 布头帝国是人们讥笑奥匈帝国的绰号。——译者

敦把支持土耳其领地“不可侵犯”的原则作为自己东方政策的基石，因而对于任何侵犯土耳其领地完整的行为都有强烈的反应。

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公国统一的战士面临着三个可怕的敌人。诚然，他们也有同盟者，但这些同盟者是动摇不定和不可靠的，并且是为了追求自私自利的实质上是侵略的目的的。因此，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是很艰巨的。

在巴黎会议上，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的全权代表赞成公国的统一，因为拿破仑希望在这个新国家里建立自己的势力，阻止沙俄政府向巴尔干渗透，同时也在这里排挤英国和奥地利。

沙皇的代表奥尔洛夫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彼得堡试图用武力确立自己在巴尔干和近东的势力遭到失败以后，只好同意放弃它对多瑙河公国和塞尔维亚的保护，但又惧怕它的老对手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过分加强，因而便狂热地寻求新的方式和方法来巩固自己已经动摇了的势力。所以，俄国外交部里的人又想起了在尼古拉时代早已忘记了的一个口号：解放遭受土耳其压迫的各族人民。不言而喻，既然沙皇政府打起保护基督教徒

的旗号，它就不能同时又反对罗马尼亚人要求统一自己土地的愿望。

所以，由于这些复杂和绝非大公无私的打算，彼得堡附和统一主义，因而它出席巴黎会议的代表奥尔洛夫和布鲁诺夫在原则上赞成建立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

会议确认了以前俄土条约中规定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自治权利。至于公国的统一问题，列强取得了妥协：决定在两公国根据等级代表制原则建立议会，议会将就两公国的国家体制问题表达居民的要求。这些要求应呈报巴黎条约参加国的特别委员会；后者应将它们汇报给列强以后将要召开的新的会议，由列强来决定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命运（其中包括它们的合并问题）。由此可见，"大国"把决定罗马尼亚人民未来命运的权利攫为己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国统一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是没有任何分歧的。 51

为了在两公国召开议会还需要克服不少困难。首先，在两公国里驻扎着奥地利和土耳其的占领军，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选举都会变成滑稽剧。对俄国外交当局来说，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

留在罗马尼亚土地上是它的眼中钉，在不小的程度上由于俄国外交当局的努力，奥、土占领军被赶走了。

但是，立刻又出现了另一种危险：苏丹土耳其向雅西和布加勒斯特委派了两个总督，他们极力阻挠公国居民把统一拥护者选入议会。摩尔多瓦总督尼古拉·科纳基—沃戈里德斯特别嚣张。他禁止举行示威游行，借口是所谓维护“社会安宁”。警察深夜闯进统一拥护者的家里，逮捕他们或把他们驱逐出首都。瓦拉几亚政府对胆小的选民极力进行恐吓，对贪财的选民则用贿赂和小恩小惠来诱惑，对爱好虚荣的选民则靠封官许愿和出卖贵族爵位把他们拉拢到自己一边来。为了把农民[①]引入歧途，政府的奸细在他们当中散布荒唐的谣言，说什么一旦两公国统一了，招收新兵的义务就会沉重得多。

争取两公国统一的战士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的统一拥护

---

① 按选举法规定，农民通过复杂的三级选举程序，有权选派几个代表参加雅西和布加勒斯特议会。两地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都是属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

者委员会巧妙地绕过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展开了广泛的宣传统一思想的工作。委员会的成份是很复杂的：参加者有保守派贵族、自由地主和资产阶级以及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委员会的活动中：在贵族的压力下，资产者从自己的纲领中撤销了内政改革问题，首先是土地改革问题。

与此同时，农村沸腾起来了。四乡不断传来农民拒服徭役和缴纳代役租的消息。另外，农民还实行怠工。因此，地主在绝望之中就急忙写呈文向当局申诉，说他们的庄稼熟了无人收割，谷物都落在地上了。许多农户再也无法忍受贵族的压迫，都背井离乡逃到国外去了。

地主们惧怕农民的不满情绪剧烈地爆发出来，所以极端反对在这样不安宁的时刻提起土改问题。著名的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史学家阿·德·克塞诺波尔写道："如果实现统一的事业将使地主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破产了的话，那末，地主们就准备使统一大业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事情陷入泥潭之中。"

统一拥护者把土地问题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 52

以后，就缩小了运动的基础，只限于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和揭露当局在竞选时玩弄阴谋诡计，同时还向列强——巴黎条约参加国发出许多呼吁。

摩尔多瓦的局势特别紧张，在这里，统一拥护者由于确信抗议是徒劳无益的，因而宣布抵制选举，博得了选民的广泛响应。当局所面临的任务是相当困难的：要保证哪怕是有限的人数去参加投票。没有选民是不能进行选举的！

警察挨户找人。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警察把病人直接从床上拖到投票处。反抗者则遭到毒打，而特别顽强的人则被关进监狱。在多罗霍伊城，警察看到选民们都各自东西溜掉了，就闯进小酒馆里，把当地爱喝酒的人拉到段上去。统一拥护者抱怨说，即使在土耳其人统治的最悲惨的时期这样的胡作非为也未曾有过。由于演出了这样的选举丑剧，1857 年 7 月 19 日，雅西的以分裂主义者占多数的听命于总督的议会总算是选出来了。但它始终也没有召开。

统一拥护者以十倍的努力开展抗议运动。局势紧张到这种程度，看来马上就要爆发革命了。法

国驻两公国的代表塔勒朗写道："如果'迪万'[1]能够组成，那末起义就不可避免了"。

法国、俄国、普鲁士和撒丁政府不能容忍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势力加强，同时也惧怕罗马尼亚土地上爆发革命，于是就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它们要求取消摩尔多瓦伪造的选举结果并进行新的选举，而在遭到土耳其拒绝之后，便同伊斯坦布尔断绝了外交关系。围绕着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统一问题的斗争是如此尖锐，结果引起了严重的国际危机。

1857年8月，在英国的一个疗养小城奥斯博纳（在怀特岛上），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同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更确切地说，是同她的大臣们）就多瑙河公国问题进行了勾结，不言而喻，这种勾结当然是靠牺牲罗马尼亚人民利益的。伦敦政府同意"劝说"苏丹取消摩尔多瓦伪造的选举结果并规定重新选举。法国统治者作为回报，则答应实质上是停止对统一拥护者的积极支持。

土耳其政府立即听从了伦敦的"劝告"；非法

[1] 由于议会是根据苏丹的命令召开的，所以称为"迪万"。土耳其文"迪万"就是会议。

Adȣnarea Ad-хок a Moldovei, пъшindȣ пе калеа че i с'aȣ прескрісȣ de кътръ Tрататȣл de Парісȣ, adекъ ꙟнчепъndȣ a *рості dорінцеле цeрii*, —ꙟn фаца лȣi Dȣmnezeȣ шi a оаменiлорȣ, ꙟn toatъ къръцъniea кȣџetȣлȣi, неavindȣ ꙟn прiвire de кitȣ drептъріле шi фолосȣл нацiei роміне, деkларъ къ челе intъi, челе mai mapi, mai џенерале шi mai нацiонале dорiнцi але цepii сinтȣ:

I.

Респектареа dрепtъpiлорȣ Прінчіпателорȣ, шi ꙟndeoseбi a Aȣtonomiei лорȣ, ꙟn кȣпрindереа вekiлорȣ лорȣ Капiтȣлацii, ꙟнкеiate кȣ ꙟnалта Поартъ ꙟn anii 1393, 1460, 1511 шi 1634.

II.

Ȣnipea Прінчіпателорȣ ꙟнtр'ȣнȣ сінгȣрȣ Statȣ сȣб нȣme de РОМꙟNIEA.

III.

Прінцȣ стръinȣ кȣ моштенipea tpонȣлȣi, алесȣ dintр'о dinaстie domnitoape de але Eȣропеi, шi ai кърȣi моштенітopi съ фie кpескȣцi ꙟn pелiџiea цeрei.

IV.

Neȣtpaлitatea пъmꙟntȣлȣi Прінчіпателорȣ.

V.

Пȣтереа леџiсlatoape ꙟнкреdinцatъ ȣнei обштешti Adȣнъpi, ꙟn кape съ фie pепpезentate toate intepeceле нацiei.

Toate ачесте сȣб гаранціа колекtiвъ a пȣтерiлорȣ кape aȣ сȣбскрiсȣ Tpatatȣл de Парiс.“

Дȣпъ четіреа ачестеi пропȣнерi шi depȣнереа ei пе бірoȣл Презідентȣлȣi, D. Константinȣ Хȣpmȣzaki се сȣie пе tрібȣнъ шi о спpіжineштe.

(Везі Анекса Літера А).

D.лȣi Логофътȣл Алекȣ Балш се ꙟнаintеазъ спре бірoȣ шi depȣне о хъртie сȣбскрiсъ de D.лȣi шi de Преа сфінціа са Локотенентȣл de Eпіскопȣ de Романȣ

摩尔多瓦非常议会关于两公国统一和改革国家体制的决议原文。1857年。

的选举结果被废除了，而在第二次选举时（1857年9月），统一拥护者简直使自己的政敌一败涂地；在瓦拉几亚议会中，他们也取得了压倒的多数。这样就为讨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未来国家体制问题创造了条件。 54

1857年9月着手工作的两地议会要求尊重公国的自治，把两公国统一成一个国家，名为罗马尼亚；邀请外国王子担任罗马尼亚大公；宣布两公国领土中立；把立法权集中到国民议会手中，后者应代表"全民族的各方面的利益"。

摩尔多瓦议员克·胡尔穆扎基表达了在议会中开会的地主和资本家的期望，他宣称："统一产生力量，力量保障安全，安全导致信任，信任鼓舞并发展贸易和文明。"

资产者和同他们联合行动的大地主面临着两个任务：发展经济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即加强自己的阶级统治。他们极力避免讨论全国大众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运动分裂，使地主同农民之间的矛盾达到极端尖锐的程度。但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摩尔多瓦议会中为数不多的农奴代表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这是罗马

尼亚历史上有关农民痛苦命运的最杰出、最光辉的文献之一。这些议员们指出："我们缴纳大量的人头税；只有我们出人去当兵；只有我们养活着警察局长、法官、狱吏和宪兵，只有我们修筑道路、桥梁和公路"，但"被出卖的只是我们，只有我们吃那种浸透着我们血泪的发苦的黑面包；也只有我们遭受毒打……"。农民们写道："我们整年劳动着，从春天干到秋天，从初雪干到严寒……大家都服徭役"，大家都为地主干活。而自己家里田园荒芜，地里成熟的庄稼也霉烂了。

农民代表要求废除徭役，分配土地，实行所得税，以便不要象过去那样，贵族分文不交，而农奴则被国家和乡里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议会中开会的贵族对农民代表横加指责，无所不用其极——又说他们企图破坏社会安宁，又说他们极力煽起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分歧（好象这种分歧本来不存在似的！），甚至还说他们有"共产主义"倾向。

农民的提案没有得到必要票数的支持，因而被否决了。

在瓦拉几亚议会中，地主们利用农民代表的

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两公国统一的愿望，说服了他们暂时不提出自己的要求。



瓦拉几亚的非常议会，前排是穿着民族服装的农民。

在两地议会确定了它们的要求以后，争取罗马尼亚人统一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里我们指出，巴黎条约参加国当中那些冒充罗马尼亚人“保护者”的人，把最后决定两公国命运的权利攫为己有。因此，雅西和布加勒斯特议会的要求，就成了1858年5月10日专门在巴黎召集的一次会议的讨论主题。

55

1858 年 8 月 7 日公约

七国的全权代表力求调解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舌剑唇枪斗了三个月。最后签订了一个文件，名为 1858 年 8 月 7 日公约。

公约在罗马尼亚走向统一的道路上只是前进 56 了一小步。按公约规定，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拥有自己的立法机关，保留大公、政府和武装力量。只是成立了一个职权非常有限的联合中央委员会①，一个共同的上诉法院，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被命名为“联合公国”。实权仍保留在两个政府手中，而不是在联合机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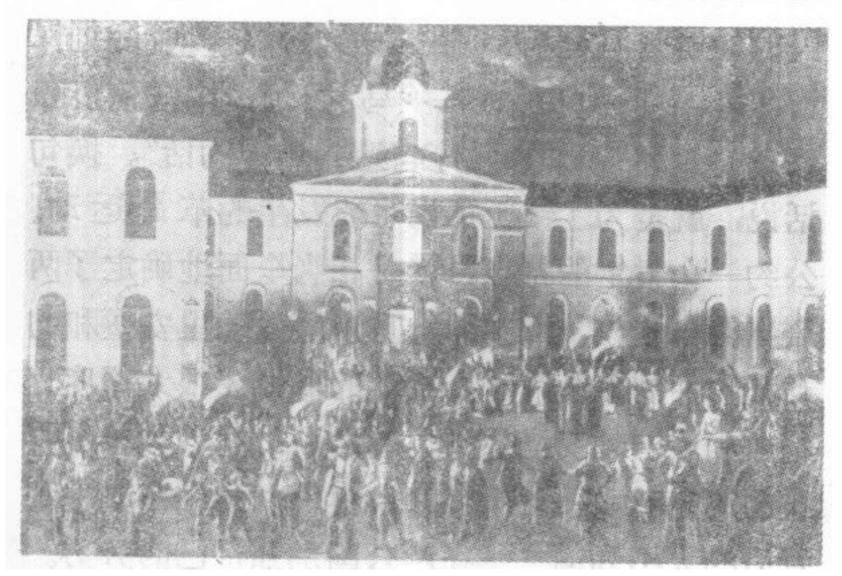
公约宣布废除贵族的中世纪特权，以前国民议会选举中的等级制度被财产限制代替了。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 500 万居民中，只有4,000人有选举权，当选议员的都是最有钱的人。受压迫的农奴的命运并没有引起集会于巴黎的列强代表的同情。他们仅仅以最一般的形式表示赞成改善农

① 联合中央委员会只能制定共同的法律草案。草案应分别交给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议会通过，并分别由两个大公批准。

民的处境。但是，他们根据相互协议，却精心地保留了公国"保护者"进入罗马尼亚土地以"恢复秩序"的"权利"，"如果秩序将遭到破坏的话"。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镇压那里可能发生的革命运动。公约一个肯定的特点，就是相当全面地确定了两公国的自治权，即基本上重申了阿德里安堡和约及其附件的条款。这个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外交当局努力的结果，后者力求阻碍自己的老对手——土耳其、奥地利和站在奥地利背后的大不列颠——在两公国加强自己的势力。

亚历山德鲁·扬·库扎在两公国当选

统一运动领导人指靠大国帮助的期望没有实现。在两公国里斗争仍继续着。现在，进步力量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把自己的拥护者选上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的大公宝座。这一次同1857年比较，情况改变了：摩尔多瓦反动派还未能从它过去所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因此统一拥护者比较容易地就实现了自己的意图。选上大公宝座的是



克拉约瓦城为庆祝统一而跳起霍拉舞
（摩尔多瓦的民间圆舞）。——画家蒂·阿曼画。

1848 年事变参加者、争取两公国统一的彻底而坚定的战士、在反对沃戈里德斯运动中起了显著作用的亚历山德鲁·扬·库扎上校（1820—1873年）。米哈伊尔·科葛尔尼恰努发表了态度鲜明的、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的演说来祝贺库扎当选。他说："你的使命是伟大而美好的，你要用法律来代替恣意专横行为……首先对于那些以前遭受所有大公压迫的人要仁慈，要行善。"居民欢欣鼓舞地祝贺库扎。一万人聚集在雅西大街上，等候着议会的

投票结果。当选举揭晓时，全城欣喜若狂。“接连 57
四个晚上全城都布置着彩灯，在400—500支火炬的照明下，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参加者都祝贺大公……”。

瓦拉几亚的事态发展是另一个样子。正是在这里，国内外反动派决定进行战斗。在负责选举新大公的准备工作的总督府中，最顽固的反动分子占多数。统一拥护者开始遭到镇压。摧残报刊、试图限制议会的权利、行政当局滥用职权、伪造选票——所有这一切使人想起沃戈里德斯在摩尔多瓦统治时的劣迹。列强在巴黎会议上所制定的选举法不仅使农民和小市民不能参加选举，而且也使中等资产阶级没有选举权；统一反对者就利用这种选举法取得了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反动派事先就扬扬自得，他们之间只是在一个问题上没有 58
达成协议，即在以前的大公中，现在究竟把谁，把格奥尔基·比贝斯库还是把巴尔布·什蒂尔贝伊送上大公的宝座。

但是，这些打算被人民推翻了。统一拥护者的代表事先就走遍了郊区的村镇，因而农民都涌进了首都。1859年1月22日，即在国民议会开幕

之日，布加勒斯特沸腾起来了。二万人（几乎占全城居民的四分之一）——手工业者、店员、小商人、学生以及加入他们行列的农民——聚集在作为国民议会会场的总主教教堂周围。反动的议员们怀着恐惧的心情从咄咄逼人的人群中挤过去了。

在议会开幕后不久，人民就冲进了教堂。主持会议的总主教要求人们退出会场，但谁也不听他的话。到傍晚时局势更紧张了。当局试图使用武力，一营步兵被调到总主教堂，但士兵们拒绝开枪。

1月23日，被人民群众密密麻麻地包围着的国民议会继续开会。法国领事贝克拉向本国政府报告说："有些议员惊恐万状。'打倒暴君！'，'自由万岁！'的呼声传到了会议厅。"在总主教教堂的台阶上，制革工人在示威性地磨刀。

在这样的局势下，人们产生了一种想法：选瓦拉几亚大公不要局限于只从当地公认的统一拥护者当中推选，干脆就选亚历山德鲁·库扎担任大公，把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权力集中于他一人之手，从而实现两公国的统一。其同时代人非常肯定地证明，早在1月23日人民当中就在谈论这

件事情。

1月24日凌晨，统一拥护者向国民议会中的政敌提出了这个方案，吓破了胆的反动派同意了。奥地利领事埃德尔写道："他们害怕，如果不同意合并，就不能活着离开会场。"64名议员全都投票选举了库扎。

统一就这样实现了。

1月24日晚间，布加勒斯特举行了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火炬游行队伍象无穷无尽的洪流向前涌进。市民、农民、商人、士兵都来庆祝统一的罗马尼亚的诞生。

人民对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统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只是依靠人民的积极性和自我牺牲精神才粉碎了反动派的计划。

库扎被选为两公国的大公这一事实，在特兰西瓦尼亚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它促进了这个地区罗马尼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加强。

统一的完成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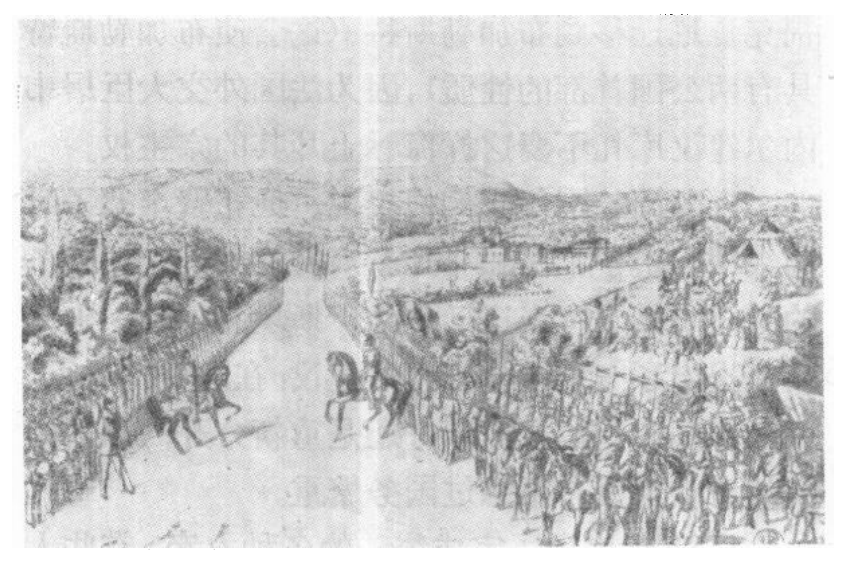
罗马尼亚外交当局面临着一个艰巨任务：不

仅要迫使“欧洲列强”承认它的已被容许的“自主”的事实，而且要把体现在亚·扬·库扎大公个人身上的联合变成两个国家的巩固的统一。

外交当局由于得到公众的支持，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即使欧洲最顽固的反动分子也不敢出面反对所有罗马尼亚人几乎是一致的愿望。米哈伊尔·科葛尔尼恰努说：“我们是生活在十九世纪，这时对待各族人民已不能象对待一群绵羊那样任意宰割了，这时人民的鲜血已不能象野蛮时代那样轻易地白流了”。在列强仓卒召开的新的会议上马上就看出，法国、俄国以及倾向于它们的普鲁士和撒丁是无意反对库扎当选的。相反的，另外三个国家——奥地利、土耳其和英国则怀着不可调和的情绪，要求号召摩尔多瓦人和瓦拉几亚人“遵守秩序”。会议的工作很快地就由于与会国之间爆发的战争而中断了。法国和撒丁使奥地利遭到惨重的失败，地图上出现了一个新国家——意大利。很明显，这就大大地削弱了反对两公国统一的人的立场。库扎本人的行动也是坚决的。他借口加强摩尔多瓦和

瓦拉几亚军队的战斗友谊，把大量的兵力集中在普洛耶什蒂。显然，他是准备对干涉者进行武装反击的，而在“保护者”当中也还没有愿意侵入两公国的人。1859 年 9 月，土耳其帝国政府提出许多保留条件，同意作为例外批准库扎当选为两公国的大公。罗马尼亚国务活动家所面临的许多任务当中的第一个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军队在统一的边界上会师。1859 年。

在布加勒斯特，人们力求在举行授职典礼时着重强调两公国要求独立自主的愿望。典礼仪式非常简单。库扎几乎是在一个空洞无物的大厅里

接见了土耳其的两个使节。他没有象惯例所要求的那样去吻苏丹的敕令。后来，罗马尼亚人又争得了一个胜利：由一个使节代表两公国常驻伊斯坦布尔。库扎向奥斯曼大臣们证明说，如果要两个外交官来行使一个大公的意志，那是很荒谬的。此后，库扎在节约经费的借口下，把两军的司令部和军需处合并到一起，但他未能把中央委员会从福克夏尼迁移到布加勒斯特（这会使布加勒斯特具有两公国首都的性质），因为法国外交大臣屠韦内尔建议库扎不要这样侮辱土耳其的宗主权。

大公向外国领事们抱怨说，他花费半辈子时间来回奔走于雅西和布加勒斯特之间，管理国务的时间不够了。当这话传到伊斯坦布尔时，土耳其人提出了一个阴险狡猾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最好还是重新分开；以前的统治者从来没有报怨过国务繁重。

60

1861年出现了完成统一的各种方案。有些人建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国民议会的联席会议以便讨论土地问题，并在这里宣布统一。另一些人则建议“压一压”年轻的苏丹阿卜杜勒—亚齐兹，也许新皇帝要比老皇帝好说话

一些。法国领事普拉斯则主张在路易·拿破仑生日那天宣布成立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在他看来，那时深感愉快的皇帝就会成为罗马尼亚人的靠山。

库扎和他的顾问们由于怕引起国际纠纷，犹豫不决。

然而，列强不能使早已成熟的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不决。在两公国里，不满情绪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不要“保护者”的任何批准而实现完全统一的“威胁”已变成十分现实的事情。1861 年秋[61]天，列强代表召开了新的会议（这一次是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以讨论库扎在一年以前提出的关于完成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统一以及扩大选举权的备忘录。在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之后，土耳其政府作了让步。库扎从自己方面来说也把关于修改选举法问题从议程上撤销了。

1862 年 1 月，统一的国民议会在布加勒斯特开会。一个名为罗马尼亚的新国家的存在已经是事实了。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罗马尼亚的地主和资产者幻想着，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统一之后他们就可以"平安无事地"剥削这个国家了。但这种期望是注定不能实现的。国内的农民革命成熟了。在长期等待中痛苦地感到失望的农村骚动了。拒服徭役和不服从当局的事件层出不穷。1859年，守边防的农民举行起义，他们不满的是没有免除徭役；与此同时，贝兹迪亚德村（丹博维察县）的居民也奋起斗争；1862年1月，普拉霍瓦和伊利福夫两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一万农民在瓦拉几亚前国民议会议员米尔恰·马拉埃鲁的率领下，向布加勒斯特进军。这次进军的参加者威胁要砍断"吸血鬼"的喉咙。讨伐队残酷地镇压起义者。但事情很明显，用这类办法既不能解决土地问题，也不能阻止农民运动。接着在1863年，科梅内什蒂村（巴克乌县）和贝列什蒂村（多耳日县）又发生了暴动。

1864年，丹博维察、特库奇、伊利福夫三县都发生了农民暴动。

在这个时候，统治集团中由于土地改革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因为要把土改问题束之高阁简直是不可能的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要求取得妥协的愿望，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是完全和睦无事的。相反的，却有着尖锐的冲突，不过其特点在于，敌对双方都极力"不使家丑外扬"，并不要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不要农民参与冲突。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进入了频繁更换政府的时期。

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死刑和体罚的法律，宣布了出版、集会和人身自由，住宅不可侵犯，施行普遍免费的初级义务教育原则①，但在土地问题上无论如何也不能达成协议。

以巴尔布·卡塔尔朱为首的大贵族准备"解 62 放"农民而使他们失去土地，换句话说，即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强迫无地农民接受甚至比"组织法"条款还要苛刻的租佃条件。卡塔尔朱所作的"最大让步"，就是从国家和教堂地产的总额中分出一些小片土地卖给农民。

米哈伊尔·科葛尔尼恰努是从另一种立场发表言论的。他严肃地警告自己的政敌说："如果使

① 必须强调指出，这些法律大部分都是一纸空文。

罗马尼亚农民丧失土地，那就必然要发生可怕的灾难。”然而，赞成他的思想的，只是还很软弱的工业资产阶级的个别代表和少数地主——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拥护者。农民在国民议会中没有发言权。

以扬·布勒蒂亚努为首的自由党未来的领袖们和了“稀泥”，——他们一方面怕触怒有势力的大贵族，另一方面又怕煽起农民起义的烈火，因而建议延期解决问题。

制定土改方案的工作持续了三年。最后在1862年贵族终于向国民议会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规定，以前的农奴只能赎买宅边的地段，贵族们以无比伪善的态度硬说，这将形成一个自由的、权利平等的人的阶级，他们将自己安排自己的事务，同地主就租佃耕地和牧场进行“友好的”谈判。正如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少数议员之一科斯塔凯·科斯塔凯斯库在辩论中所公正地指出的那样，以前的农奴只得到一种权利——饿死。

米哈伊尔·科葛尔尼恰努对这个苛酷的法案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声明，他将反对这个专制

的、蕴藏着“暴动”的方案。他向自己的反对者证明说，在农民丧失了土地并“被降低到无产者甚至隶农水平”的国家里，共产主义思想和破坏性思想比在任何地方产生得都快。

科葛尔尼恰努建议贵族们看看邻邦俄罗斯，了解一下那里在1861年所进行的改革。他这样来说服国民议会中的贵族多数派：“先生们，这就是现成的决定，这就是符合我国经济条件的法律……。”“我为我国农民所提的要求……并没有超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俄国贵族给予农奴的东西……，你们可不要说，我是在要求采取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措施；我要求作出就象欧洲一个最保守国家所通过的那样的决定……。”演说人这么高度地评价俄国1861年的改革，表明他的确是距离“破坏性思想”很远的。但是，科葛尔尼恰努虽然极力证明，要剥夺农民土地就等于自杀，但他的一切努力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罗马尼亚贵族把自己描绘成拉丁文明在东欧的传播者，而实际上却比俄国农奴主还反动。这时担任首相的巴尔布·卡塔尔朱则攻击科葛尔尼恰努。他把科葛尔 63
尼恰努的建议——农民赎买土地——称为鸽首蛇

身的怪物。他认为这个建议的出现是受了一系列“骇人怪物”的影响，如来喀古士①、格拉古兄弟②、托马斯·摩尔③、康帕内拉④、圣西门⑤、再洗礼教徒⑥等等；他大声疾呼要求以“渴望自由、统一和

① 来喀古士(Ликург)，古希腊城邦斯巴达的立法者，约生于公元前九世纪。他改革法律，厉行尚武教育，促进了斯巴达的强盛。——译者

② 格拉古兄弟(Гракхи)，蒂伯里·格拉古(公元前163—132年)和盖伊·格格古(公元前153—121年)，兄弟二人都是古罗马奴隶制时代的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公元前133年和123年，二人先后被选为罗马护民官，都曾试图进行一些改革，结果失败。——译者

③ 托马斯·摩尔(Томас Мор〔1478—1535年〕)，英国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所著《乌托邦》(1516年)一书中，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主张实行公有制。但他未提也不可能提到建立这种社会的正确方法。——译者

④ 康帕内拉(Кампанелла〔1568—1639年〕)，意大利思想家，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一。他在名著《太阳城》一书中，反映了当时意大利人民群众力图摆脱剥削、压迫的愿望。——译者

⑤ 圣西门(Сен-Симон〔1760—1825年〕)，法国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尖锐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力求论证新社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但他主张仍保留私有制，并且不了解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因而也看不见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译者

⑥ 再洗礼派，十六世纪德国、瑞士、荷兰的平民宗教派，反对教会等级和圣礼的形式主义，实质是农民采取宗教形式反对封建压迫。——译者

建立友好契约制度的”大地主的温和态度来对抗“赤色分子（即科葛尔尼恰努）的肆无忌惮行为”。不久以后，巴尔布·卡塔尔朱被刺身死，从而使局势更为紧张。国民议会以62票对35票通过了贵族的法案。

但是，赞成科葛尔尼恰努观点的大公库扎，懂得利令智昏的地主所制定的这项法律的全部危险性，因而拒绝签署这一法律。而一年以后，到1863年10月，库扎任命科葛尔尼恰努为首相，后者立即着手实现他早已考虑成熟的改革。

首先，他通过了关于把教堂土地收归国有的法律。由于两公国将近四分之一的土地是属于教堂的，所以这个措施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后，瓦拉几亚的国有土地面积增加了四倍，指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贵族们乐于支持这项法律，希望首先把国家土地分给农奴，而他们自己的地产将原封不动。

贵族们对待科葛尔尼恰努所提出的土改方案的态度则是另一个样子。季米特里·吉卡公爵在代表国民议会多数派发言时，把这个方案称为“挑拨者的”方案，“发动内战的”方案，并且流着鳄鱼

的眼泪抱怨说，贵族们将无法“养活自己的家小了”。扬·布勒蒂亚努代表着首先渴望同贵族妥协的资产阶级的意见，指责科葛尔尼恰努，说他“正在把国家推入深渊之中”。国民议会的大多数议员投票表示不信任内阁，然而库扎拒绝接受内阁辞职。1864年5月2日，国民议会再次拒绝同科葛尔尼恰努一道工作。这时科葛尔尼恰努从坐位上站起来，试图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大公关于解散国民议会的法令。但在议会中开会的反动分子们震耳欲聋的喊叫声中，他的声音无法听到。科葛尔尼恰努深信，要用大声喊叫去压倒兽性大发的“人民代表的”声音是完全徒劳无益的，因此便把大公的法令交给了议长，离开了议会。

1864年的政变

就在这一天，库扎发表了告人民书，书中谴责“叛乱的寡头”妄图剥夺300万农民的土地，并建议人民赞同降低财产限制的新选举法和国家体制64中旨在加强个人权力的若干改革。全国举行的公民投票结果是大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一次政变

就这样完成了。

新成立的政府在科葛尔尼恰努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土地法；1864年8月14日库扎在土地法上签了字，于是法律开始生效。

农民解除了为地主履行的封建义务，交付赎金而获得了土地。土地面积以农民拥有的牲畜多少为定。①

	农戶数以千为单位	占农戶总数的%	土地面积千公顷	占总面积的%	每戶平均公顷
富裕农民（有4头或更多耕畜和1头乳牛）	71.9	15.4	413.2	24.4	5.7
中农（有2头耕畜和1头乳牛）	202.1	43.2	882.7	50.0	4.4
贫农（有1头乳牛）	134.1	28.7	384.7	21.8	2.9
只得到宅边地段	59.7	12.7	85.6	4.8	1.4
	467.8	100	1766.2	100	3.8

① 恩·伊·弗罗洛夫：«地主资产阶级罗马尼亚的土地关系»，载«基西尼奥夫农业研究所丛刊»(Аграр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буржуазно-помещичьей Румынии.——«Труды Кишиневского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基西尼奥夫1958年俄文版，第17卷，第34页。

首先必须指出，约有15万户农民，即占农户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各种各样的借口下根本没有列入“分地者”名单之中。贵族土地只划分出120万公顷，即不到地主所占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其余土地都是从国家地产中拿出来的。鉴于每一个富裕农民还要向贵族缴纳1,500列伊的赎金，中农交纳1,100列伊，贫农交纳800列伊，所以问题很明显，只是地主的贪得无厌才促使他们叫喊什么自己是“受委屈了”。

尽管这个改革具有局限性，土地改革还是为农业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前提。农民起初是欢迎改革的，认为他们将成为自己土地的独立的主人。但他们的幻想很快地就破灭了。

在那时罗马尼亚实行粗放耕作的条件下，农民经营独立自主的经济至少需要5公顷土地。他们需要这么多土地以养活家小，保证牲畜的饲料，65 同时还出卖一部分粮食以便向国家和乡公所① 缴

① 罗马尼亚在行政区划方面划分为县（由县长领导），区（由区长领导）和乡。在农村地区乡由几个镇和村组成。居民选举以乡长为首的乡委员会。

税，买些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如果我们看一看上面的统计表，那么就会发现，在以前的农奴中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即富裕农民得到了这么多土地。其余的人则都土地不足。

还必须考虑到一个情况。按以前实行的封建惯例，农民的儿子在结婚以后就同父亲分家，单独安排自己的经济。地主给他土地。现在地主认为自己不受这个义务约束了。因此农民便面临着这样的前景：要无限地分割他们本来就不够的土地，这样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就有从缺少土地变为绝望的饥饿的危险。[66]



罗马尼亚第一个大公亚历山德鲁·扬·库扎。

以前，农民是在森林里打柴砍草。在已经来到的“自由”的条件下，农民也丧失了这个权利，森林变成地主发财致富和压榨农民的又一个补充

手段。

农村里的“自由生活”是这样开始的：从农民那里不仅割去了很大一部分以前归他们使用的土地，而且分给农民的都是离村庄很远、很不方便、贫瘠低产的坏地。这一切就象不久以前俄国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在那里根据 1861 年的改革，“农民搬到‘沙地’上去了，而地主的土地却象楔子一样插在农民的土地中，这样就可以使高贵的贵族们更容易奴役农民，用高利盘剥的价格把土地租给他们”。[①] 在罗马尼亚也和在俄国一样，农民“仍然是‘下贱的’等级，仍然是纳税的愚民、黑骨头[②]，仍然受着地主委派的地方官的嘲弄、敲诈、勒索、鞭笞、殴打和侮辱。”[③]

农民们还没有来得及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做主”，就遭到深重灾难的袭击。1865 年是个大旱之年，土地几乎籽粒无收，最可怕的饥荒开始了。要饭的人成群地涌进城市。绝望的人们在黑夜里出来行劫。饥民的暴动遭到讨伐队的残酷镇压。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103 页。

② 在古代俄国，黑骨头指平民，白骨头指贵族。——译者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71 页。

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地破坏了库扎的地位。半途而废的改革既激怒了地主，又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国家的改革代价昂贵。中小资产阶级不满沉重的捐税负担，怨声载道。大公公然表明的要建立个人政权的愿望，使以康斯坦丁·罗塞蒂为首的自由主义者当中的激进派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因此，库扎便没有了牢固的社会支柱。有利于反动派玩弄阴谋诡计的条件形成了，于是反动派便着手准备政变。1866年2月11日凌晨，一群阴谋分子冲进了大公的卧室，强迫他在退位书上签字。库扎被放逐了。

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领导人掌握了政权，这个联盟史称“怪诞联盟”①。联盟的下一个步骤，就是把普鲁士王室的旁系后裔，卡罗尔·霍亨索伦·济格马林根亲王弄到罗马尼亚来，此人露骨的反动性，使摆脱了库扎这样一个“危险的”(在他们看来)改革家的罗马尼亚新统治者感到很满意。

---

① 以后“怪诞联盟”这个名词不仅用来确定推翻了库扎的那个集团，而且意义更广，用来表明统治罗马尼亚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特殊联盟。

67　同年颁布了"农业契约及其履行法"，以调整大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而地主则称农民为"自由的"和"平等的"人，这真是对常识的讽刺。

由于缺少土地，农民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每年早春时节，成群的人就来到地主的庄园里，恭恭敬敬地请求地主把土地租给他们。在罗马尼亚，列宁称为工役制的农业经济制度很流行，农民用自己的耕畜和农具耕种地主的土地。可怕的贫困状态迫使农民同意最苛刻的条件。地主不愿去经营资本主义经济，因为那样做就要有价格昂贵的机器、大牲口、肥料，雇用"自由的"劳动力。地主占有土地，并且分文不花就获得大量的收入，因为农民除了服工役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工役制"这种剥削的基础不是使工人同土地分离，而是强迫破产农民固守土地，这种剥削的基础不是私有主的资本，而是他的土地，不是大地产占有者的农具，而是农民的旧式木犁，不是耕作文化的进步，而是许多年来的因循守旧，不是'自由雇佣'，而是高利贷的盘剥。"①

根据法律规定，农民只能向"自己的"地主租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33页。

地，并只能受雇于他。在农民不遵守自己所承担的奴役性义务时，地主可以求助于乡长、小警官和宪兵。这些人要强迫农民为地主干活。

但是，为了保证农民服从大地主，这还显得不够。因此，1872年又通过了一个新的农业契约法，规定当局必须捉拿违约者，把他们扣押起来，在武力威胁下强迫他们劳动。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两公国的统一促进了国内市场的扩大；1864年的土地改革强有力地破坏了农村的封建关系，使农村出现了自由劳动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农奴制残余一直存在到罗马尼亚建立人民民主制度时为止。

但在罗马尼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还有一个严重的外部障碍：依附于土耳其。罗马尼亚每年要向伊斯坦布尔纳贡将近一百万列伊。国内反动派经常得到苏丹宫廷的支持，对土耳其的依附关系特别加强了保守派地主的势力。土耳其帝国的贸易条约也扩大适用于罗马尼亚，罗马尼亚被束

68

缚在奥斯曼帝国的关税体系上，这就使它的工业不可能有什么显著的发展。土耳其帝国深陷在对西欧强国的半殖民地依附的漩涡之中，使自己的附属国也跟着受累，它们无权利用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本国工业还很软弱的幼芽，使其免于外国的竞争。所以，继续保持同土耳其以前的关系，只能使罗马尼亚的经济落后状态永远保存下去，作为欧洲大国的农业附庸而碌碌无为。

因此，两公国的统一就把争取独立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罗马尼亚政府利用各种方便的机会，以掐断把它同土耳其联系在一起的那根线，推行一种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欧洲局势总的来说是有利于此的："保护者的"宫廷忙于相互之间的纷争。战争接连不断地发生：1864年普、奥同丹麦打仗，1866年是奥普战争，1870—1871年发生了普法战争，俾斯麦用"铁和血"实现了德国的统一。臭名昭著的"欧洲均势"遭到了无可挽回的破坏。沙俄政府利用法国的溃败，以摆脱克里米亚战争后强加于它的最苛刻的和约条件。俄奥在巴尔干的竞争没有停息。软弱无力的土耳其帝国政府，由于

得不到任何方面的坚决支持，也不敢诉诸武力来制服布加勒斯特的“擅自独行”。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罗马尼亚政府在关税问题上争得一定的独立自主，同一些强国签订了邮政、电报和贸易协定①。1869年同俄国签订的以平等和互利原则为基础的领事协定是第一个外交协定，具有重大的意义。罗马尼亚的代表——暂时还在事实上如此——获准访问了一些国家的首都。所有这一切都是同土耳其帝国的一个附属国地位不相符合的。布加勒斯特显然是要通过外交途径来争取承认罗马尼亚的独立。但是，所有的强国，甚至总的来说对巩固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表示同情的俄国，都不同意给予坚决的支持。情况越来越明显，通过谈判的途径是不能得到任何超出治标范围的东西的。独立不可能谈成，而必须用战斗来争取。

准备战争 69

1875—1876年，有利于罗马尼亚独立的局势

① 同俄国签订的电报协定是其中的第一个协定。

开始形成。这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人民举行起义，反对外族的压迫，而黑山国和塞尔维亚也对奥斯曼帝国宣战。然而，这时马上就发现，在罗马尼亚的统治集团中，只有以科葛尔尼恰努和康·罗塞蒂为首的少数人坚决主张拿起武器来争取独立。

无论是保守派或是自由派地主的立场都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因为他们知道，战争将受到人民的欢迎，农民不认为实现独立纯粹是一种政治行动，而是把独立同给予他们土地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

毫无疑问，公国的资产阶级是希望结束对土耳其的依附关系的。但大部分资产阶级都是商人，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同地主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为了争得独立也不愿牺牲同地主的联盟。只有暂时还软弱的工业资产阶级、城市下层人民和农民准备为独立而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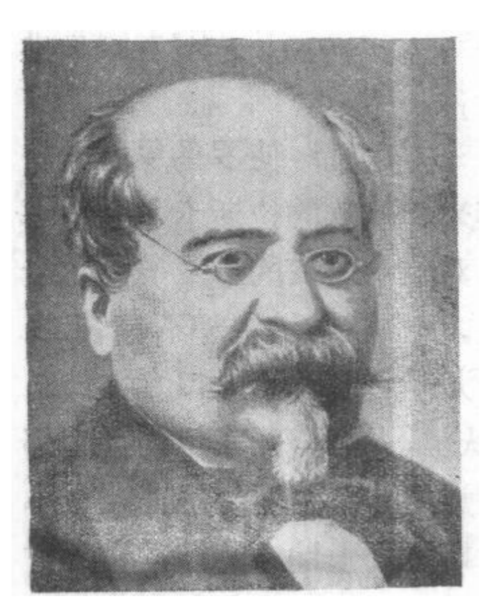
地主公然不愿争取独立的立场，资产阶级主要阶层的犹豫动摇，受到了西欧外交当局、首先是英国和奥匈帝国外交当局的鼓舞，它们建议罗马尼亚统治集团不要同土耳其决裂。这种主张的内

幕是不难揭穿的：土耳其帝国政府的冠冕堂皇的招牌掩盖着外国人在土耳其的主宰一切。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资本家认为，土耳其的大门是进入两公国最方便的捷径。

1875年爆发的“东方危机”使罗马尼亚国内的政局异常地复杂起来。执政的拉斯卡尔·卡塔尔朱的保守派政府，对眼前爆发的事变准备做个消极的旁观者。但是，4,500个地主却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个几乎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在城市和农村，在军队里，人们公开表示同情南部斯拉夫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罗马尼亚革命小组[①]的参加者同来自斯拉夫土地上的流亡者，首先是同保加利亚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75年8月，一支武装精良的队伍在军官瓦卢的领导下集合于切尔努谢什蒂森林中，以便渡过多瑙河进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国民议会中，议员们提出要求：“不能对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苦难袖手旁观。”75名议员拒绝参加议会的工作。卡塔尔朱宣布辞职，在绰号为“将军内阁”的短期过渡政府之后，自由党上台执政。

① 关于这些小组的活动见第3章。

70 自由党人在野时所表现的决心，比他们上台执政时要大得多，这是常有的事情。内阁由于内部分歧而分裂了。参加内阁的自由党地主派的代表人物要求无条件地保持中立。科葛尔尼恰努（外交大臣）在罗塞蒂（国民议会议长）的支持下，主张采取较为坚决的行动。其余的人犹豫不决。这时科葛尔尼恰努便向土耳其和1856年巴黎条约参加国发出照会，实质上是要求把罗马尼亚变成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列强不支持科葛尔尼恰努，而土耳其则干脆拒绝复照。被自己阁员这种勇敢行为吓得要死的罗马尼亚内阁，决定以科葛尔尼恰努作为牺牲品。改组以后，扬·康·布勒蒂亚努领导政府，而科葛尔尼恰努则被排出于内



罗马尼亚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米哈伊尔·科葛尔尼恰努。

阁之外。政府继续采取观望态度。它表面上保持中立，作出姿态，表示它没有发现在罗马尼亚领土上组成的保加利亚人的队伍，并且表示它正在逐步地训练自己的军队，虽然做得很慢而且很不够。1876年9月，布勒蒂亚努前往克里米亚的利瓦迪亚，在与亚历山大二世谈判时，他亲口答应在战争爆发时允许俄军通过罗马尼亚。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罗马尼亚当权的上层人士就不再动摇了。对外政策的前景还不明朗；在俄国国内，主张同土耳其作战的人与反对派在继续进行斗争。布勒蒂亚努企图“为自己留后路”，请求列强保障罗马尼亚中立。但谁也不愿给予保障。一旦战争爆发，政府将面临两种前景：或者继续坚持中立，因而不仅出卖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这丝毫没有使布勒蒂亚努及其同僚感到不安），而且要使自己的国家变成毁灭性战争的战场；或者站到俄国一边并争取独立。政府宁愿采取第二条道路。科葛尔尼恰努又重新掌握对外政策。1877年4月4日，他同俄国驻布加勒斯特的外交代表斯图亚特签订了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两个协定。政治协定的签订在罗马尼亚历史上具有很大的意义，——一个大

国破天荒第一次以平等姿态同它缔结了条约。由于俄国是1856年巴黎条约的参加国，这样它就暗示，它认为巴黎条约中有关罗马尼亚的条款是无效的。

军事协定规定了与俄军过境有关的一些问题。这个协定给予俄国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它的军队得到了在多瑙河上开战的机会，而后方却是友好的人民。

1877年4月12日，俄国向土耳其宣战。同一天俄军开始通过罗马尼亚迅速进军。各地居民都对俄军深表同情。先头部队的指挥官都迅速汇报"居民们温和而非常友好的态度"。

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

土耳其对俄罗签订协定和俄军进入公国境内的回答是：断绝一切关系并宣布撤卡罗尔的职。土耳其集结在多瑙河上的非正规军队开始袭击边境的村庄，抢劫和杀害完全无辜的居民，强奸妇女，赶走牲畜。土耳其炮兵开始轰击港口城市加拉茨、布勒伊拉、卡拉法特、朱尔朱。

愤怒的浪潮席卷全国。一个法国记者写道："你们不能想象笼罩着布加勒斯特的那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人们准备为争取独立而不惜作出任何牺牲。"

1877年5月9日，国民议会在听取了科葛尔尼恰努的发言之后，便宣布罗马尼亚独立。应当交给土耳其的贡税被用作军需。人民得到这个消息时都欢欣鼓舞。在布加勒斯特和其它城市里举行了火炬游行。一个目击者证明："喜悦的人群……在大街上走着，形成了夹道列队……我感觉到所有的人民群众是多么高兴，我周围的人都欢欢喜喜，但又安静而庄严。"动员工作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做得又快又有组织性。俄国相当巨大的一笔贷款（400万列伊）和提供的武器，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一支差不多有6万人的罗马尼亚野战军很快地就作好了战斗准备。 72

然而，罗马尼亚的统治集团并不急于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虽然驻扎在多瑙河上的军队都渴望投入战斗。当时的一位记者写道，第16团的士兵"要求让他们渡过多瑙河，有些人说，如果不允许他们坐船渡河，他们就游泳渡过去。军官们费

了很大的劲才制止了士兵"。士兵们相信政府关于战争结束后给予他们土地的诺言。当时住在罗马尼亚的法国史学家达梅写道:"这个消息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了全国……,农民的心分外激动,他们的茅舍里喜气洋洋。农民献出自己的子弟去争取独立。"

只是在同俄军指挥部就阵地分配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大公卡罗尔才命令自己的军队渡河。[①] 罗军的几个师出现在被围的普列夫纳[②]要塞的城下,为这次战争史写下了不少光辉的篇章。1877 年 8 月 30 日,罗军参加了攻打这个要塞的最重要的据点——格里维茨多面堡群。在这次攻击战中罗军牺牲了 2,000 人。但在三小时的最激烈的战斗之后,安杰列斯库上校领导的第 4 师同俄军第 4 师的一个旅终于冲进了第一座多面堡,经过一场肉搏战,从那里赶走了土耳其人。

---

① 在同罗马尼亚军队合作的方式问题上,俄国的外交家和军人们存在着分歧。外交家为了避免引起国际纠纷,希望不要罗军直接支持。而军人们则要求积极的配合战斗。

② 普列夫纳即普列文,是保加利亚北部的一个小城市。——译者

但是，总的来说，对普列夫纳的强攻被击退了。接着，罗马尼亚军队同自己的俄国战友一道，在秋季最艰苦的条件下参加了对普列夫纳的包围，结果这个要塞于11月28日投降了。

罗军对战胜土耳其作出了不小贡献。他们同俄军一道，从保加利亚西北部赶走了土耳其驻防军，经过多次流血战斗之后包围了强大的要塞维丁，占领了通往维丁的一切通道，并一举攻下了腊霍沃城。腊霍沃和尼科波尔的驻防军由罗马尼亚部队担任。罗军骑兵参加了古尔科将军的骑兵的多次战斗。罗马尼亚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战争中以[73]鲜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1万人。俄军指挥部对自己的罗马尼亚同盟者给予很高的评价。俄国军事史家后来写道："不能不非常尊重这支年轻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民兵的军队，他们光荣地经住了流血的战争的考验。"炮兵的作用特别突出，炮兵的英勇和射击的准确性最受赞扬。在战斗的烈火中，在包围普列夫纳的艰苦条件下，在严寒和酷暑令人疲惫的进军期间，巩固和锻炼了俄罗两国的战斗友谊。

1878年的圣斯特法诺[1]和约承认罗马尼亚完全独立。罗马尼亚取得了进入黑海沿岸的通道(拥有天然良港康斯坦萨的多布罗加北部)。这个地区让给罗马尼亚，交换条件是把克里米亚战争后从俄国割去的比萨拉比亚南部的三个县归还给俄国。同年在柏林召开的会议批准了这些条件。

罗马尼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最后一个外部障碍清除了。

---

① 圣斯特法诺是伊斯坦布尔西面的一个村庄，现名耶西尔科。——译者

第三章　十九世纪末叶的罗马尼亚

74

“怪诞联盟”执政

就政体的反动性来说，“怪诞联盟”时期的罗马尼亚同沙皇俄国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沙皇制度不用任何立宪装饰，而罗马尼亚的统治者总是爱把自己打扮成民主主义者。

1866年，罗马尼亚开始施行新宪法。宪法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信仰、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但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国内的政治风气彻头彻尾地嘲讽了写进宪法的条文。

首先是禁止人民的真正代表进入国会。有固定收入（在农村不少于800列伊，在城市里条件更严一些）或至少受过初等教育的人，才享有选举众议员的直接选举权。这种权利只有富农们才能享

受。其余的农民每50人选派一名复选人。

具有小学毕业程度的男人享有投票权这一款，仅仅对很少一部分城乡劳动人民有效。因为在二十世纪初期，罗马尼亚还有五分之四的人目不识丁，虽然到这时义务教育制已实行40年之久了。

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后者是大地主、金融寡头和工业巨头的堡垒。唯有那些每年收入达3万列伊的人才能出席参议院会议，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由此可见，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使资本家和大地主能够独霸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既没有一个工人，也没有一个农民占有议员席位。

75 要是说旧罗马尼亚的国体是议会制，这只不过是一种讽刺。按照议会制的规定，政府是由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成的。可是在罗马尼亚，新任命的政府本身就为自己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造成了多数。政府总是在事先对选举结果有把握的时候才宣布选举。一位俄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武官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国家的内部政治结构:“在罗马尼亚，谁拿着棍子，谁就是班长。”

献殷勤的各级行政机关总是保证政府在国会里获得多数，而当时的报纸就用"压倒的"多数这个响亮字眼来形容它。市长和县长，警察和宪兵，采用各种手段讨好布加勒斯特的最高领导，使他们所需要的候选人能够当选。例如，1883年雅西的"自由投票"就是这样进行的。"警察局的侦探带领一群匪徒来到各个选区，破坏不记名投票，威吓选民"。警察从选民手中把选票抢过来就写上政府所需要的人名。虽然抗议纷至沓来，但国王不仅不停止选举，反而在国会演说中对选举期间各地呈现的所谓"秩序"与"安宁"表示满意。

在乡村里就更加专横了。在这里，情况严重到这种地步：塞给选民（差不多都是目不识丁的）的选票上面都已写好了政府候选人的名字。投票那天，宪兵常把"思想危险的人"监禁起来。不过对当局来说，不愉快的事件发生的并不多，因为对农民来说，地主不论其党派如何，都是残酷地掠夺他们，所以农民投保守党人的票还是投自由党人的票，反正都是一样。

在国家机关各级官僚机构里，贪赃受贿和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非常严重；每一届新政府都要

更换县长以上的行政官吏，用自己的亲信填补所有空缺。这些新官把职位谋到手之后，便大肆贪污、诈骗和无耻地掠夺人民。罗马尼亚伟大诗人米哈伊尔·埃米内斯库悲痛地写道：

所有这些垃圾和败类，还有那散发着毒气的泡沫——
这就是长期统治我的祖国的家伙！
西方滋生的一切，卑污腐朽的一切，
大自然打上了死亡烙印的一切，
还有那凶残暴戾、背信弃义的一切，
和那所有的法纳尔分子[①]……
都涌进了我们的国土，钻进了爱国者的队伍。[②]

76　罗马尼亚寡头政治有资望的首领是势力很大的卡罗尔·霍亨索伦大公（他从1881年开始是国王）。这个普鲁士王室旁系后裔来到罗马尼亚的时候，只随身带着一对皮箱。1881年，政府把总面积13万公顷的12块大地产作为礼物奉献给他。即使没有任何馈赠，卡罗尔已拥有罗马尼亚和德

① 法纳尔分子：见本书第二章。——译者

② 这是诗人在1881年5月发表的长诗《第三封信》中的片断。——译者

国各种各样企业和银行的许多股票。在欧洲有冕的市侩中，他的狡猾和善于钻营仅次于那个无与伦比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后者把非洲整个一个国家——刚果攫为己有。卡罗尔的财产，根据他死（1914年）后最低限度的统计，价值1亿列伊。"为了亲爱的国家"和自己"心爱的人民"，他从这笔财产中拿出1,200万列伊用于各种慈善事业，其余的交给了保存并日益增加了"王朝创立者"财产的那些继承人。

1848年革命的民主原则已被遗忘了。当权的政治寡头们严重地损害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中等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经济要求无人理睬，民主传统也横遭践踏。这就引起了自由党中激进派的抗议，它直接反对体现了专横霸道和普鲁士军阀作风的卡罗尔。这时，以西蒙·巴尔努齐乌为代表的共和制思想开始大力传播。

不满情绪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迸发出来了。虽然国民普遍同情法国，特别是同情推翻了拿破仑第三并建立了共和国的法国，卡罗尔一世却公然挑衅地表示他很喜欢普鲁士。共和派先在普洛耶什蒂、尔后在布加勒斯特发表了公

开演说，得到了公民的支持。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领导人由于感到形势不妙，就支持大公，于是王位保住了。

如果认为罗马尼亚的地主与资本家的联合是没有困难的、顺利的，那就错了。相反的，在地主—资产阶级寡头政治掌握罗马尼亚一切大权的初期，各个集团之间经常发生尖锐的冲突。地主和追随他们的商业资本家企图象对待前妻的孩子一样来对待工厂主，经常牺牲他们的利益。1875 年，当保守党的基础——大地主——试图牺牲自己联盟伙伴的利益来摆脱经济困难时，发生了一个最惊人的事件。

这时候，世界农业市场陷入严重危机时期：廉价小麦从美洲大陆涌进欧洲；价格猛跌；罗马尼亚粮食出口商在各个粮食交易所里来往奔波，但库存粮食的增加还是快得惊人。国内的粮食储藏量已达 8 万吨。

地主开始向农民进攻，把欧洲市场上竞争的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与此同时，他们还采取了 77 一些沉重地打击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办法。1875 年，保守党人同奥匈帝国签订了通商条约，根据条

约规定，有些关税完全取消，有些则低得可笑。政府本来指望这样就可以把剩余粮食推销国外。保守党人对于不受任何关税壁垒阻挡的奥地利工业品涌进罗马尼亚，充斥各地市场的情况无动于衷。罗马尼亚有变为哈布斯堡王朝原料供应地的危险。这时候，罗马尼亚人吃的面包，是布达佩斯用罗马尼亚粮食加工的面粉做的，脚上穿的是用罗马尼亚皮革制成的奥地利皮鞋，身上穿的是用罗马尼亚羊毛织成的料子做的维也纳服装。在布加勒斯特、普洛耶什蒂、雅西、克拉约瓦、布勒伊拉等地，厂商开始纷纷破产。康斯坦丁·罗塞蒂主办的《罗马尼亚人报》对通商条约作了如下评述："保守党政府将一把匕首刺进罗马尼亚的胸膛，然后把它的尸体扔到安德拉希伯爵[①]的脚下。"

在政治舞台上发生了接连不断的激烈争斗。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使"怪诞联盟"内部各个集团之间的经济矛盾复杂化了：这正是1875—1878年"东方危机"时期。最后，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表现较灵活的自由党，终于把自己的对手保守党打下台来。资产阶级在"怪诞联盟"中占据了

① 安德拉希——奥匈帝国的宰相。

首位。于是，以扬·布勒蒂亚努为首的几届自由党内阁执政的漫长时期开始了，它几乎不间断地持续了12年（1876—1888年）。当与奥匈帝国缔结的通商条约十年有效期满时，自由党人拒绝延长这个声名狼藉的条约[1]。他们实行了保护民族工业法（1881年），给予较大的企业主以税务和运输方面的优惠。1884年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税率。

十九世纪末叶，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了。工厂的数量从36家（1866年）增加到362家（1901年）。石油产量增加得更快。仅仅20年的时间（1880—1900年），石油年产量就从15,000吨增加到25万吨。铁路修建也在紧张地进行，由于地主们非常关心输出农产品，所以他们很热心地支持扩大铁路网的一切措施。因此，到二十世纪初期，铁路长度已超过了3,000公里。

78 自由党人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而且总是吹嘘他们如何关心民族工业。但是，如果深思一下就会明白，他们所采取的全部措施丝毫无损于外国资本侵入罗马尼亚。关于要有一定数量的

① 自由党依靠商业、银行、工业资产阶级，以及那些比保守党顽固分子能更多地照顾到企业主利益的地主阶层。

罗马尼亚公民参加股份公司董事会的法律，也没有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任何困难。他们广泛地利用持有罗马尼亚护照的人来冒名顶替。结果，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股份公司① 的资本有五分之四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尽管自由党人大肆吹嘘，作出各种保证，罗马尼亚企业家还是满足于"小伙计"这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成长壮大起来了。据很不完全的统计，到1901年，在雇有25个工人以上的工厂、矿场里劳动的，共有61,000工人。仅加工工业工人，总共就有13万左右②。

这些微乎其微的成绩，并不标志罗马尼亚工业落后状态的结束。罗马尼亚仍旧是欧洲工业发展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几百个工厂、矿场、平峒、油井，在6万个半手工业小作坊中，简直不显眼。即使象石油工业这样号称先进的部门，也在使用钻井的同时，还继续使用着成百口原始油井。这些油井是用最落后的方法打的：把一个坐在吊

① 大股份公司是指罗马尼亚当时的规模而言的。这一级的每个企业应有5万列伊的资本，或者雇用的工人不少于25个。

② 1863年是3万人。

斗里的工人放到井下，然后，他在那里用锹挖。每分钟都有被地下水淹死或被喷出来的煤气熏死的危险，因为这样的事故经常发生。

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都分散在规模不大的、而其实是非常小的作坊里，这就给工人运动的发展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在工业企业雇用的很多人当中，有些是被贫困所逼从农村来的，他们还想回去；有些则从来就没有脱离农业，而是拚命抓住自己那一小块地不放。很大一部分人是修公路和伐木的季工。最后，工人队伍靠破产的手工业者得到充实，但他们并不能很快地安于这种新地位，而是幻想恢复先前的“独立性”。

从前的农民和城市小业主只有在“工厂的熔炉”里长期锻炼，才能形成无产阶级意识。

79 土地关系的发展

在农村，带有各种政治色彩的地主，即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包括有地产的资产者，他们所结成的联盟巩固起来了。私有者的共同利益把他们联

合在一起。对农民起义的恐惧心理使他们团结起来，而且成为建造畸形的“怪诞联盟”大厦的基石之一。

我们已经讲过十九世纪最后25年间世界粮食市场危机给大地主带来的困难时期。但是，小麦和玉米的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到二十世纪初，出口量占收获量的40%）。罗马尼亚大地主还经受住了同美国、加拿大农场主的机械化高产经济的竞争。

靠什么去竞争呢？贫困化的罗马尼亚农村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在农村，“自由”农民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地主。自1864年土地改革以来，还有四分之三的农民没有得到能够养活一家老小的土地。后来，缺少土地现象就变成了真正的地荒。政府有时作出慷慨的姿态，说要“分给”土地（即出售一部分剩下来的国有土地）。但是条件非常苛刻（付款期限很短，只卖较大块的地），结果，只有那些地主和为数不多的富农阶层才能买得起这些土地。无须多说，没有一个农民享受过1876年出售国有土地法的好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可耕地面积分布

如下:

小土地所有者（10公顷以下）——92万戶，占地315万公顷；

中等土地所有者（10—50公顷）——36,000戶，占地70万公顷；

大土地所有者（50公顷以上）——7,800个庄园，占地400万公顷。

总之，一小撮地主所占的土地，比近百万户农民的土地还要多。

只有占地5—10公顷的175,000农户和36,000户富农（占地10—50公顷），有条件自己经营而无须租地。其余的，即差不多75万农户，自己土地收获的粮食是不够吃的①。此外，还应加上50万户无地农民。由此可见，地荒的可怕情景是很清楚的。

劳动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当时还很不发达的工业只能容纳少量的劳动力。跑到城里去躲避农村的饥饿生活也没有什么好处。剩下的办法就是或者去央求大地主，请他随便以什么条件再租给一小块地，或者当他的雇农。无怪乎罗马尼亚

80

① 数字（大约的）引自《罗马尼亚统计年鉴》(Anuarul statistic al Romîniei), 1909年版，第45页。

农民租种的土地面积非常大，差不多有200万公顷。

只要农民情愿为极微薄的一点报酬而用自己的农具为地主种地，或者被迫缴纳很重的地租，地主就不打算添置自己的生产设施——购置农业机器、农具、牲畜、肥料等等。

下面的耕畜分布数字表明，大庄园是多么不适于自己经营(1900年)①。

土地所有者类别	马	公牛
地主·························	5%左右	8%左右
农民(包括无地农民)······	87%左右	87%左右

农具的情况也不好。结果，地主虽然霸占了大部分土地，但用自己的牲畜、农具以及雇佣劳动力(即用资本主义方式)，只能耕种很少一部分土地。

换句话说，在罗马尼亚，象地主土地所有制这样最大的封建残余，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农民经济还不能完全与地主经济分开，因为草地、森林、牧场、水塘还在大地主手里。

① 应该指出，在罗马尼亚用公牛耕地同用马耕地一样普遍。

同从前一样，各种形式的半封建工役制是地主经济的基础。最主要的形式有以下几种：包工雇佣（农民给地主种地从地主那里领工钱）；工役制地租（农民用在地主土地上的劳动来偿付的地租）；分成制地租（农民向地主缴纳租地上的一部分收获物）。实际上，各种地租混杂在一起，而租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和混乱。有两种情况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第一，订租契通常是在冬季或早春，这时农民从顶棚上拿下了最后一穗玉米，全家已开始忍饥挨饿了。因此，农民就得提早贷款或借贷粮食，讲好的条件是做工偿还。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工役制的奴役性和重利盘剥的性质。第二，大多数地主是不愿亲自经营管理的，他们把整个田庄租给一个大租户，大租户再把这个田庄分成许多小



贫穷是旧罗马尼亚农村的命运。

块地转租给农民。这样一来，在大地主和农民之间就插进了一个贪婪追逐暴利的二地主阶层。

在这段简短的叙述里，我们不可能把强加给 81 农民的各种契约的所有阴谋诡计都揭露出来，只能列举有关分成制地租(工役制最重要的一种)条件的一些数字。在罗马尼亚,分成制地租叫做“什一租”——这个名称是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那时农奴必须把耕地收获物的十分之一缴给贵族。1870 年对 196 个庄园进行了调查。结果查明：大多数庄园(116 个)的农民向庄园主缴纳收获物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25 年之后(1906 年)，对这些庄园又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令人吃惊的：116 个庄园的农民向庄园主或大租户缴纳收获物的一半(1870 年还只缴五分之一)。只有两个庄园(25 年以前是 38 个)还保留着什一租，但实际上是把五分之一的收获物给地主，五分之四归农民,就是说,什一租差不多完全消失了。其它各种工役制的负担也同样急剧地加重了。

租契的奴役和苛酷条件逼迫农民成天在地主 82 的地里干活，以致他们没有工夫去耕种自己的土地。如果说，在农奴制时代法律还规定了徭役的

天数，那么，在已经有了“自由”的条件下，国家也应该为农民保留星期五和星期六，以便让他们在自己的地里干活。没什么可说的，这项规定也同一切哪怕是对地主的专横稍加限制的法规一样，总是不断地遭到破坏。

大地主由于使用了依附于自己那一小块地的农民的廉价工役制劳动，所以对技术设备不大感兴趣。同一百年前一样，各地差不多都还是用农民的木犁耕地，用粗笨的鹤嘴锄锄玉米，用手收割庄稼。罗马尼亚虽有最肥沃的黑土，但它的粮食产量仅仅超过沙皇俄国，——这点成就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它还远远落后于欧洲的先进国家。在严重缺少土地的农村里，农民正经历着破产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绝望的贫苦生活常常引起城乡愤懑情绪的爆发。地主和资产阶级总是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来巩固他们以压迫工人阶级和农民为基础的联盟。十九世纪末期，开始爆发了普遍的罢工运动和一系列农民暴动。

工 人 运 动

在十九世纪末的罗马尼亚，资本家的剥削是没有任何限度的：没有劳动法、工人没有假期和休息日、不发养老金或疾病补助金、没有规定工伤残废金、工作日不受限制。在工厂里，罚款制、粗暴地对待工人、侮辱和毒打工人的行为比比皆是。在肮脏、潮湿、光线阴暗的厂房里，而有的就在露天地里（例如在加拉茨机车修配厂），工人们通常是从早到晚地工作14—16个小时。

困苦的生活状况迫使工人起来斗争。这是尚未觉醒的群众自发地爆发出来的愤怒火焰。工人的要求归结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取消罚款制、禁止工厂管理人侮辱工人。七十年代初期，在聚集着成千上万人的铁路和港湾建筑工地上，发生了最初几次大冲突。例如，1872年，加拉茨港湾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875年，被监工的侮辱和很低的计件工资激怒了的布勒伊拉4,000名港湾工人奋起斗争。冲突持续了几个星期，最后，企业主作了局部的让步。

83 就在七十年代，在铁路建筑工地上，特别是在普洛耶什蒂—普雷迪亚尔、济姆尼恰—弗拉采什蒂、坎皮纳—普雷迪亚尔这几条线路的建筑工地上，发生了几次大规模冲突。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由共同的痛苦命运连结在一起的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共同战斗。这就是说，在自发斗争的初期阶段，各国劳动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就已表现出来了。

就在这十年期间，加工工业中劳资之间最初几次严重的冲突也暴露出来了。1872 年，布加勒斯特国营制烟厂举行了大罢工，烟商也参加了这次战斗。只是在检察官和警察干预之后，才迫使制烟工人复了工。两年以后，布加勒斯特发生了缝纫工人的罢工。

工人们渴望组织起来，结果在工人运动这个早期阶段就成立了行业联合会。这一般地都是防备失业、生病和死亡的共济会。大资产阶级和行政当局对这些组织的成立提心吊胆。事情竟弄到这种地步：当局指控“马特伊—巴萨拉布”印刷厂的印刷工人共济会的一些会员阴谋反对国家，因而把他们逮捕了起来。

1872年，工人们初次试图把全国的工人联合起来——成立了“罗马尼亚工人联合会”，这不仅反映了劳动人民要求团结的愿望，而且也反映了他们不懂得自己过着困苦生活的根本原因在哪里。联合会把共济作为活动的重点。工人们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同企业主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所以轻信地允许企业主加入“联合会”。企业主很快就窃取了“联合会”的领导。接着就开始鼓吹阶级调和，通过《罗马尼亚工人报》号召工人不要罢工。由于“联合会”还不会走阶级斗争的道路，因而横遭当局迫害而变得软弱无力，并且很快就停止活动了。

在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过程是相当艰难的。七十年代建立的许多革命小组，是由知识分子、主要是由青年学生组成的。他们受俄国民粹派的影响极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罗马尼亚同俄国是近邻，民意党人的英雄主义很受崇拜，最后，罗马尼亚又是民粹派同他们在国外的各个中心互相联系的主要途径。罗马尼亚变成了民粹派侨居的地方。这里还设立了许多转运站，通过它们向俄国输送秘密印刷品。从俄国

迁来的人，有七十年代小组中最著名的活动家鲁塞尔博士、康·多布罗加努—盖里亚，以及他们当中最卓越的人物——空想社会主义者恩·普·祖布库—科德里亚努。他是尼古拉·伯尔切斯库的信徒，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学生。他相信人民革命，虽然他在落后的罗马尼亚除了农民以外看不到能够实现人民革命的其它力量。同俄国民粹派一样，以医生为职业的祖布库—科84德里亚努到农村去鼓吹革命。由于他是一位天才的政论家，所以他能鲜明地反映出农民的痛苦命运。

当时的革命小组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们利用集会和报刊猛烈抨击落后的土地制度，揭露行政管理机关的滔天罪行，要求国家制度民主化，为争取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而斗争，捍卫男女平等的原则。

随着无产阶级的斗争烈火在全国燃烧起来，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引起各个小组成员的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开始出版了。另一方面，蒲鲁东和拉萨尔思想也从西方传来了，它们受到各个小组里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的

欢迎。

小组的最初一些纲领反映了世界观上的折衷主义，反映出他们不了解达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例如，1880年，鲁塞尔博士起草的一份文件规定，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应转归工业和农业工作者的各个团体集体所有，这同蒲鲁东的合作社所有制思想很相似。实质上，作者回避了夺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方法问题。他只是说，文明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就会达到进化发展的主要转折关头，这个转折关头就叫做社会革命”。鲁塞尔没有讲到工人的具体要求。

1881年，《现代人》杂志在雅西出版了。这本杂志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1886年，康·多布罗加努—盖里亚发表了小组的第二个纲领，这个纲领比鲁塞尔的纲领要详细和明确得多。它提出了政治要求(实行普选权，用民警代替军队，保障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人身不受侵犯，实行免费教育，男女平等，等等)。但是，关于工人特有的经济要求盖里亚却没有提到，也避而不谈关于革命的问题。

但是，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迫使各个小组转

向无产阶级。依靠青年大学生的做法失败了，因为当局很容易把大学里的不满情绪压制下去。许多先前的大学生，在拿到毕业证书并得到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之后，便不再因不满而反抗了。著名的讽刺作家卡拉加列在一篇抨击性文章《罗马尼亚人》中描绘了他们观点的演变：

> “从中学预备班学生到中学毕业——无政府主义者；
> 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社会主义者；
> 从大学生到官吏——进步人士；
> 从官吏到领退休金者——保守主义者。”

85 工人运动虽然遭到摧残，还是发展、壮大了，并且积蓄了力量。八十年代所发生的接连不断的劳资冲突，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都大大超过了前十年。

1886年，布加勒斯特几家大印刷厂的全体职工举行了罢工。第二年，这里的制靴工人也举行了反对工厂主的罢工。但是，发展为真正的阶级战斗的最大事件是发生在1888年。加拉茨的铁路员工发出了信号。一个工友被无故解雇，激起工人的极大愤慨，于是，他们罢工了，要求停止专横和

毒打。当局害怕了：铁路是国家管理的，罢工者是在向国家挑战。政府急忙派增援部队和宪兵队到加拉茨。他们用暴力强制工人回到工厂。但就是这样，工人们也没有拿起工具干活。在邮局和电报局里实行了严格的检查制度，禁发关于罢工和呼吁声援的消息。但工人们把自己的代表团派到布加勒斯特，因而也就克服了这个障碍。首都、雅西、土尔努—塞维林、帕希卡尼的铁路员工宣布声援罢工工人，并着手募款。

最后，饥饿摧折了罢工者的意志。铁路当局逐个甄别雇用工人，上了“黑名单”的人都被开除了。

企业主和当局还没有来得及庆贺一下他们摆脱了加拉茨的伤脑筋事件，一系列新的伤脑筋事件又发生了。3月，雅西制鞋工人举行了罢工，6月，又爆发了首都印刷工人的总罢工。

8月，布加勒斯特中央机车修配厂全体职工举行罢工，提出了很多要求：提高计件工资，免费乘火车，用罚款筹建互助基金等等。在罢工期间，还经常召开群众大会和集会，参加者多达2,000人。加拉茨和帕希卡尼爆发了声援性罢工。当局

企图收买工贼，但是失败了，因为国家兵工厂的工人断然拒绝去反对自己的同志。这三个城市共有1,500人参加罢工——这个数字对当时的罗马尼亚来说是很大的。罢工以失败告终——饥饿又迫使工人们回到工厂里。

但是，在短暂的间歇之后，这一年铁路员工的第三支队伍又起来进行了斗争。首都北站的全体职工罢工了。政府打算用分文不动预算经费的办法来解决这里的退休金问题；工人的工资被扣除7%。铁路员工奋起反对这种肆意欺压。他们坚持罢工一个月，但是，后来被迫承认自己的失败。有100多人没有被再雇用。

1888年的罢工，标志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向前86迈进了一大步。无产阶级直接同国家争斗，这就使先进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工人迫切要求按行业组织起来，——结果成立了几十个这种联合会。制鞋工人、印刷工人、木工、马具工人、五金工人都联合起来了。联合会的章程仍旧以共济为主，同时还规定要建立图书室，成立读书会，出版自己的报纸。但是增加了一项新内容——规定在罢工的时候要互

助。这项规定就同建立罢工基金和把联合会变为现代形式的工会相距不远了。

对无产阶级来说，单纯的行业范围很快地就变得太狭隘了。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前提已逐渐具备。

值得指出的是，在8月罢工期间举行示威游行时，发出了建立工人党的呼吁。社会主义者对于1888年罢工斗争没有袖手旁观，布加勒斯特工人的好多会议，一般地都是在社会主义小组所在地召开的；小组在募集罢工基金方面给予积极的帮助，而小组成员则利用有利的形势，在工人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

在为罗马尼亚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第二国际的巴黎会议（1889年）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罗马尼亚有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向大会报告：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组织不仅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有分支组织，而且在罗曼、布勒伊拉、普洛耶什蒂、福克夏尼也有。

会议向工人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争取8小时工作日。这是依靠各支队伍单独分散活动所无法达到的。不难想象，在工作时间根本没有任何

限制的罗马尼亚，这个口号具有何等巨大的吸引力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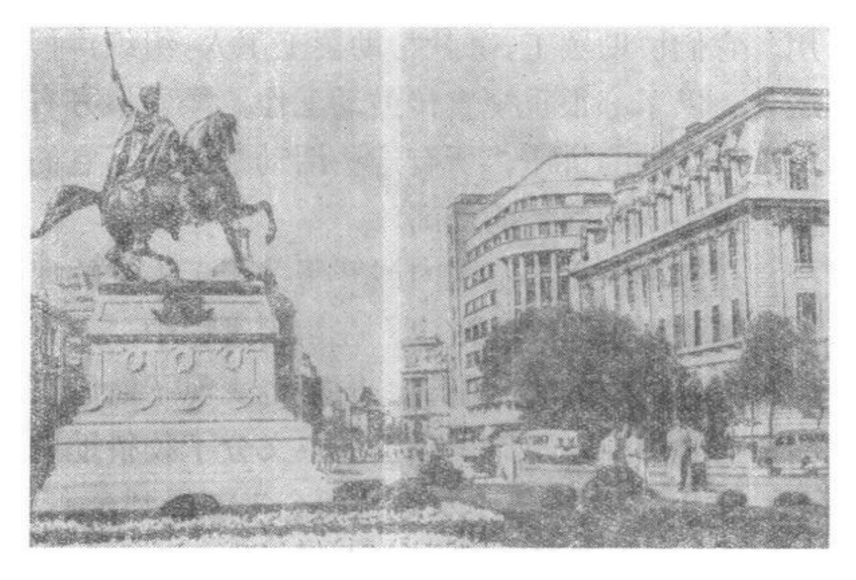
所以，仅在布加勒斯特一地，1890年的“五·一”游行就在自己的旗帜下汇集了5,000人。两年之后，这个数字就增加了一倍。

值得指出的是，组织委员会当时计划除了首都以外，还要在雅西、克拉约瓦、布勒伊拉、福克夏尼和博托沙尼举行游行示威。但是工人们要求庆祝自己节日的愿望是那样强烈，结果在“计划之外”的城市——普洛耶什蒂和加拉茨也召开了群众大会。

工人报刊广泛宣传建立政党。

党是由各个分散的小组经过工人俱乐部这种形式的过渡阶段而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工人俱乐部是1890年初在布加勒斯特成立的。俱乐部章程宣布，它的目的是为增强工人的团结、改善工人状况而斗争，并筹备建党，建立与其它国家的工人党的联系。值得指出的是，参加俱乐部的人必须缴纳会费并在它的组织中积极工作，即履行通常是党员所承担的义务。

87 布加勒斯特俱乐部，以及随后在雅西、普洛耶



布加勒斯特大学广场(在布加勒斯特市内)。
左边是米哈伊·维蒂亚兹大公塑像。

什蒂、加拉茨、克拉约瓦、博托沙尼成立的俱乐部，都开展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团结工人的工作，由于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工作，很多联合会把隐藏在它们之中的老板们清洗出去了，这样，它们就变成了纯洁的无产阶级团体。布加勒斯特俱乐部对各个企业的工作时间、工资、行政管理部门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调查。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劳动报》呼吁劳动人民把他们迫切关心的问题告诉它。俱乐部在筹备和进行庆祝“五·一”的活动中起了重大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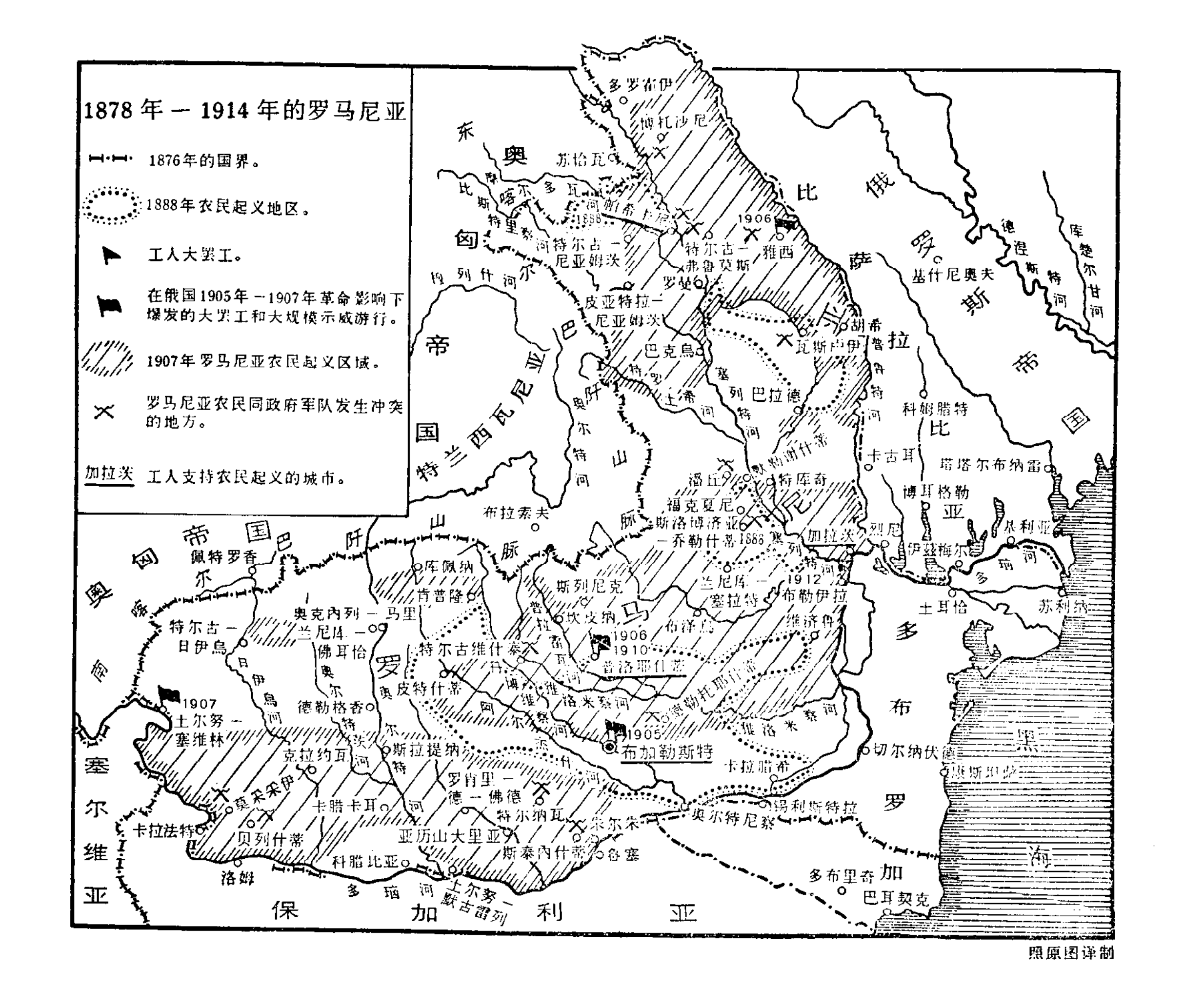
用。它们协助罢工，募款帮助罢工工人，组织声援运动。俱乐部很重视宣传鼓动工作，经常举办有关工人运动的讲座。所有这些活动都促进了它们在工人中间的威信的提高。

88 在各个俱乐部范围内展开了关于工人党的理论基础和组织原则的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工人们表现出强烈的建党愿望，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在理论上的幼稚，不能识破机会主义分子狡猾地设下的圈套。工人队伍不断地从两个来源得到充实：农村把一贫如洗的农民逼出来了，城市把由于竞争而破产的手工业者输送给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涌进了无产阶级队伍，成为机会主义的温床。工人还缺乏政治经验，这表现在他们当中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应该通过机械地合并当时各种工人团体的途径来建党。还没有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熟的罗马尼亚工人阶级，比较容易受机会主义分子的诱惑，因为后者在工人面前描绘出一条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迷人捷径。

从七十年代开始，布加勒斯特和雅西就已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宣传中心。摩尔多瓦从前的首都雅西，已变成一个静悄悄的省城，几乎没有工

业，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小组里的影响特别大。小组的领导人——雅西高等法政学校教授扬·纳德日德、新闻工作者安东、康斯坦丁·巴卡尔巴沙和康斯坦丁·米列、地主亚历山大·拉多维奇、瓦西列·莫尔聪及其他人，广泛进行了宣传鼓动，要按"合法"道路发展工人运动。例如，米列写道，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斗争。他宣称，"借助于普选权，工人不必付出重大牺牲就能得到应有的权利，即得到一切"。机会主义分子们说，用不着使未来的党由于走革命的道路而遭到当局的残酷迫害。纳德日德则用"法国的例子"吓唬工人，硬说法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遭到可怕的打击，正是因为他们赞成革命。必须指出，纳德日德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仅篡改了它的名称（《社会主义宣言》），而且还加了一篇评论，说这个最重要的文献应该研究，不能根据它来进行宣传。他写道："《宣言》仅仅对于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是重要的，如果把它作为罗马尼亚的指导文件，那就糟了。"

与以扬·纳德日德和瓦·莫尔聪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愚蠢笨拙的机会主义比邻的，是多布罗加努—盖里亚的更狡猾更隐蔽的机


1878年—1914年的罗马尼亚
1876年的国界。
1888年农民起义地区。
工人大罢工。
在俄国1905年—1907年革命影响下爆发的大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游行。
1907年罗马尼亚农民起义区域。
罗马尼亚农民同政府军队发生冲突的地方。
加拉茨 工人支持农民起义的城市。
奥匈帝国
俄罗斯帝国
比萨拉比亚
多布罗加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黑海
布加勒斯特
1905
1906
1907
1910
1912
1888
雅西
加拉茨
基什尼奥夫
多瑙河
普鲁特河
锡雷特河
奥尔特河
日伊乌河
康斯坦察
图尔恰
布勒伊拉
普洛耶什蒂
克拉约瓦
巴克乌
博托沙尼
多罗霍伊
苏恰瓦
皮亚特拉—尼亚姆茨
罗曼
瓦斯卢伊
胡希
巴拉德
特库奇
福克夏尼
布泽乌
斯拉提纳
皮特什蒂
库佩纳
肯普隆
锡利斯特拉
久尔久
卡拉法特
贝列什蒂
洛姆
杜尔努—塞维林
亚历山大里亚
特尔纳瓦
卡拉腊什
切尔纳伏德
巴耳契克
多布里奇
土耳恰
苏利纳
伊兹梅尔
列尼
卡古耳
博耳格勒
科姆腊特
塔塔尔布纳雷
德涅斯特河
库楚尔甘河
特兰西瓦尼亚
喀尔巴阡山脉
东喀尔巴阡山

照原图译制

会主义。

盖里亚在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中间享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宣传家的声誉。在知识分子中间他的漂亮的文艺评论文章也颇受欢迎，这些文章驳斥了以«青年派»为代表的艺术、文学和美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潮。

但是，当盖里亚不仅广泛地宣传马克思的思想，而且力求解释罗马尼亚的社会现象时，人们就发现，他原来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实质和辩证法。他的观点是在八十年代开始后的25年间形成的，并在他1910年出版的著作«新农奴制»一书中得到了最全面的阐述。 90

他的世界观的基础是根本不相信罗马尼亚人民的革命力量和潜力。盖里亚错误地估计了1864年土地改革以后罗马尼亚的经济发展状况。大量的封建残余使他看不到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他断言罗马尼亚进入了他称之为“新农奴制”的封建主义新时期。

错误的前提必然导致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荒谬结论。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里，罗马尼亚大资产阶级是属于反动阵营里的。罗马尼亚面临的

任务是：以工农联盟为动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盖里亚却把各阶级的力量配置描绘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他过低地估计了罗马尼亚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资本主义受到了强大的农奴制残余的阻碍），认为资产阶级不是统治集团里享有平等权利的成员，而是受欺压的一方。盖里亚同与他保持密切联系的俄国孟什维克一样，认为未来革命的领导者是自由资产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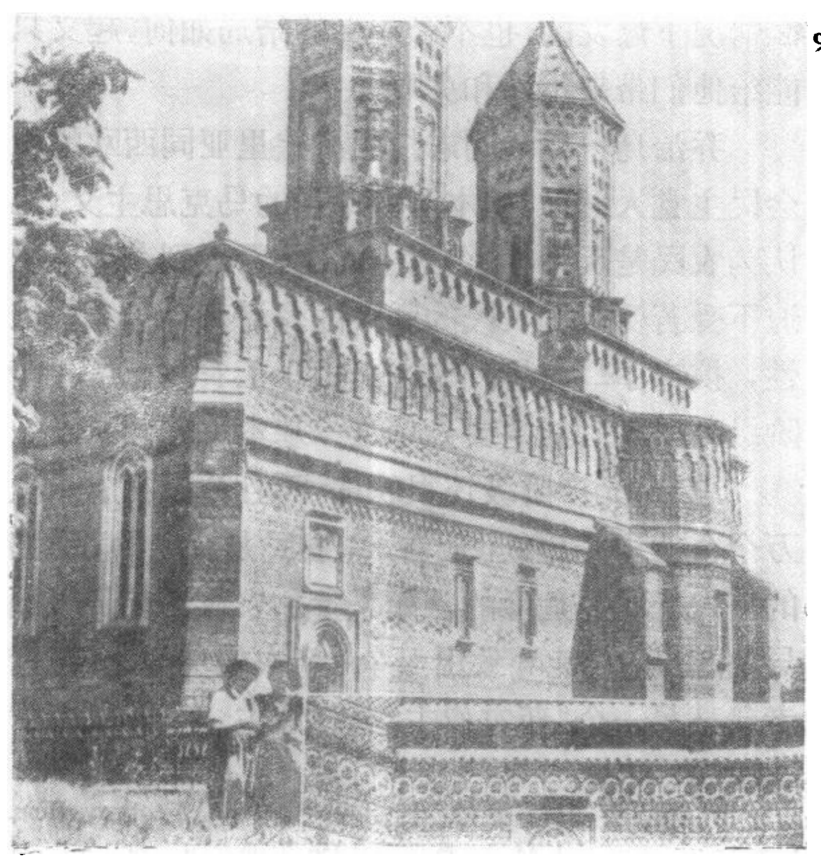
在象旧罗马尼亚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里，工农联盟对于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纲领是最最重要的。

然而，盖里亚的观点却引导工人阶级不去与农村劳动群众结成联盟。他把自己的理论应用于罗马尼亚农村时，忽略了大土地所有制虽然缓慢，但却毫无疑问地在向资本主义发展，认为农村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是地主与渴望强占土地的新生农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盖里亚认为，农村的革命动力是资产阶级。至于农民，盖里亚把他们描写成愚昧无知、备受压迫而不敢反抗、迷信命运的群众，他们的全

部生活哲学可概括为一句话："听天由命。"

"农民是一个赤贫和乞丐阶级，他们为了一小块面包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盖里亚对农民"暴动"怕得要死，认为农民暴动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真正危害"。在他看来，只有农业资产阶级才能

91



十五世纪雅西的三圣教堂。

发动农民起义，因为如果起义成功了，资产阶级就会攫取全部成果，取代地主的地位，而且他们剥削农民的残酷程度也丝毫不亚于地主。如果起义失败了，那么农村将遭到讨伐队的残酷镇压。而大多数农民将为他人"火中取栗，因为不管起义是在什92么情况下爆发的，也不管起义的结局如何，起义只能给他们带来不幸和失败"。

乔治乌—德治同志指出："盖里亚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根本不懂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农民是反动的、个人主义的，看不到在地主压迫下受苦受难的农民的巨大的、潜在的革命积极性，摈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这一基本思想。"①

93 总之，无产阶级还很软弱，而且分散在成千上万个企业里；在盖里亚看来，农民是反动的，他们的自发暴动是危险的，如果参加农业资产阶级领导的起义，只能导致由一个"新农奴主"——资产者代替另一个"新农奴主"——地主。

① 格·乔治乌—德治：《论文和演说集》(Г. Георгиу-Деж. Статьи и речи, т. I, М.)，莫斯科 1956 年俄文版，第 1 卷，第 326 页。



亚历山德鲁·扬涅斯库——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那么，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到底在哪里呢？盖里亚在罗马尼亚找不到这种力量。他认为革命是遥远未来的事，因而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外因”——西欧先进国家的革命上。所以，在盖里亚看来，党纲完全可以不谈用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问题，因为在罗马尼亚的条件下这是“不现实的”。盖里亚认为，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进行“准备工作”，即进行宣传、鼓动，争取改革，首先是争取能使工人和农民成为议会主人的普选权而斗争。这是腐朽的、反无产阶级的、实质上是孟什维克的理论①。

① 参阅格·乔治乌—德治:《论文和演说集》，俄文版，第1卷，第325页。

盖里亚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看法，构成了他的一整套机会主义思想体系。他认为，由于无产阶级很软弱，不可能把所有对现实不满的人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因此，这个任务就落在知识分子阶层肩上。这样一来，盖里亚就从“理论上”论证了纳德日德、莫尔聪之流要领导党、领导工人运动和一切民主运动的奢望。

罗马尼亚工人当时很难识别这些阴谋诡计的微妙之处。机会主义流派的知识分子，就利用工人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和存在着强烈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在各个小组和俱乐部里占据了关键性的位置。他们的观点所产生的影响，在1890年在布加勒斯特发表的五一宣言里清楚地反映了出来。宣言说:“五·一节既不标志罢工，也不标志革命。”

为了领导整个运动，雅西一些有名的机会主义分子稍晚一些时候迁移到了首都。他们很快地（1892年2月）就在布加勒斯特工人俱乐部执行委员会里夺取了多数。

但是，不能说在社会主义小组里，以及后来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完全是机会主义观点统治一切。与它对立的革命派已经形成了。这个革命派的代

表人物，是以铁路工人康斯康丁·奥尔切斯库和印刷工人亚历山德鲁·扬涅斯库为首的一些工人；九十年代末期，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伊·克·弗里木和什特凡·乔治乌又充实了革命派。

扬涅斯库在1898年说："大家必须明白，夺取政权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基础。"这句话证明了机会主义的莠草是阻止不住革命思想健康幼芽的成长的。但是，专心致志地在小组和俱乐部里从事组织工作的革命者，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在阶级斗争中还锻炼得不够，因而未能阻止机会主义者占据报刊的领导地位，未能阻止他们领导俱乐部执 94 行委员会，以及后来窃取党的领导。

社会民主党的建立

应该说，纳德日德、莫尔聪等人并不十分愿意建党。但是他们却受到了群众的强大压力。

1893年4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草案，是经过广泛讨论的。因此，从这个纲领的优点和缺点就可以看出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的政治成熟程度。党纲把欧洲社会民主党所

共有的若干条款包括进去，实现这些条款就将是工人阶级的重大胜利。党纲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党纲的制定者们宣布他们赞成阶级斗争。在政治要求中，普选权被提到第一位，此外，还讲到保障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

在罗马尼亚，第一次在这个纲领性文件里讲到了工人的独特要求：施行劳动保护法，规定休息日，禁止14岁以下的儿童作工，实行8小时工作制，对农业工人也实行社会保险。党纲的优点是它讲到了土地问题，虽然讲的不彻底，只是说要储备一部分土地，即由国家收买地主的土地租给农民协会和个人，建立农业信贷体系，放宽租赁条件，等等。

但是党纲也有很大缺点。它是改良主义的文件，而不是革命的文件。党纲序言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应该首先在西欧一些先进国家里实现，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只有等待那里的信号，从事目前的准备性工作：宣传和组织劳动人民，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斗争，等等。党纲指出，党的策略服从这个目的："我们的社会主义策略要恰如其分，运

动要按照严格的合法道路发展。”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还得到了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补充：党章规定，凡同意党纲的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联合会都可以入党。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性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取代了无产阶级紧密团结的原则。这比遭到列宁极有力批判的马尔托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 95 上抛出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资格的提案还要糟。

尽管有这些缺点，罗马尼亚建立了社会民主党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全国有了工人运动的统一司令部。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子为团结他们的队伍进行了极其紧张的活动。九十年代是工会组织迅速发展的时期，到二十世纪初，工会组织共有几百个。1889 年，仅布加勒斯特一地就有 162 个工人协会和工人联合会，克拉约瓦——16 个，加拉茨——14 个，布勒伊拉——8 个，等等。1896 年，布加勒斯特的一部分工会联合起来了。这个组织的领袖开始是亚·杨涅斯库，后来是伊·克·弗里木。工会和协会的阶级性更明确了。它们的章程一般地都讲到要加强工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和团结，为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

物质生活而斗争。有些章程还指出，必须缩短工作日，有时（虽然远远不是所有的章程）还规定缩短到8小时。工厂主不许参加工人联合会。有一份章程直接指出，凡是已变为工厂主的协会会员必须离开协会。

罢工斗争的规模显著地扩大了。1893年，科特罗切尼（布加勒斯特）缝纫厂举行了大罢工；在后来的几年里，木器工人、印刷工人、建筑工人也奋起斗争。1898年，缝纫工人的罢工席卷布加勒斯特、布勒伊拉和加拉茨。无产阶级的团结增强了。值得指出的是，对缝纫工人的援助不仅来自罗马尼亚各地，而且来自国外，来自维也纳、柏林和伦敦。劳动人民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加强了，——只要指出首都印刷工人的罢工从1898年12月一直坚持到第二年3月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罢工的性质仍然是经济斗争，显然不会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什么特别威胁。但是，罢工是阶级教育的有力手段。于是，窃据党的主要领导职位的机会主义分子就实行破坏罢工的政策。

党内两派发生了冲突。顽固地走“合法道路”的领导，企图把党的活动几乎完全局限在争取普

选权的斗争中。扬·纳德日德和瓦·莫尔聪当上国会议员之后，便认真地不断向议院提出有关的法案，而这些法案总是通不过。每年都召开几十次要求普选权的会议。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活动都有肯定的意义，但是却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瓦西列·莫尔聪曾建议激进派来领导这场运动。

革命分子认识到这样作还不够，他们要求到群众最集中的地方进行积极活动，把重点放在争取满足工人的独特要求的斗争上。对待罢工的态度问题成为严重分歧的焦点：右派领导力图引导无产阶级走央求和请愿的道路。有时，他们阻止了罢工。但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更多的是遭到失败。党的一位著名领导人伊·阿塔纳西乌抱怨说："我们举行罢工并不是由于领导人的发动，相反的，他们竭力避免罢工。" 96

领导同群众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了。党的第四次（1897年）、第五次（1898年）代表大会，是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召开的。革命派代表批评执行委员会企图缩小党的活动范围，把党的活动归结为鼓吹争取普选权；代表们要求在工人中间加强

宣传工作，增加俱乐部，提高俱乐部的战斗力，把它们变成党的战斗支部。右派通过瓦西列·莫尔聪的嘴提出要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宣传。在雅西、普洛耶什蒂和加拉茨的市政选举中，机会主义分子与自由党人进行了无原则交易，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政治同情心是倾向哪一边的。在报刊上、在代表大会上，他们都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他们使工人运动服从于自由党人的意图。他们证明说，罗马尼亚工人阶级是软弱的，但是资产阶级也是软弱的。所以他们都不能单独地反对反动势力，假如工人阶级能加强自由党激进派的力量，那么，就会有所成就。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1899年），当莫尔聪提议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民主党，而该党的纲领又在现存的社会组织的范围内，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可以实现的时候，这些别有用心的企图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农民运动与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

在党内引起严重分歧的另一个问题是土地问

题。在罗马尼亚当时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的意义非常重大。没有哪一年不爆发不满情绪，没有哪一个十年不发生一次大暴动，在1888年，声势浩大的起义席卷了全国。起义的爆发情况表明，农民对国王和政府的“仁慈愿望”抱着多么强烈的幻想！农村里流传着一种谣言，仿佛政府颁布了关于分给农民土地的法令，但大地主和地方当局把这个法令隐瞒下来了。于是，农民便成群结队地到乡长那里，要求看看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文件。他们遭到拒绝之后，就奋起斗争，捣毁了地主庄园，焚烧了存放奴役性的租赁契约的文书保管室。有时（固然，这种情况是很少的）运动发展到分地主土地的程度。

大地主们逃进城里。有几个地方行政官吏，由于拚命实现大地主们的要求而丢掉了脑袋。起[97]义者的队伍，即所谓游击队，达到2,000—3,000人。他们试图进入城市（布加勒斯特、卡拉腊希、博托沙尼）。起义农民想强迫当局接受自己的要求，首先是放宽租赁契约的条件和分配土地。

27个县（罗马尼亚当时有32个县）发出了关于农民骚乱和起义的警报。布加勒斯特近郊的事

态特别激烈——首都直属县伊利福夫县132个村镇居民掀起了斗争。运动波浪式地发展着，这就很容易使运动被镇压下去。讨伐队刚把一个县的暴动镇压下去，马上就开到另一个县去，因为那里的"叛乱"方兴未艾。最后，讨伐队屠杀了数以百计的起义农民，把成千上万的人关进监狱，把起义镇压了下去。

然而，1888年事件表明，农村里聚集了多少引火物！农民的革命潜力多么巨大！

社会主义小组是怎样对待起义的呢？他们非常勇敢地为起义者辩护，痛斥对起义者的镇压，要求停止讨伐队的围剿行动，坚决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布加勒斯特小组最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它发表的宣言微微透露出无产阶级与农民利益一致的思想，并且指出，贫穷的、备受压榨和无权的罗马尼亚农村，有极其充分的理由举行起义。土尔努—塞维林和布勒伊拉小组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但是，由于工人在理论上不成熟，又没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所以还不能认识到无产阶级与革命农民结成联盟的必要性。至于小组的领导，那很明显，他们甚至抛弃了民粹派遗产中的一

个好的方面，就是说，他们不相信农民。农民运动前途无望论（后来，多布罗加努一盖里亚更加充分地发展了这个理论）根深蒂固。由罗马尼亚机会主义首领们领导的雅西小组，与农民的革命斗争分离了，并且建议农民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不能说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人以后就不关心农村的状况了。况且，把土地问题列入第二国际布鲁塞尔（1891年）和苏黎世（1893年）代表会议议程的，正是他们的功劳。但是，第二国际采取了和平的议会斗争方针，忽视了农村革命的可能性，并且认为农民只不过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没有把农民看成无产阶级在未来革命中的同盟者和后备军。多布罗加努一盖里亚的理论正是这些普遍观点在罗马尼亚条件下的变种。

因此，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1893年通过的党纲，以及后来多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只是规定了一些治标的办法。这些办法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命运，也不能把农民从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至于农民要分配大地主土地的宿愿，[98] 连提也没有提。只是第五次代表大会（1898年）

由于无产阶级成员的要求，才通过一项决议，要加强农村工作，往农村寄发党所出版的报纸和小册子，以及在那里建立社会主义俱乐部。

党的领导通过这项决议是别有用心的。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思，即按他们最喜爱的"合法运动"的精神来解释它。问题在于，罗马尼亚的农村当局无条件地严守了这样的规则："法律就是（双马车的）单辕杆，你要它往哪边转，它就转到哪一边。"在行政机关的支持下，地主利用农民差不多都是文盲和对一切有关法律问题一无所知的情况，根本无视法律中旨在保护农民利益、使其免遭贪婪无厌的大地主侵犯的那几条规定①。

按照机会主义分子的意图，农村社会主义俱乐部应该成为采用"最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来反对周围非常严重的不公平事情的斗争中心。俱乐部章程说，为了使农民知道自己的权利，并能在大地主和当局面前捍卫这些权利，必须得到现行法律条文，首先是选举法和有关农业契约的法律条文。章程还规定俱乐部成员要实行互助，建议农民召开群众大会和会议，要求减轻苛捐杂税和奴

① 例如，禁止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地主地里干活。

役性的租赁契约的重压。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指望，被这些关怀所感动的农民将充实支持社会民主党人的选民队伍。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计划是微不足道的，它对资产阶级和地主没有任何严重的威胁。

但是，在罗马尼亚农村形势特别紧张的情况下，运动开始带来的并不是党的机会主义上层分子所指望的成果。工人代表满怀热情地在农村着手组织俱乐部。他们的号召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仅在1898年底到1899年初冬季这3个月的时间里，200个乡里都建立了俱乐部。在大会上进行辩论的主要问题，就是要求把土地分给农民。乡委员会的选举已不再是单纯形式主义的了；农民坚决要求选派自己的候选人。俱乐部显然变成了革命斗争的学校。

行政机关发出了警报。

这一时期是自由党执政。保守党决定用恫吓地主的办法来打倒对方。它的报刊开始用各种形式添枝加叶地详细报道社会主义者在农村，特别是在特列奥尔曼县的“破坏活动”，在那里，俱乐部的领导人似乎率领着农民起义队伍走遍了每个村

庄。保守党人给大地主出主意——跑吧，趁现在还不晚。而同时又指责自由党不能“整顿秩序”。

99 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新世界报》赌咒发誓说，党不寄希望于棍棒，而寄希望于法律的力量。莫尔聪在议会讲坛上要吓破了胆的议员们相信，尊重法律是俱乐部活动的重点。《新世界报》恳求农民说:“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起义反对法律和当局……不能侵占地主的土地，因为这是抢劫行为(!)。”但是谁也不听机会主义分子这一套。自由党决定采取强硬措施。结果，俱乐部的领导人和许多农民积极分子被关进监狱，他们体验到了实行残酷毒打与侮辱的那时罗马尼亚监狱制度的一切“美妙之处”。

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的背叛

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召开了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城市工人运动和乡村农民运动明显地摆脱了机会主义领导的控制。莫尔聪抛出一个放弃社会主义目标、把党改组成国家民主党的提案。这个提案是政治上的破产者企图在

工人中间保持自己的威信并且使运动脱离革命轨道的尝试。但是这个策略失败了。希望巩固党而不希望把它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们，发表了愤怒的抗议宣言。

从此以后，党的机会主义领导由于不能把运动控制在自己手里，便公开叛变了，并且暗中谋害工人。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几十个人，三五成群地或单独地投入了自由党的怀抱。

* * *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内所发生的事件是有很深的根源的。它发生的时间正好和欧洲舞台上革命力量同机会主义力量之间矛盾尖锐化的时间相吻合并不是偶然的。在德国，伯恩施坦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在法国，为了实践伯恩施坦观点，米勒兰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一道加入了反动内阁；在英国，在同布尔人进行战争的年代里，社会主义的许多领导人有过帝国主义性质的背叛行为；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经济派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为后者企图把工人运动限制在为戈比而斗争的狭窄框框里。

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了。与此同时，工人运动

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即向广度发展时期，也告一段落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曙光升起来了。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力量的两极分化过程加快了。

100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在确信他们引导工人阶级走“合法道路”的企图已经破产之后，便撕下假面具，不再卖弄社会主义，露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捍卫者的真面目。

他们的阴谋是很清楚的。他们以为使党失去领导之后，就会使它长期丧失战斗力，无产阶级就没有战斗司令部，因而他们就能够阻止工人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叛徒们指望他们所积累的投机和欺骗的经验，对自由党人会有用处，可以帮助后者加强资产阶级在工人中间的影响，借助于改良来延长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他们确实使无产阶级遭到很大打击。党分成许多零零落落的小组之后，就不复存在了。罗马尼亚全国唯一的社会主义报纸《新世界报》不久也停刊了。

但是，叛徒们的计划终究是无法实现的。他们的背叛激起了先进无产者的无比愤怒和革命者的强烈抗议。亚历山德鲁·扬涅斯库写道：“我们

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国际无产阶级红旗的忠诚战士，我们将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战斗。”帕希卡尼和普洛耶什蒂举行了抗议示威，布加勒斯特的工人俱乐部痛斥了叛徒，声明说，个别人可能会迷失方向或者离开我们，但是“工人运动是永存的”。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已经涌现出能够在几年之后重新建党的力量。

101

第四章　二十世纪初期的阶级斗争

经济状况

二十世纪这个新世纪给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10年的世界工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也冲击了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的政党瓦解了。工会遭到了经常不断的进攻。罗马尼亚的主宰者并不满足于警察迫害和降低工人生活水平这些“惯用”的手段，他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思想攻势。1902年颁布了行会法。按照立法者的意图，行会是要把小工业的工厂主和无产者联合起来，表面上是为了“和睦地”解决他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而实际上是为了把工人置于工厂主的严密监督之下。他们丝毫没有限制对工人的压迫。依法建立的“社会保险”也是独出心裁的：强迫工人缴会费，敢于抗拒的人，宪兵就没收其财产，有时还

把拒不缴会费的人关进监狱。收来的钱用于行会本身编制庞大的人员开支，一部分干脆被侵吞窃取了，只有剩下的一小部分是用于保险事业。

危机过后，罗马尼亚的工业发展速度加快了。享受国家优惠（根据保护工业法）的一些最大加工工业企业的数目，从1904年的346家增加到1910年的472家，而到1915年则为847家。到这个时候，比较大型的工业企业和运输业已拥有7万工人。

石油工业发展得最快：在二十世纪的头8年 102 里，石油产量增长了4倍多。食盐年产量达到13万吨左右。但是，送上地面的煤却不多——将近16万吨，而且主要是褐煤。

如果拿1901年—1915年大工业投资和产品价值增长总额来看，那么投资增长了33%，产值增加了138%。①

但是，这点成绩并不能改变经济落后的总的状况。作为经济独立基础的最重要的工业部

① 按货币计算(以百万列伊为单位)：

	1901年	1915年
投　资	247	329
产品价值	230	547

门——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却一无所有。一些小型铸造厂和只能修理而根本不能制造机车和车厢的机车修配厂，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同从前一样，享受绝对优先权的仍旧是轻工业、食品工业、开采工业这样一些部门。本国资本家，特别是外国资本家，都愿意向那些资金周转期较短、因而赢利也较快的生产部门投资。

罗马尼亚企业主扮演了他们外国同行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伙计角色。投入工业中的股份资本，至少有五分之四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外国人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制糖业、煤气厂和发电站，拥有化学工业四分之三的资本和木材工业三分之二的资本，等等。保护主义并不妨碍帝国主义所特有的资本输出。相反的，关税壁垒使外国投资家避免同外国商品进行麻烦的竞争，使他们能够毫无障碍地攫取巨额利润。

二十世纪初期，罗马尼亚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加紧实现垄断化。这是面粉厂主和酿酒厂老板们首先发起的。接着，制糖老板也效法他们联合组成卡特尔，利用很高的、实际上是禁止外国糖进口的关税壁垒，把糖价哄抬到空前的水平。

奇怪的是，罗马尼亚的糖在国外卖的价格要比产地便宜得多。卡特尔化也扩及其它部门。经营造纸业的工厂主们组织了自己的卡特尔，然后把纸价一下子提高了四分之一。这一时期，罗马尼亚还组成了石膏厂、石灰厂和水泥厂辛迪加，啤酒厂、酿酒厂和制革业的卡特尔。1908年建立的面 103 粉厂主、面包铺老板和制革企业主的几个联合会，公然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资产阶级地主国家本身也是一个大垄断资本家。国家手里掌握着如食盐、烟草和火柴这样一些最重要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国家还垄断纸牌、烟卷纸、火药和爆炸品的销售。

在联合过程中，迅速发展的石油工业也没有落在后面。同其它许多部门一样，在石油工业中，德国资本占第一位。在一亿七千万法朗的投资总额中(1905年)，大约有一亿二千五百万法朗是德国人的①。"本国的"投资是微乎其微的(450万法朗)。固然，二十世纪初期，为了争夺罗马尼亚的

① «工业、金融和贸易通报» («Вестник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финансов и торговли»)，1905年，第24期，第427页。这里引用的是大约数字。列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368页)引用的数字有些不同。

石油，德国人不得不同美国公司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他们打退了对方的进攻，而“胜利”的标志是煤油价格飞涨①，这就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外国资本束缚了罗马尼亚经济，并通过各种渠道从它身上榨取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偿付大量外债的利息占据首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罗马尼亚的国债已达18亿列伊的巨额，差不多等于6年国家预算的总和。政府的三分之一开支用来偿付外债利息（大部分是德国贷款）。加上外国投资利润、某些其它收入来源和那些只知道享乐的罗马尼亚人每年在国外挥霍掉的钱，罗马尼亚每年外流2亿列伊。

罗马尼亚输出的粮食占总产量的40%（它是欧洲粮仓之一），输出的石油占总产量的60%。覆盖着喀尔巴阡山山麓的森林中最贵重的树木——柞树和水青冈树——也被滥伐出口。进口的是机器、工业品以及大量的供统治阶级享受的奢侈品。罗马尼亚出口木材，而进口却是用这些木材制成

① 应该指出，在罗马尼亚的成功并不能挽救德国煤油大王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

的木器；出口牲畜和羊毛，而进口熏制食品、干酪、香肠、布匹。大地主往往拿一年的收入来买一辆小汽车。买一只“郎仁”牌手表就花费了一车厢粮食；一顶巴黎女帽的价格相当于一户农民一年的收入——这些很生动的比较，是前工商大臣尼古拉·克塞诺波尔在他的《罗马尼亚的财富》一书中列举的。几千个上层人物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千百万工人和农民却终生挣扎在贫穷之中。

104

二十世纪初期，随着工业的发展，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也越来越残酷了。增加工资的机会是很少的，而且总要经过顽强的罢工之后。在罢工期间，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生活非常艰难困苦。政府作出了剥削的榜样：从十九世纪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营铁路员工的工资连一个巴尼[1]也没有增加，而这一时期的生活费用却提高了50%。大型企业的劳动日通常达10个小时以上，至于几万个小工厂，劳动日从来就没有限制。工人们从早到晚地工作。70%的无产者每天能拿到3列伊（即比革命前的一个旧卢布多一点）的工资。1909年，康斯坦丁·波佩斯库医生进行过一次调查，描

① 巴尼是罗马尼亚的分币，100巴尼合1列伊。——译者

绘了无产者劳动和生活条件的阴暗图景。大多数工人的食品缺少蛋白质，很多工人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不仅迟到、损坏工具要罚款，而且对工厂主“不尊敬”也要罚款。这算是什么罚款！耽搁五分钟就要扣除日薪的四分之一，损坏一件工具大约要以10倍的价钱赔偿。据波佩斯库的描写，工人宿舍的情况如下：它通常是“木板房，长14米，宽7米，高5米，肮脏，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室内并排放着4行同样的床铺，一个挨着一个。床铺就是一块光板，连被单也没有。这里经常住着100人，其中许多人就睡在地板上。因为又挤又臭，所以，夏天人们宁愿睡在露天里”。

罗马尼亚农村的贫困已成为俚谚。在这个一小撮地主的收入相当于125万农民收入的国家里，情况必然是这样的。然而，从农民身上搜刮来的钱还“不够”地主们挥霍。他们债台高筑，欠债达六亿列伊。看来，地主掠夺农民的手段是不会穷尽的。虽然有些非法勒索是法律禁止的，但这丝毫没有使他们感到为难，因为地方当局完全是为他们效劳的。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农民必须把母鸡、小鸡、绵羊、鹅、鸡蛋和蜂蜜送给地主，而

所有这些东西都得按租赁契约规定的数量供给。农民还要对“保护”租地里成熟的庄稼缴费，虽然谁也没有保护过它。播种时老鼠和乌鸦造成的“损失”也要农民付钱。不还清地主的债，农民往往不能把小麦和玉米从租地里运回家。有时，契

105



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雅典宫”，现在是音乐厅。

约规定农民必须先收割地主地里的庄稼，然后才能收割自己的。结果，农民的玉米在地里霉烂了，用它做成的食物，吃了以后在农村引起了可怕的疾病——陪拉格[1]，这种病即使在罗马尼亚黑暗的农奴制时代也没有过。官方登记的陪拉格患者，在全国共有十万以上。五岁以下的儿童有三分之一死掉了。

106　罗马尼亚每五个人当中就有四个人目不识丁。乡村小学总共还不到4,000所，而小酒馆却多达20,000家以上。

几十万农民不仅没有土地，而且没有牲畜。在农村里，能够用自己的农具耕种地主土地的"业主"越来越少了。但是在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上当牛做马的农业工人大军却扩大了。在乡村，资本主义在农民的痛苦和眼泪中发展起来了。

到1906年，卡罗尔一世已"平安地"在位四十年。为此而举行了富丽奢华的庆贺宴会，宛如瘟疫盛行时举行的筵宴：头一年是个荒年，饥饿的农民涌进城里，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乞丐构成了官方

---

(1) 陪拉格（пеллагра）：玉蜀黍疹（一种皮肤病），又名糙皮病、意大利癞病。——译者

盛大庆贺宴会的背景。

二十世纪初期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二十世纪初期，工人运动养好了它所受的创伤并积蓄了力量。1900年，布勒伊拉港湾工人和布加勒斯特电车全体职工举行的罢工就已表明，妄图从背后突然一击就可以战胜无产阶级，这完全是幻想。已经分成零零落落小组的社会主义组织，为了聚集力量进行了细致而耐心的工作。1902年取得了第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成绩：社会主义报纸《劳动者的罗马尼亚》出版了。固然，它出到第23号以后，就因缺少资金而停刊了。但是，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机关报出版了，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革命斗争的脉搏在继续跳动着。

行会法的实行遭到了先进工人的抗议。1902年2月，行会法还在讨论过程中，布加勒斯特2,000名无产者就举行了游行示威，要求修改对工人特别苛刻的几项规定。在国会大厦旁边，他们同警察展开了搏斗，结果有很多人被捕。

即使在比较平静的1900—1904年间，罢工斗争也没有停止。在这几年里，有案可查的大冲突就有50次左右。在农村，不满情绪增长了，经常发生骚动和公开"叛乱"。规模最大的一次暴动发生在1900年秋天。这次暴动是由于政府企图增加某些税收，尤其是要增加农村出产的祖伊卡（一种用李子酿的酒）的税收而引起的。农民们把闯进他们小茅屋的税吏赶走了；他们奋起反对地方当局，最后同被派来镇压暴动的军队发生了冲突。运动扩展到兰尼库—塞拉特、特库奇、普特纳、福克夏尼、布泽乌、德姆博维察、普拉霍瓦、阿尔杰什各县，席卷60个村镇。讨伐队采取"惯用的"手段，换句话说，就是残酷地鞭笞全村居民，用这种办法使他们养成"尊重"法律的习惯。在有些地方甚至同起义者发生武装搏斗。例如，布达乡的500名农民就没有被从兰尼库—塞拉特县城开来的步兵营的刺刀所吓倒。军队开枪射击，打死三人，并打伤一些起义农民。温古里乌村（布泽乌县）的事件是更严重的转折点。派到这里来镇压"暴乱"的部队很多——一个步兵营和三个骑兵连。他们不得不同农民展开艰难的徒手搏斗，在搏斗过程中，

讨伐队的头目科恰上校被打伤。士兵们只是在进行实弹射击之后才驱散了人群。

1903年，参加过1877—1878年战争的退伍军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斗争，因为政府违背自己的诺言达25年之久，一直没有把多布罗加的土地分给他们当中的很多人。

1904年，农民运动掀起新的高潮。这一次农民运动的中心移到了普鲁特河以西的摩尔多瓦。农民暴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次，木材工业公司修建铁路侵占了农民的草地和田地；还有一次是一个投机商打算卖河沙和砾石；随着开采场的挖掘，摩尔多瓦的河水淹没了伊丽莎白夫人村（罗曼县）的草地。但是最常见的情况是，农民为了要求把国有土地卖给他们而奋起斗争。只要能多得到一小块土地，他们情愿终身负债。当雅西县宣布把一片国有土地分成93块出售时，马上就收到了1,000多份买地的呈子。出售土地的消息闪电般地传遍了全县。于是，农民就扔下地里的活儿（事情发生在八月份）赶到雅西，要求把国有土地卖完。这个运动发展到罗曼、图托瓦和瓦斯卢伊儿县。农民的行动是很温和的——他们情愿

过几十年可怕的困苦生活，情愿拚死拚活地干力不胜任的重活，也要得到（拿钱买！）土地。他们认为土地是自己的乳母，虽然实际上是他们的后娘。

但是，在农民请求得到土地和夺取土地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上面讲到的那些县和村庄的农民，在他们的请求遭到拒绝之后，就转而采取坚决行动。他们说："我们忍耐着，忍耐着，但是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既然国家不给我们土地，我们就自己夺！"在一些地方，他们赶着套好的马和公牛到地里去，说是时不等人，再不耕地就晚了。

在内格雷什蒂乡（瓦斯卢伊县）发生的冲突特别尖锐。在那里，几百名农民有意地耕了属于农业和国产大臣斯托伊切斯库的土地。急忙从邻县调来的军队（当局认为由本地人组成的军队不可靠）驱散了农民，于是表面上的"平静"又恢复了。在镇压苏胡列茨镇（雅西县）的暴动时也出动了军队。

108

所有这些工人和农民暴动，只不过是1905—1907年暴风雨的预兆。

1905—1907年的革命高潮

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影响

1905年1月，全体劳动人民被沙皇在冬宫前面血腥镇压彼得堡无产者和平游行队伍的消息所震惊。罗马尼亚工人阶级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社会主义小组发起在首都“爱弗里亚”大厅召开了抗议大会。继首都之后，雅西、克拉约瓦、巴克乌、康斯坦萨也召开了同样的抗议集会。人们如饥似渴地等待着俄国的消息，来自那里的报纸被迅速抢购一空。

1月27日，专门为俄国革命而创办的报纸《打倒专制！》出版了。报纸用头版头条发表了声援俄国革命的工人小组宣言。这一号报纸还刊登了一篇题为“末日来临了”的文章，文中指出，只有组织性和忠于本阶级的利益，才能使俄国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报纸还发表了已经成为俄国1905年战士的真正颂歌的高尔基的《海燕之歌》。

俄国革命推动了罗马尼亚群众性工人运动的

发展。工人一直在抵制行会，而且在会议上他们也常常同工厂主发生冲突。1905年，在奥尔特尼察发生了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这里的行会组织者想召开一个隆重庆祝行会旗帜的大会，结果他们自己出了丑：从500人当中，他们总共只集合起来15个人。工会与行会并存，而工会有时就是在行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工会即木工工会，是由伊·克·弗里木领导的。木工工会成立大会通过的决议说："参加行会对工人没有任何好处……工人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

调和主义情绪在无产阶级中间逐渐消失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分散在数百个工场里并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制鞋工人工会的建立，是非常典型的。在"工厂老板"也参加了的制鞋行会的一次会议散会之后，工人们没有走散，而是继续开会（这时只有工人自己），结果在阶级斗争的原则基础上成立了工会。看来，很难找到比这更清楚的实例来说明行会幻想已开始破灭！

1905年，罗马尼亚的罢工运动浪潮空前地高涨起来。第一次大罢工发生在坎皮纳的最大垄断

组织“罗马尼亚之星”油田。随后，布加勒斯特的铁工和土尔努一塞维林的造船工人也举行了罢工。7月，首都制革工人举行了大罢工，随后，普洛耶什蒂、巴克乌、兰尼库一佛耳恰和博托沙尼制革工人也相继罢工。许多城市的面包工人、装卸工人、印刷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反动报纸《时代报》后来承认：“就罢工的次数来说，布加勒斯特可以同最大的城市（欧洲的——作者）相媲美。”

109

在罗马尼亚统治者遭到困难的这个时刻，革命的装甲舰“波将金”号驶抵康斯坦萨港，它的水兵们决定被拘留在罗马尼亚。当地居民举行的欢迎会表明，他们是把水兵们作为英雄看待的。装甲舰起义的参加者、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累切夫回忆说：“岸上以暴风雨般的欢呼声迎接我们。他们欢声雷动，沿岸各处都此起彼伏地发出这样的欢呼声……我们明白了，是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团结纽带把全世界无产者连结在一起。”

当局却对水兵们组织了另外一种欢迎式：水兵们被押送到当地驻军一个团的营房里。罗马尼亚政府显然由于怕同数以百计的革命水兵的家属打交道，所以就把他们分成许多小组，遣送各地。

但是，这种办法却产生了完全出乎罗马尼亚反动派意料的效果：在几十个城市里，甚至在农村里，出现了俄国革命的一些生气勃勃的参加者，即俄国革命思想的传播者。在累切夫和他的同志们居住的坎皮纳，他们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帮助五金工人成立工会。在普洛耶什蒂和加拉茨，"波将金"号的战士们参加了罢工斗争。流落到农村的水兵们就在那里进行革命宣传。鉴于这些"造反精神"的传播者对"轻信的"农民的影响，资产阶级报刊也发出了警报。

1906年，罢工的浪潮也没有低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为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准备的工作报告指出，仅在布加勒斯特一地就发生了56次罢工，加拉茨有13次。最有意义的是布加勒斯特的制鞋工人、马具工人、木器工人、邮递员和店员、土尔努—塞维林造船工人的罢工以及规模特别大的加拉茨罢工。

加拉茨港湾工人是要求并实现了增加工资的首创者。然而，当局虽作出一些让步，但是却开除了几名"教唆者"。这就成为新的罢工信号。港湾工人表现了高度的团结性，坚决要求停止迫害。

管理局向当局提出请求，当局立即响应，派出500名步兵部队到港口来进行大逮捕。但是，武力威 110 胁和镇压手段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工人更加顽强不屈。城里一连几天举行抗议示威。总罢工已酝酿成熟了。布加勒斯特和康斯坦萨的工会代表答应支持总罢工，而布勒伊拉的工人使者保证说，该市的工人决不怕宣布声援总罢工。企业主和当局被他们掀起的暴风雨吓坏了，于是只好收回前言，并作了让步。

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强烈地感到工人运动在组织上的分散性，感到缺少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在初期阶段即使有一个统一的工会领导中心也好。

8月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有94名代表出席的代表会议，他们代表4,500名有组织的工人；在这次会上成立了总工会①。这在工人运动史上是一大进步。代表会议激烈地反对行会，认为它是“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号召工人同它进行积极的斗争。代表们十分重视罢工运动，强调指出，罢工应该进行周密的准备，应该有很好的领导。

① 到1906年底共有90个工会。

但是，代表会议未能很好地解决政治问题。它仅限于希望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但在这方面却没有采取任何切实可行的步骤。当时工人运动的特点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千千万万的半手工业无产阶级群众中，有组织的工人仍然是不多的。甚至到1915年，在几万个“企业”（其中很多企业的厂房就在厂主人及其全家老少吃、喝、睡的破房子里）里从事劳动的26万人当中，大工业无产阶级只有7万人。但是在现代化的工厂和运输业工人中，参加工会的人还不到10%。不久前才从农村来的人和以前的手工业者，是小资产阶级偏见、谬误和幻想的源泉。

象阿·康斯坦丁尼斯库、什特凡·乔治乌、伊·克·弗里木这些忠于本阶级、革命精神饱满的领袖，都是专心致志地从事吸引群众参加工会的活动。但是在解决理论问题上，他们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成熟性。机会主义分子就利用这一点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1899年的叛变之后，机会主义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罢了。以多布罗加努—盖里亚为主要代表的孟什维克派的观点，代替了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当盖里亚青年时代的朋

友——纳德日德、莫尔聪、迪亚曼迪叛变的时候，人们曾多次要求他就叛变问题公开表态，甚至在报纸上要求他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不管怎样要求，盖里亚还是缄默不言。后来，他发表了几篇文章，事实上是为叛徒作辩护，并引证了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例子，说什么罗马尼亚人是屈服于总的潮流。 111

机会主义的杆菌在继续腐蚀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就连罗马尼亚工人运动最优秀的领导者也崇拜德国社会民主党，而看不到它内部的腐败。它在国会选举中获得的令人头晕目眩的胜利使人相信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也为盖里亚的关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铺平了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成绩，使德国人荣誉的光辉黯然失色了，而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的很多参加者却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将从西方来。这就导致轻视政治斗争，1906年工人运动代表会议的决议就说明了这一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被搁置下来了。政治问题只提出了几点，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求普选权。代表会议具有重大意义只是支持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

聚集在布加勒斯特的代表们，在一项特别决议中热情洋溢地欢迎俄国发生的事件，号召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给予俄国兄弟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决议说："推翻沙皇制度对于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工人运动的发展将是一个推动。"

但是，在对待俄国革命的态度问题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运动中各派的观点也不一致。革命派的代表一再强调把"俄国经验"推行到罗马尼亚的重要性。"我们的任务就是从俄国所发生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早在1905年1月在爱弗里亚大厅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弗里木就是这样讲的。

然而，在《劳动者的罗马尼亚》各小组的领导当中，机会主义的多数派完全不想沿着"俄国的"即革命的道路前进。

改良主义的领导路线还表现在忽视土地问题上。土地问题甚至没有列入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这件事竟发生在一个农业人口占五分之四、而不与农民结成联盟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国家里，发生在农村暴动从未停止过的国家里！

1905年也不例外。关于出售国有土地和地主

土地的要求，源源不断地送到参议院。忍饥挨饿的农民(头一年夏天遇到了旱灾)多次袭击了地主的粮仓。秋天爆发了几次公开的“叛乱”。

1906年斗争更激烈了。春天，苏恰瓦县的一些村镇居民，试图收回不久前被地主用种种阴谋诡计强占去的土地。只是在讨伐队开来之后，才恢复了大地主的“权利”。要求降低暴涨的租金运动广泛地展开了。指望得到土地而被欺骗的参加 112 过1877—1878年战争的退伍军人，在继续闹风潮。他们拒绝参加卡罗尔·霍亨索伦即位四十周年的庆贺典礼，反而决定组织向布加勒斯特的抗议进军。政府好容易才说服他们只派一个代表团去。就在这时候，对罗马尼亚农村来说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即农业工人罢工展开了。

发生冲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这就表明农民试图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减轻自己的苦难。他们力争放宽地主和国家的租赁条件，要求出售土地，为争取归还被非法侵占的土地而斗争，要求减税。几十年来一直在打官司，但结果一无所得。因此，农民的仇恨越积越多，而到英雄的、流血的1907年就非常猛烈地爆发了出来。

1907年农民起义的开始
摩尔多瓦运动

燎原之烈火首先是在摩尔多瓦北部燃起的。这里的农民暴动从头一年起就没有停止过。因为同俄国比邻，所以这些县的居民知道俄国革命的消息比其它县的居民快一些。俄国革命不仅对这里的1907年事件有影响，而且无疑地影响到全国。1907年3月29日，一位到过罗马尼亚的《敖德萨消息报》记者在该报写道："我通过我的翻译问农民，你们这里了解俄国的情况吗？你们知道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同我交谈过的那些人，都很清楚地知道我们的'起义'，虽然他们只关心解决土地问题。"

富有的大租户菲谢尔家族成了摩尔多瓦北部的无冕之王。他们承租了几十片地产，总面积达15万公顷，然后把这些土地分成小块转租给农民。完全依赖于他们的农民有5万户。因此，菲谢尔家族的地租关系到25万人的生死问题。

为了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走投无路的农民，

1907年，菲谢尔家族决定把订契约的时间推迟到早春。播种季节临近了，但是他们的代理人甚至拒绝谈论这个问题。2月8日，一个有着象征性名字的村庄——“弗列门兹”(饥饿的)村——的农民，又一次到管家康斯坦丁尼斯库那里去请求。可是，他却挖苦地要农民忍耐和等待大租户俯允他们订契约，如果他们“不想走到靠一头山羊养活[113]一家七口这种地步的话”。农民们向当局呼吁，但是在这里也得不到支持。于是，积压了几十年的仇恨的怒火爆发成了起义的熊熊烈火。

运动发展很快，3月初就扩展到普鲁特河以西的摩尔多瓦。成群结队的农民袭击了保存契约的乡公所，烧毁了这些可恨的文书。为了迫使地主让步，他们便决定进城，因为吓得要死的大租户和地主都跑到城里求救去了。宪兵警察阻止农民队伍（罗马尼亚称为游击队）前进，于是就在城墙下面展开了激烈的流血冲突。

3月4日，这些冲突首先发生在博托沙尼城附近。布置在这里的一营步兵动了刺刀，但是挡不住起义农民的进攻，他们退到了市中心。只是在他们开枪打死一些人，而调来增援的两个骑兵

连的马队也向农民进攻之后，他们才把农民从城里赶出来。但起义者控制了整个博托沙尼县，因此，3月6日县长向首都打了两次电报，拚命请求救援。这类电报从全国各地纷纷打到布加勒斯特，以致惊慌失措的政府，不知先往什么地方派兵为好。

摩尔多瓦的古老首都雅西四面楚歌，处于起义村庄的包围之中。4万名起义者从四面八方逼近雅西。集结在雅西的1万名士兵好容易才打退了他们的进攻。

3月7日清晨，2,000名农民冲进了瓦斯卢伊城。在县政府大厦旁边同警察宪兵发生了冲突。在11人被打死、很多人被打伤之后，农民才撤退了。4天之后，在港口大城市加拉茨发生了一个更悲惨的事件。加拉茨郊区住着许多务农的居民，他们积极响应农民起义，并且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试图同当局谈判引起了一次流血事件，14人被打死。指挥骠骑兵进行这场大血战的是安东尼斯库中尉。从此，罗马尼亚未来的血腥的独裁者和希特勒在这个国家的走狗就官运亨通了。

瓦拉几亚起义

就在这个时候，起义已经发展到瓦拉几亚。政府感到镇压起义者的军队不够用，于是决定征召后备兵。集中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特列奥尔曼县）的后备兵拒绝服从动员令，并且举行了群情激愤的游行示威。周围村庄的居民也积极行动起来，并向亚历山大里亚进军。《世界报》记者报道：114
“一场真正的内战在街道上爆发了。”军队与前来助战的商人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但是整个特列奥尔曼县仍控制在农民手里。在离县中心土尔努—默古雷列城只有5俄里的地方，许多地主庄园在燃烧着。在一些城市，当局由于不相信士兵而把武器发给有钱的公民。农民队伍从特列奥尔曼出发，经过邻县弗拉什卡向布加勒斯特进军，沿途烧毁了地主庄园，各地居民不断地充实他们的队伍。一些小规模的讨伐队无法阻挡起义者的进攻，纷纷撤退了。起义者的口号是：“我们要土地！我们要你们的脑袋！”这口号吓得地主和资产阶级胆战心惊。布加勒斯特周围的18个要塞都进入战斗

戒备状态，并有重兵驻守。然而，起义者没能够到达首都。他们缺乏组织的分散的队伍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残酷镇压。下面就是一位目睹者对距离克列扎尼村不远的一次镇压的描述："这不是战斗，而是大屠杀。用机枪扫射起义者……几百个农民被打死打伤，其余的都惊恐地跑进附近的森林里去了。"

政府建立了由步兵、骑兵和炮兵组成的机动部队，"扫荡"起义的各县。但整个瓦拉几亚都起义了。因而许多村庄都被炮火彻底摧毁了。但就是这样做有时也不足以"戡乱"。

贝列什蒂乡的事件表现了农民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在这里，甚至炮火也帮不了政府的忙。在两边房屋都燃着熊熊烈火的街道上，进行了一场真正的鏖战。男人、妇女和儿童筑起了街垒。步兵营只好用刺刀把他们从那里赶出来。即使是根据司令部的显然被缩小的证明材料来看，这个乡就有 42 人被打死，100 人被打伤。

镇压农民的军队有 14 万。起义时间不一、没有组织、没有武器的农民，抵挡不住这样大的兵力。起义失败了。于是，在罗马尼亚的大路上，无

数被捕者的队伍代替了起义者的游击队。1907年3月30日，《俄罗斯言论报》记者报道了他见到一支被捕队伍时的情景："路过兰尼克一塞拉赫（萨拉特——作者）车站时，我们从车窗看到了这些被讨伐队捉住的俘虏。他们正沿着林荫道走着，乍一看去，被捕的农民将近有300人，大约每50—60人分为一队。每个农民的脚上都加上绊绳，每一队人的手都用绳子成串地捆绑着。他们破衣烂衫，低垂着脑袋走着。两边是骑兵讨伐队押解，军刀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大路两旁扔下了许多"在试图逃跑时"被枪杀和被砍死的起义者的尸体。但是，那些被"平安地"押送到监狱的人会羡慕死者的——他们遭到了多么可怕的侮辱啊！宪兵们挥舞拳头打他们的脸，敲掉他们的牙齿，揪掉他们的头发，用皮靴踢他们，用树枝跟在后面抽打他们。 115

在战斗中牺牲的、被枪杀的、在刑讯室被管死、折磨死的烈士有11,000人——这就是讨伐队"行动"的总结[1]！几十万人成为孤寡，无人养活，

① 见格·乔治乌一德治：《论文和演说集》，第1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162页。



弗拉什卡县佩尔雷塔乡被枪杀的农民起义者。

而且往往无家可归。在罗马尼亚的大地上到处是呻吟声。

* * *

就其内容来说，1907年起义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农民为土地而斗争。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纲领。他们的要求起初是有局限性的，并且集中在降低地租和提高农活工钱上。

遭到大租户和地主的拒绝之后，起义者才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袭击乡公所，到城里去逼迫躲

藏在那里的地主们让步。这样做也没有成功，他们就转而捣毁地主庄园，分地主的地。

值得指出的是，在起义爆发较晚的瓦拉几亚，116 起义具有非常激烈的性质。起义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吸取了摩尔多瓦事件的经验：摩尔多瓦当局利用农民的幻想，在很多地方一面玩弄谈判把戏，一面集结军队，然后军队用火和剑把运动镇压下去。在瓦拉几亚，农民同地主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殊死战。起义农民竭力要消灭大土地所有制本身。

运动所引起的深刻的政治危机，证明了这次运动的威力是多么大。执政的保守党惊慌失措，无法扑灭革命的烈火。在国会里，保守党的支持者强烈不满内阁行动的"不够坚决"。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当把一项与起义无关的法律草案条文分发给议员们时，有些议员竟把它撕毁了，并且在愤怒之下用脚踩它。

在起义的烈火烧得正旺的时候，自由党人取代了保守党人，并且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把运动镇压下去了。但是，自由党的领导者，首先是自由党崭露头角的著名人物小扬·布勒蒂亚努懂得，仅

仅用鲜血是不能把人民的愤怒烈火浇灭的。在1908到1910年间，实行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此后，地租可以征收货币，也可以征收农产品（对分制）。禁止采用纯粹的工役制（即农民租了地以后，必须给地主耕种一定数量的土地）。规定了地租的最高数额和农活的最低工钱，还实行了一些其它措施。所有这一切都很少能减轻劳动农民的苦难，因为在规定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的县属各委员会里，地主占多数，他们是当然不会让自己吃亏的。那些旨在加强富农阶级的措施具有更积极的作用，因为自由党把富农阶级当作它在农村的支柱。属于这类措施的有：保障信贷法案，关于有权建立承租大片地产的协会的法案。

引起1907年起义的原因一个也没有消除。农民缺少土地的现象仍旧和从前一样。而乡村宪兵队却增加了一倍半。这就有力地说明，罗马尼亚统治者对农民暴动的恐惧心理并没有消失。

工人阶级与1907年农民起义

工人运动对农民非常关心，农民的困苦生活

在无产阶级中引起了深切的同情。社会主义书籍在农村流传着。但是还没有科学地制定出一个土地纲领。改良主义思潮妨碍工人阶级清楚地认识到罗马尼亚土地关系的全部复杂性，转移了他们对国内政治斗争的注意力，使他们消极地等待西方革命的胜利。就连优秀的做实际工作的领导者，也还没有理解工农联盟的思想。这一切都反映在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小组的立场上。

有许多证据说明，无产阶级非常关心起义农民的要求，他们参加了农民暴动，并准备为捍卫农民利益而洒自己的鲜血。117

3月3日，工人和农民在帕希卡尼车站举行了一次著名的联合暴动。在这里的铁路上干活的，有不少人是从周围农村来的季工。铁路员工同农民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国内爆发的起义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响应。

当一列载着几车厢被捕起义者的火车驶抵帕希卡尼时，一群非常果断的农民在车站上等着它，决心用暴力来解救自己的伙伴。铁路员工支持他们，并率领他们袭击列车。一些被捕者得救了。宪兵和赶来援助的一营士兵先往天上开枪，然后

立即向人群射击，驱散了聚集在那里的人群。

第二天和3月6日，在布胡希举行了有农民、当地纺织厂工人和店员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放宽农业契约条件。当局不得不再次诉诸武力以驱散游行队伍。

最大的石油产地普拉霍瓦也不安宁。3月12日，《世界报》报道了石油开采中心之一——坎皮纳市的"工潮"。警察局长慌忙请求特务机关派遣侦探到普拉霍瓦县来监视工人。同时大部队也开到那里。工人们积极参加了我们在前面已谈过的加拉茨事件，他们同农民一道为在那里实行的镇压付出了牺牲。

首都无产阶级掀起了工潮。过了许多年以后，这次工潮的一位领导者米哈伊·格奥尔基·布若尔写道："在镇压时期，布加勒斯特每天都召开抗议大会。工人们沿着象特别戒严时期那样布满了军队和警察的街道前进。"政府对铁路罢工怕得要死，因为铁路一罢工，它要运送军队和镇压起义就困难了。于是，政府就规定一部分首都铁路员工按战时状态进行工作。

但是，无产阶级的支援和同情还没有发展为

工农统一战线。乔治乌—德治同志指出："罗马尼亚年轻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还不高，又没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所以还不善于把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结合起来。"①

118

各社会主义小组的言论，反映出革命分子在土地问题上不同意见的斗争和理论上的模糊不清，也反映出机会主义领导力图把运动引向改良主义道路。

布加勒斯特小组和总工会"致首都工人"（3月9日）的热情洋溢的号召书，表明了无产阶级深切地同情起义农民。宣言说："被压迫的农民，这个大地主的永世农奴、土地的奴隶、横遭统治者侮辱的奴仆，现在抬起头来了。通过谈判途径获得一小块土地和以沉重的劳动挣一碗玉米粥的希望破灭之后……农民起义了。"米哈伊·布若尔和他的一批同志曾向应征入伍的工人发出呼吁："不要向自己的农民弟兄开枪！"——这个号召书是当时最卓越的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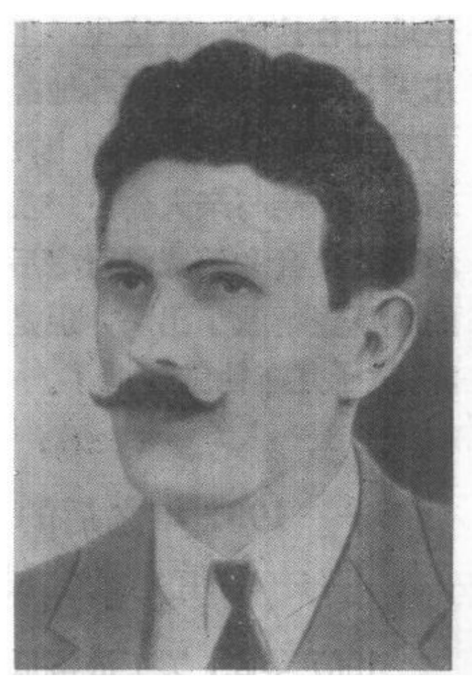
① 乔治乌—德治：《论文和演说集》，俄文版，第1卷，第326页。

我们一方面指出这个号召书具有很大的勇气并充满着革命的热情，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它的缺点：它只是针对一小部分工人的，因此，不言而喻，它既不能代替明确制定的土地纲领，也不能代替有关起义的行动计划。在很多工人小组的号召书中，有关土地问题的主张反映出改良主义的影响还很大。例如，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小组"致工人、农民、大学生"的号召书中，就把起义看作"最危险的"、而且也是"效果最小的"斗争形式。号召书说："农民们！你们不能靠起义来争得解放，你们也不能用威胁和破坏手段来得到什么可靠而有益的结果。"机会主义的侏儒建议巨人般地巍然挺立起来的革命农民为在罗马尼亚实行普选权而斗争。毫无疑问，机会主义分子奉行的消极政策以及他们诱导工人阶级不要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努力，都促使起义遭到失败。

把农民镇压下去之后，罗马尼亚的寡头统治者就认定攻击工人运动的时机到来了。加拉茨市成了事变的中心。在残杀农民和工人之后的春天，这里充满了深仇大恨。罢工时而在这个企业时而在那个企业里爆发。6月里，罢工发展到罗马尼

亚最大的"戈兹"木器厂和电车工人。市长伊·阿塔纳西乌（1899 年解散社会民主党时的一个罪行累累的叛徒）由于无限渴望改正自己在青年时代的"过错"，便迅速非法地禁止在城市里举行公开集会，派兵去看守工会会址。为了回答行政当局这种专横行为，全市举行了总罢工。工人们异常巧妙地避开了禁令。罢工者跑到布拉特什湖，站在没膝深的水里召开了群众大会。你要是把这种 119 行动算作"街头集会"那是困难的。

无论是当局还是企业主，都没有料到工人会这样迅速而果断地对付他们的挑衅行动。结果是资本家遭到了损失。港口停工给他们造成的损失特别大。于是他们让步了。根据他们的坚决要求，市政府



罗马尼亚革命家什特凡·乔治乌。

取消了集会禁令。此外，工人们坚持在加拉茨召开了罗马尼亚总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55个工会的代表，它们的会员总数达8,500人。就是说，差不多比一年前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时多一倍。

在加拉茨遭到失败以后，政府和企业主们急忙在其它地方进行报复。康斯坦萨的工会被封闭。120 在普洛耶什蒂，警察对《劳动者的罗马尼亚》小组住地进行搜查。在这里，工人爱戴的领导人什特凡·乔治乌被逮捕了。他经受了监狱制度的一切苦难——睡在水泥地板上，忍饥挨饿，不能读书和写作，不能与亲人会见。虽然工人们在举行群情激愤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之后把自己的领袖从狱吏的魔爪里解救了出来，但是乔治乌的健康已被毁坏，过了几年他就逝世了。

1907年之后的工人运动
重建社会民主党

1907年底，罢工浪潮低落了。俄国革命被镇压下去了，罗马尼亚本土的农民起义失败了，工人

受到压制，他们的领导人横遭迫害，工会被解散了——所有这一切同已经爆发的工业危机一样，都是开展工人运动的不利条件。

1909年，特务机关策划了“谋杀”政府首脑扬·布勒蒂亚努的事件。首相当然是安然无恙的，但是惩罚的全部灾难却落在与这个事件毫无关系的工人组织身上。

同年，通过了禁止在国营企业中建立工会的所谓“奥尔利亚努法”。1912年，政府又对工人组织进行了一次打击：根据“内尼采斯库法”，从前只存在于小企业中的行会，在大企业里也建立起来了。

1907年以后，参加组织的工人人数急剧下降了。1910年，在全国范围内，参加工会的总人数还不到4,000人。

在这样情况下，强烈地感到缺少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政党。1907年建立的社会主义联盟，起了从小组到党的过渡阶段的作用。但是，它未能制定纲领，也不能把工人运动团结到一起。

1910年2—3月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重

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站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序言指出，党的目标是消灭对劳动的剥削，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制。党纲接着讲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党力求夺取国家政权。党纲还包括了一些最重要的一般民主要求：普选权，集会和罢工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平等，等等。

代表大会很明显地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它把在国会选举中争夺选票作为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代表大会没有吸取 1907 年大起义的教训，也没有制定能够把农民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的土地纲领。大会未能确定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正确关系，也没有保证党对工会的应有的领导。

121

尽管代表大会在解决一系列问题时有前后不一、甚至有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它标志着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史上的一大进展。1910 年，工人运动掀起了高潮。劳资之间的冲突增多了，而且接连不断地发生。工人阶级在他们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往往蔓延到另一个工厂，然后席卷全市。1910—1914 年间，罢工共

达250多次。其中最大的几次罢工是：布勒伊拉港湾罢工，1910年布加勒斯特印刷工人的总罢工，1912年普洛耶什蒂和布勒伊拉的总罢工，1913年加拉茨、巴伊亚—莫雷尼和普洛耶什蒂的总罢工。

农村状况

反动统治者在农村里也得不到他们所期望的安宁。缺少土地、贫穷、奴役性的租赁契约——这一切都仍旧和从前一样。

1907年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以后，反动派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不会发生新的总起义了。但是，农村潜在的各种忿懑情绪业已成熟，每年都有新的暴动消息。

政府十分恐慌地发现，社会主义宣言正在农村传播。1908年春天，贝尔切什蒂乡（雅西县）的农民捣毁了乡公所。摩尔多瓦的一些县里爆发了"农业罢工"——农民拒绝耕种地主的土地。骑兵被派往农村去援助宪兵队。他们用毒打和逮捕手段镇压了"固执而任性的农民"。在以后几年里，在瓦拉几亚也进行了类似的讨伐，因为农民曾接

连不断地抗议无法忍受的租赁契约的重压，要求得到土地，拒绝给大地主干活，在个别情况下，甚至试图分地主的土地。

罗马尼亚与巴尔干战争

到1912年，笼罩在巴尔干的紧张局势已发展为战争。塞尔维亚、黑山国、保加利亚和希腊对土耳其宣战，并且夺回了在这之前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和希腊领土。

罗马尼亚没有任何理由干预这场冲突——它早在1877—1878年就完全摆脱了对土耳其的依附，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士兵共同用鲜血巩固了这个年轻国家的独立大厦。

122 但是，当其它巴尔干国家政府在使本国领土归于完整时，罗马尼亚寡头统治者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布加勒斯特统治者对侵占别国领土充满了无法抑制的贪欲。所以，当巴尔干同盟国之间由于没有就和睦协商分配从土耳其手里夺回来的土地达成协议而爆发战争时，罗马尼亚干预了这场冲突。

1913年，保加利亚军队进犯塞尔维亚。希腊和昨天的敌人土耳其支援了塞尔维亚。随后，罗马尼亚寡头统治者也参战了。它向保加利亚人发起进攻，而保加利亚人没有料到罗马尼亚会从北面进攻，因此派到保罗边界线上的只有少量的阻击部队。罗马尼亚军队很快地就逼近索非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保加利亚政府只好投降了。根据同年在布加勒斯特签订的和约，主要是保加利亚人居住的南多布罗加划归罗马尼亚。

虽然罗马尼亚军队甚至没有开枪，但是战争却暴露了罗马尼亚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不发达的工业无法保证供给军队所需要的一切，侵吞公款的行为从上到下把军需机关盗窃一空。军官们不熟习新式作战方法。由不适合军事运输的马车和农民的疲惫不堪的瘦马组成的辎重队，毫不中用。除了这些灾难之外，军队中还发生了霍乱流行病。医务人员和药品都不够用，结果使许多团、师死亡枕藉。

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器竭尽一切努力，极力在群众中煽起沙文主义的火花，追述过去对保加利亚的某些要求和罗马尼亚在巴尔干据仲裁者地位

的必要性。但这些努力毫无结果——对保加利亚的远征不仅没有缓和国内局势,相反的,却使国内局势更加紧张。每个应征入伍的农民都看到了,多瑙河彼岸的邻邦那里并没有地主,因此,打完仗回来就更加痛恨本国的大地主了。罗马尼亚统治者的掠夺成性的作法,使先进工人感到愤怒和耻辱。有些城市举行了抗议示威,而以什特凡·乔治乌为首的普洛耶什蒂的一批无产者,则发表了异常激烈的宣言:“对战争宣战。”

1914年,罢工运动没有平息。首都中央机车修配厂的铁路员工首先罢工。3月,布加勒斯特印刷工人举行了罢工,一个月之后,面包工人也奋起进行罢工斗争。但是,6、7月间首都的电车司机和售票员同行政当局的冲突是最顽强的。电车职工要求减轻无法忍受的沉重的劳动条件,因为在这些劳动条件下,他们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在举行罢工的同时,各行各业的成千上万工人召开了群众大会,举行了示威游行。事情常常闹到同警察展开徒手搏斗的地步,结果有些人被打死,许多人被逮捕。

最后,罢工工人终于迫使行政当局让步了。

巴尔干战争结束后，罗马尼亚统治者没有喘 123
一口气就急忙着手加强“国内战线”的防御。自由党领袖的兄弟、该党的一个著名活动家文蒂拉·布勒蒂亚努认为，必须严肃地警告地主和资本家，如果工人运动的力量同农民运动的力量联合起来，罗马尼亚就要爆发革命了。

公认的改良专家——自由党人，开始鼓吹分给农民（当然是赎买）一小部分土地，扩大选举权。1914年初，不肯让步的保守党让位给扬·布勒蒂亚努政府，这个政府应当筑起一道改良的堤坝，以防止工人和农民运动的发展。

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些策略猝然中断了。

124

第五章 1849—1914 年的特兰西瓦尼亚

1848—1849 年革命后反动派的策略

反动派虽然于 1849 年在奥地利帝国取得了胜利，但它终究未能恢复腐朽透顶的封建制度。狂热地帮助奥皇扑灭匈牙利革命的弗兰茨一约瑟夫和尼古拉一世也无法阻止历史的进程。哈布斯堡王朝进入了危机时期，这一危机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它的解体而告终。

特兰西瓦尼亚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农奴制的崩溃。维也纳的寡头政权未敢侵犯 1848 年的土地改革，它知道这种玩火行动是做不得的。这个地区有 17 万块土地被农民赎回了，但在其它方面，最黑暗的反动势力仍然统治着特兰西瓦尼亚。这一地区到处是军队和奥地利的官吏；实行着严格

的书报检查制度；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的边防部队也都补充到奥地利军队里；一切都由维也纳直接管辖；德语成了官方正式用语。这就是奥国皇帝给予他的“可爱的罗马尼亚人”的报酬，而他们曾天真地认为从奥皇尊贵的手中能够获得民族权利。

就这样延续了十年，当奥地利的统治者在同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战争（1859 年）中又遭到失败之后，他们意识到单靠武力这根支柱来维持统治是很不稳固的，以武力为基础不仅不稳当，而且很危险。因此，他们采取了同资产阶级接近的步骤。实行政治制度的“宽容化”：在奥地利制定了宪法，建立了两院制的议会。在特兰西瓦尼亚（在锡比乌），以拥有巨额财产为资格而选出的地方议会也于 1863 年开始进行工作①。它通过了关于采用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和德语三种语言作为官方用语的法律。 125

但过了三年，奥地利的政策又发生了重大的

① 在议会中居少数的匈牙利族议员几乎全都拒绝参加会议。两年之后，议会遵照奥皇的诏书迁到了克鲁日，而重新制定的选举法则保证了反动的匈牙利地主在议会中占优势。克鲁日议会决定赞同将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匈牙利。

变化。1866年奥普战争时在萨多瓦遭到毁灭性的惨败之后，哈布斯堡王朝急不可待地要寻找一个支柱以维持它摇摇欲坠的政权。这样的支柱终于找到了——它同不久前的敌人匈牙利地主结成了联盟。多灾多难的特兰西瓦尼亚成了替罪羊。按照1867年协定，原来的奥地利帝国变成了二元制的奥匈帝国，特兰西瓦尼亚残存的一些自治权利都被取消，并被并入了匈牙利王国，而锡比乌议会所通过的一切法令都被废除了。

协定给奥地利资产阶级提供了销售工业品的广阔市场，为匈牙利地主创造了出售农产品的广泛条件，并保证他们不仅有奴役匈牙利农民而且有奴役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农民的“权利”。

在当时多民族的匈牙利，实行一种最简单的议会制度是不会使匈牙利地主和资产阶级感到满意的，因为这将使他们有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危险。因此，在匈牙利的历届内阁中，不论这些内阁属于什么党派或政治态度如何，它们的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力求实现中央集权，压迫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而这部分人加上德国人就构

成王国居民的大多数。

1868 年关于民族成份的一项法律，竟然无视事实，宣称在匈牙利只居住着一个民族，即马扎尔族，其他民族都以它为代表。匈牙利语被宣布为唯一的官方用语，在议会中只允许用匈牙利语。在其他机构中使用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和斯洛伐克语也受到很大限制。

同年颁布的教育法还规定，在大学[①]和国立学校里必须用匈牙利语教学。

1874 年制定了一项新的选举法。它规定只有那些年收入不少于 72 弗罗伦金币（获得这个收入至少要有 10—12 公顷土地）的土地占有者才有选举权。换句话说，在农村里只有富农和地主是选民。在城市里则只有那些拥有一套房（至少三间）的房产主才有权参加选举。妇女、文盲和所有的仆役都没有选举权。不懂匈牙利语的人都算作文盲。这项规定使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实际上都丧失了选举权。如果说，在整个这个地区内 126 只有 3.3%的居民在选举时有权去投票，那末，在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的罗马尼亚人中，参加投票的

① 但是规定在大学里可设立各民族语言和文学教研室。

比率就更低了。

在特兰西瓦尼亚，除阶级社会的通常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以外，还要加上最尖锐的民族矛盾，它一方面加剧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却又掩盖了社会矛盾，使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能够利用城乡广大劳动人民受到侮辱的民族感情来为他们的私利服务。

经 济 发 展

在1848—1849年革命的进程中，封建主义基础被消灭了，欧洲出现的普遍的经济繁荣推动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工业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很片面的：投资首先是集中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认为能够借以开发当地自然资源的那些工业部门中。于是，到处展开了铁路建设，到二十世纪初期，特兰西瓦尼亚的铁路总长度达到了4,000公里。采煤量达150万吨，生铁产量将近50万吨。同时还加紧开采喀尔巴阡山脉的贵重金属矿藏——金、银、锡、铜。在纺织、食品、化学、造纸和建筑工

业部门里共有379个大型企业。

在这个地区的工业中，当地资本所起的作用非常小。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资产阶级无力同维也纳、柏林和布达佩斯的工业巨头们竞争。因此，在冶金和采矿工业中，十分之九是外国资本的投资，在轻工业中，外资也占将近十分之八①。

罗马尼亚人的资本首先是投在轻工业中，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加工从罗马尼亚输入的原料。它们生产的纺织品、服装、鞋、玻璃和金属制品又运到罗马尼亚去销售。到1914年时，由罗马尼亚人投资开设的银行共有249家。它们在农业中广泛开展了业务活动，盈利很大。这些银行利用农民对“自己人”即本族资产阶级的信任，按高利贷的利率（利息达16%）向农民贷款，并且拿他们的土地作抵押，从“亲爱的同胞们”身上剥掉三层皮。经常有贫困的负债农民拍卖土地，而由银行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买去了。有过这样一件事：“阿尔比

① 这些统计数字只反映在十九世纪末得到很大发展的那些股份公司的投资情况，而属于个人的企业资本，特别是小企业的投资情况未统计在内。

127 纳”银行曾在奥哈巴乡仅用一个克朗“买到”一片很好的果园。用这种办法掠夺来的小块土地逐渐连成一片，变成了大庄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特兰西瓦尼亚便出现了一个罗马尼亚人的大地主阶层，虽然它的人数还很少。

二十世纪初期，特兰西瓦尼亚的工业尽管多次发生周期性的危机，但是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1890至1910这二十年间，采煤量增加了两倍，达到250万吨。纺织工业和建筑业也急速地发展着。大型采矿和加工工业企业总数从1900年的477个增加到1910年的791个。与此同时，还存在着许多手工业生产作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全部工人将近一半是在不满20人的小作坊里工作的。

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工业垄断化的情形也加剧了。仅三家大公司集中了采煤量的80%；炼铁和炼钢业几乎全部也由三家大公司的工厂包办。其中最大的一家工厂拥有16,000工人。82个卡特尔控制着特兰西瓦尼亚的市场。这些卡特尔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在1900年之后把煤的价格提高了三分之一，石油价格提高了20%，皮革

提高了40%，铁提高了1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占人口70%的农业中逐渐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这个发展过程是艰难的，而且是不平衡的：在特兰西瓦尼亚南部地区和巴纳特一带，地主较快地就转用自己的农具和雇用劳动力来经营土地；而在其他地区，各种各样的工役制还在广泛发展。在按对分制租种土地的情况下，大地主总要把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收获物攫为己有。地主在租给佃农土地时，通常只租给他们很小一块，即半公顷的土地。因此，农民（包括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德国人）都苦于缺少土地。

1895年农村土地占有的情况是这样的：44万户贫农（拥有不到2.5公顷的土地）只占有全部耕地面积的6.5%；35万户中农（拥有2.5—10公顷的土地）占耕地29%；9万户富农（拥有10—50公顷土地）占耕地24.5%，而7千个地主的手中却集中了40%的耕地。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这幅图景就更惨淡了。将近50万户农民完全丧失了土地，而十分之九的农户都陷入了债务的泥潭。

工人状况

在六十年代末期，特兰西瓦尼亚总共有11.4万工人。其中大约有2.4万人在采矿业中劳动，将近1万人在运输业和商业中工作，其他大部分（8万人）是从事小生产的。

128 到1910年，工人总数增加到21.2万人，其中几乎一半是在大型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工作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中的手工业生产还没有被排除掉，大约有10万个以上小的、其实是极小的手工业作坊依然存在着。

特兰西瓦尼亚的无产阶级在发展中同样也遇到了象罗马尼亚王国无产阶级在发展中所经受的那些困苦和挫折。他们在非常激烈的阶级搏斗中捍卫着自己的利益。

在缔结1867年协定时，工人阶级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按照七十年代的法律规定，劳动日不得超过16小时。不难想象，实际上劳动时间有多么长，工作是多么繁重！就拿在日伊乌河谷煤矿上推着小煤车运煤的工人来说，每一班都得工作16—

17小时。卫生条件极端恶劣。

根据五十年代的统计资料，四分之三的矿工都患有职业病。1884年在什泰特多夫（阿尼纳）由于煤矿管理部门为了省钱不愿安装通风设备，结果造成47名矿工因窒息而死亡的事件。这个事件轰动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在各个矿场、矿井和冶金企业中，因不幸事故而死亡的工人数以百计千计。仅在1900—1905年间就有将近18，000名工人因生产事故死亡、受伤和残废。那时候，在特兰西瓦尼亚五十岁的矿工是很少见的，因为采矿工人一般是活不到这么大年岁的。

企业主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因为女工的工资只有成年男工的一半左右，而童工的工资则只有成年工人的三分之一。到1910年，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工业生产部门中共有2万多女工和4万多不满16岁的童工。

资本家还利用女工和童工的劳动作为压低本来就很低的工资定额的手段。特兰西瓦尼亚的工资比匈牙利本地工资大约低四分之一，而匈牙利的工人工资本身就比奥地利的工资低三分之一，比德国的低一半，比英国的低三分之二。

特兰西瓦尼亚多民族的无产阶级，经过多次坚决的罢工斗争，从资本家手中赢得了某些让步。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工业垄断化的过程迅速发展，形成了很高的垄断价格，结果使工人在斗争中取得的一些成果又化为乌有。例如，在1900—1913年间，工资平均提高了21%，而工业品价格在1900—1910年间却上涨了40%，粮食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半。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乃至绝对贫困化的过程都在加速发展着；特兰西瓦尼亚工人阶级不论同所谓“自己的”，即特兰西瓦尼亚的，资产阶级、还是同外国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都尖锐化了，因而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也更加坚决了。

129

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特兰西瓦尼亚的无产阶级走上了有组织的斗争道路。在蒂米什瓦拉、阿拉德、布拉索夫、克鲁日、锡比乌和其他城市都建立了工人联合会。这些联合会组成了总工会并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要求（实行普选权和累进

所得税，规定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奥匈帝国境内的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时，马克思主义在特兰西瓦尼亚开始传播，并同拉萨尔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工人联合会开始领导工人进行经济罢工，而在拉萨尔看来，这种罢工是毫无意义的。在蒂米什瓦拉建立了以卡罗尔·法尔卡什和格奥尔基·温古里亚努为首的第一国际支部。匈牙利内务部惊慌不安地上报了该支部在矿工和冶金工人中间的巨大影响。

1871 年，奥匈帝国的统治者被巴黎公社起义吓得要死，慌忙加强反动统治，开始迫害工人联合会。给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头上加的一项主要罪名，就是说他们同第一国际有联系。几乎所有的工人联合会都被取消了。但是，很快又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储金会”和职工会等组织。

1880 年，匈牙利建立了“统一工人党”（当局坚决拒绝承认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党纲规定了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争取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实行普选权和工人的某些专门要求(包括实行 10 小时工作制)。但是这个纲领丝毫没有提到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这样就把当时多民族的匈牙

利国家的特点和最重要的问题忽略了。

特兰西瓦尼亚各地建立统一工人党的分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斗争的高涨。争取普选权运动发展得很广泛，特别是在蒂米什瓦拉，这里的工人运动是由格奥尔基·温古里亚努领导的。

与此同时，拉萨尔主义相信统治阶级会发慈悲的思想却束缚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积极性。而一部分对这种观点不满的工人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无政府主义。

在八十年代里，特兰西瓦尼亚发生了多次罢工，原因是工厂主企图降低工资，把工人不当人看待，一天的劳动时间长达14小时等等。其中规模最大的几次罢工是：克鲁日（1882年）和蒂米什瓦拉（1886年）卷烟工人的罢工，雷希察（1887年）冶金工人罢工和德伦科夫（1889年）煤矿工人的罢工。

第二国际的成立给工人运动以强大的推动力。1890年，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地区的许多城市庆祝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在蒂米什瓦拉、阿拉德、克鲁日、布拉索夫、佩特罗香、奥拉迪亚及其他一些城市，都举行了游行

130

示威和群众大会，会上广泛宣传了第二国际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政府动员军队来维持“秩序”，当然，工人与警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就在1890年，“统一工人党”改组为社会民主党。当时通过的“原则宣言”声明，该党的基本原则是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宣传社会主义，争取实现普选权及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具体地说就是要为争取社会保险而斗争）。

党的领导者从一开始就带有机会主义倾向。当1895年恩格斯逝世、第二国际失去了自己久经考验的领导之后，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就更严重了。党的纲领中既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问题。然而，党纲起草者却在纲领中指出，党将为争取用合作社制来代替现存的生产方式而斗争；认为实行合作社制将使每个生产者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这样，这个纲领就完全回避了推翻资本主义的问题，而且再一次体现了拉萨尔主义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

得"①的思想。

革命派在党内对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以致在1894年一度发生了组织上的分裂。

社会民主党与它的前身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它比较善于联系群众。党积极参与了组建工会的工作，建立了许多工会组织。在九十年代里，特兰西瓦尼亚各城市的工会组织大约包括了20—50%的工人。这个时期举行的一些罢工一般都是经济性的，其中最突出的是1897年阿尼纳煤矿发生的一次罢工。为了镇压罢工，政府竟野蛮地下令向罢工者开枪，打死十人。

在农民问题上，党是站在教条主义立场上的。它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观点出发，否认把私人占有的大片土地分配给农民具有非常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因此，它没有提出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问题，相反，却提出了集中私有土地以便进一步实行社会化的计划。这种错误主张促使农民

131

①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一部分社会产品仍将用于整个社会的需要(即用来补偿和扩大生产资料，用于管理费用，用于学校、保健机构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基金等等)。

运动脱离了工人运动[1]。而早在九十年代，农民运动曾广泛地发展起来，表现在收割时农民拒绝为地主干活，甚至在个别乡村，农民还举行了暴动。

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在考察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克里沙纳和马拉穆列什地区被压迫民族中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时，必须注意到这些资产阶级在热衷于剥削和掠夺劳动人民方面并不亚于匈牙利族资产阶级。在这里也和在所有其他地区一样，对抗性矛盾的主要界线是在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划分的。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是罗马尼亚族资产阶级争取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的表现形式。但这个斗争是以人民群众的态度为转移的，即以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不发展到反对私有财产的“神

① 社会民主党领导者的这些毫不符合农民要求的谬论，导致一种所谓农业社会主义运动的传播，1897年甚至成立了一个独立社会党，它的纲领很不彻底，但比社会民主党更坚决地主张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

圣”原则为限度。这就决定了罗马尼亚族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是不坚定的，他们倾向于同匈牙利统治者妥协，并妄图请求维也纳政府恩赐一些民族权利。因此，这个斗争虽然是进步的，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六十年代末期，罗马尼亚族资产阶级在完全合法的范围内发动了一场运动，反对取消特兰西瓦尼亚残存的一些自治权利。当时的一些文件中最著名的是1868年的布拉日宣言。宣言起草人曾宣誓要忠于1848年5月3—5日由人民议会宣布的原则。这时，罗马尼亚族资产阶级内部在运动的策略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必须抵制匈牙利议会的选举以示抗议，他们被称为消极派；另一部分人是所谓积极派，认为应当同其他被压迫民族一起参加国内的政治生活。1869年成立了两个政党：一个是巴纳特和匈牙利地区罗马尼亚人的民族党，它主张采取积极的策略；另一个是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民族党，它站在“消极的”立场上。至于它们的纲领性的目标，则两个党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区别：都要求承认罗马尼亚语为第二种官方用语，实行行政机构和教育的改革，

取消选举中的民族限制和扩大选举权，废除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的合并。

1867年的奥匈协定使特兰西瓦尼亚的日耳曼族资产阶级也很不满。日耳曼族资产阶级采取了“积极的”立场，它在匈牙利议会中组成了温和的反对派，主张本地区实行行政自治。巴纳特的日耳曼人组织依靠在十九世纪末叶日益加强的富农阶层、知识分子和商业资产阶级，较为坚决地抵制马扎尔化政策。 132

1881年，当匈牙利境内各民族最后的一点民族权利遭到越来越强烈的进攻时，资产阶级感到两个罗马尼亚人政党的存在显然是很不适宜的，于是两党便合并为一个党(罗马尼亚民族党)。该党要求恢复特兰西瓦尼亚的自治权，规定在主要是罗马尼亚人聚居的地区里国家行政机关和法院必须使用罗马尼亚语，并任命罗马尼亚人为官吏；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缴纳直接税的人身上。然而，关于斗争策略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巴纳特人坚决地主张采取积极态度，而特兰西瓦尼亚人仍采取消极立场。在1887年党的代表大会上，消极派占了上风，它指出了“积极派”奋斗的结

果是微不足道的（差不多在20年的时间里，在议会中总共只得到三个代表席位），因此，消极抵制的策略便被认为是必须采取的策略。

竭力想同奥匈帝国统治者进行勾结的大商人、银行家和地主成了这一策略的鼓吹者。

但是，不应忘记，大多数党员是由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构成的。他们不满意"无所作为"的政策，要求政治生活民主化，坚决反对否定民族特征的政策。这些观点虽然也是很不彻底的，但反映了"少壮"派的看法，这一派从1884年起在有才华的作家扬·斯拉维奇领导下出版了《论坛》报。他们利用报刊、群众大会和各种集会进行斗争，并多次向弗兰茨—约瑟夫递交请愿书。

在递交给皇帝的备忘录中，最著名的是1892年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对匈牙利境内当时实行的一些压迫各民族的法律，逐条逐节进行了分析。请愿书的遭遇是个恶兆：弗兰茨—约瑟夫把它转给匈牙利政府，而匈牙利政府便组织了轰动一时的审讯，结果文件的起草者们在1895年被判处好几年监禁。这件事情引起的反响是，抗议浪

潮立即席卷了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地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和罗马尼亚人的民族组织的领导者结成了联盟，共同捍卫自己的权利。一个由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维也纳去见弗兰茨—约瑟夫。布加勒斯特和雅西都召开了声援大会。奥皇考虑到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马尼亚普遍的不满情绪，一年以后只好赦免了被判刑的罗马尼亚民族党的领导者。

1905—1907年工人和农民运动的高涨

在二十世纪初年，匈牙利统治者就感觉到，工人运动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已告结束了。二元制帝国的危机和奥地利与匈牙利统治阶级之间经常发生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方便条件。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在雷希察、阿拉德、蒂米什瓦拉、克鲁日、阿尼纳、萨土—马雷、阿尔巴—尤利亚和其他城市就发生了多次声势浩大的罢工。成千上万的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工人也参加到运动中来了，他们在罢工进程中加入了工 133

会[1]。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克里沙纳、马拉穆列什、南布科维纳地区多民族无产阶级的代表——罗马尼亚人、马扎尔人、日耳曼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乌克兰人、捷克人、波兰人并肩战斗在一起。

但是，所有这些阶级冲突，还仅仅是特兰西瓦尼亚无产阶级于1905—1907年掀起的那个强大斗争高潮的先声，而这次斗争高潮是在有关俄国革命消息的巨大影响下爆发的。这个时期总共发生了400多次罢工，参加者达10万人。政府当局用加强镇压来扑灭工人运动的企图失败了。镇压反而使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1905年下半年，奥拉迪亚、特尔古—穆列什、卢戈日、萨士—马雷、蒂米什瓦拉数万工人手举红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普选权。

1906年，无产阶级的斗争出现了新高潮。一月间，当政府当局在菲尔迪南乡蓄意侵犯工人组织的自由时，当地冶金企业的工人宣布了罢工，并发生了流血冲突。在这次斗争中，工人付出的代

① 工会组织的数目从1900年的32个增加到1904年的78个。

价是：9人被打死，30人受伤。接着，卢戈日和卡兰塞贝什的工人为维护集会自由的权利而奋起斗争。5月，在蒂米什瓦拉由于企业主和地方当局企图取缔工人组织而爆发了总罢工。成千上万的人在市内举行示威游行，他们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总罢工万岁！""反对剥削工人！"在克鲁日，罢工的建筑工人在当地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警察当局的白色恐怖。地方当局下令向工人开枪，结果引起了全城的总罢工。在日乌河谷的煤矿区，局势更为紧张。这里的企业主威胁说，要把罢工者及其家属赶出他们的住宅，但罢工工人无所畏惧，坚持斗争；他们多次示威都遭到了枪杀，在示威中数十人被打死。

1907年斗争的最高潮是当时匈牙利全境无产阶级为争取普选权而进行的罢工。特兰西瓦尼亚人和巴纳特人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这次罢工。虽然工人们没有达到斗争的目的，但这次罢工却显示了他们巨大的革命力量、英勇气概和决心。工人在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并使工会的数目增加到233个。 134

但是，在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日里，一方面显示了运动参加者的巨大斗争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同时也明显地反映出缺乏一个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领导。在二十世纪初期，奥匈帝国社会民主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机会主义者。党的组织和工会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机会主义者只依靠虽然是一小撮、却很有影响的工人贵族阶层和差不多占工人半数的手工业无产阶级。特兰西瓦尼亚的党组织按照奥地利式的马克思主义①理论分成许多个民族分部——罗马尼亚族的、匈牙利族的、日耳曼族的和塞尔维亚族的党分部。同一个企业的工人在一起进行斗争，但却分属于各个不同的党组织。1903年通过的党纲充满向改良主义投降的观点。党纲

① 奥地利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一种变种，形成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它的鼓吹者们硬说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因素正在逐渐成熟，国家具有超阶级性质。因此，不需要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就行了。在民族问题上，奥地利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制造了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每个民族的代表不是按地域而是按民族特征组成自治小组，共同管理本民族(文化的和语言的)事务。

虽然以必须消灭资本主义为出发点，但在为实现这一目的所应采取的手段方面却很不明确。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只字未提，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避而不谈。另外，关于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也丝毫没有提到。

党的首领们说得就更露骨了。他们高呼反对“流血革命”的思想，并宣布他们不用暴力来反对暴力。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使他们撇开了其它一切问题。

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具体条件下，有关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的纲领性的主张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在1903年的党纲中，这些问题不是避而不谈，就是用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观点解决的。例如，纲领仅仅宣布了一般的国际主义原则，而没有提民族自决权，其借口是：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只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个民族的。农民要求分配地主土地的问题也被忽视了，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准备从地主土地所有制立即过渡到土地公有制。这样一来，农民就失去了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条件。要知道，在当时的 135

特兰西瓦尼亚，农业人口占居民的70%，工业人口只占10%。至于说到农民的斗争情绪，那是毫无异议的：还在1903年，阿拉德省的宪兵就向高呼“打倒地主！”的农民群众开枪。一年以后，在奥列什德村发生了大规模的搏斗，这里的农民——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所流的鲜血永远记下了他们渴望分配地主土地的共同要求。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这个村庄的邻城奥拉迪亚的工人当即举行了罢工，抗议对农民的镇压。

农业工人普遍的罢工运动席卷了特兰西瓦尼亚。在收获季节大忙的日子里，数以百计的雇农拒绝下地干活，地主们坚持不住，只好让步。结果，农业工人使计件工资额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对所有这些情况是完全不重视的。他们的注意力只是集中在争取普选权上，同时他们也作了不少的努力，使这个运动不超越和平示威的范围，不致酿成街垒战或起义。正是由于这条改良主义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革命运动遭到了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特兰西瓦尼亚的状况

1905—1907 年事件迫使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族资产阶级不得不认真地深思。领导着民族党的那些银行家和地主们惊恐地看到：无产阶级明显地超出了赋予它为“本族”资产阶级争取平等权利的作用，它也不认为把奥匈帝国资本家的奴役更换成“本族”资本家的压迫是自己的荣幸，而是同匈牙利族、日耳曼族、塞尔维亚族的工人们一起正在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民族党的内部开始重新组合力量。“消极派”的抵制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布达佩斯丝毫都没有产生作用。“积极派”在党内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于 1905 年公布了他们的纲领。他们为了把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主张把属于国家的地产分给或者卖给农民，降低土地税，实行普选权。但是他们反对革命运动，并完全赞同匈牙利政府的镇压措施。

二十世纪初期，党内在争取民族权利问题上

的意见分歧更加尖锐了。当1906年底强大的政治罢工运动震撼着整个匈牙利王国时，该党资产阶级上层的著名代表之一尤利乌·马尼乌在匈牙利议会中宣称：“保持匈牙利和奥匈帝国的完整，无论对罗马尼亚人或是对匈牙利人来说，在政治上和国际上都是必要的。”

136 罗马尼亚族大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来抓到一点权力。为此目的，奥雷尔·波波维奇和亚历山德鲁·瓦伊达—沃耶沃德制定了一个以联邦制为基础的改组哈布斯堡王朝的计划，其设想是使这个帝国包括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四个国家，其中每个国家都由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统治。波波维奇和瓦伊达不惜直接出卖民族利益，规定让罗马尼亚也加入这个由哈布斯堡统治的联邦，换句话说，他们预先就策划要使罗马尼亚丧失民族独立，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广大党员群众，首先是农民，与这个计划毫无关系。他们准备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并把自己摆脱主要是马扎尔人地主奴役的希望同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党内出现了一个激进派，它批评了党

的领导消极怠惰，谴责他们企图同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暗中勾结，要求他们为实现党纲所规定的任务而积极行动起来。

1908—1910年期间，特兰西瓦尼亚也同欧洲所有地区一样，革命运动处于低潮，工人组织遭到迫害。但随后又开始了新的高涨。在1911—1912年间就发生了75次罢工，而且大部分是胜利的。反对战争和反对增加军费开支的运动广泛开展起来了。1912年5月，匈牙利王国全境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和示威游行，抗议选举反动分子伊什特万·蒂萨为议会议长。在布达佩斯抗议运动发展到进行街垒战。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的一些巨大的工业中心——克鲁日、布拉索夫、蒂米什瓦拉、奥拉迪亚、阿拉德、萨土—马雷的多民族的无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为了对付这一运动，匈牙利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政府可以不经议会批准随时决定实行特别戒严。这一措施激起了新的抗议浪潮。

1913年和1914年初，争取实行普选权的斗争日益加强，并且同反对失业现象的运动结合在一起了。报界展开了广泛的活动，印发了上千万

张的传单，举行了多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战争准备、救济陷入生活困境的工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特兰西瓦尼亚的状况就是这样的。

第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罗马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

137

观望时期

罗马尼亚统治者由于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轻而易举地、几乎没付任何代价地就取得了胜利，于是便被这种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的侵略野心也膨涨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因此，当1914年7月在欧洲爆发了危机，而这种危机形成为世界大战时，显然，罗马尼亚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战争是经过几十年准备的。欧洲分为两个集团：一方面是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另一方面是法国、俄国和英国。罗马尼亚从1883年起就同以德国帝国主义为首的中欧列强结成了同盟。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这个曾经在俄国的帮助下争得了独立的国家，怎会过了五年又站到俄

国潜在的敌人的营垒中去了。但这是有其根由的。罗马尼亚统治者担心彼得堡会重新执行它夺取君士坦丁堡的计划，而罗马尼亚正是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必经之路。他们也害怕沙皇政府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建立它的统治，因为这样沙皇就可以在必要时截断罗马尼亚对外贸易的通道，所以，他们宁愿让黑海门户的钥匙放在软弱的土耳其政府的口袋里。其次，根据1878年和约，俄国又把它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失去的比萨拉比亚的三个县收回去了。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些地区是由罗马尼亚贵族统治着的。他们不愿意离开比萨拉比亚南部，梦想把它再收回去。最后，罗马尼亚在经济上严重地依赖着德国和奥匈帝国，卡罗尔一世实际上是德国资本在罗马尼亚王国的138代理人。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罗马尼亚为什么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亲德的方针。

但是，到1914年时，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吸引罗马尼亚寡头政权投向中欧联盟的那些因素，有的完全消失了，有的大大减弱了。腐朽的沙皇政权使罗马尼亚不再怀有先前的忧虑。同时，它同奥匈帝国的分歧也更加尖锐了。矛盾的症结

在特兰西瓦尼亚，因为这里的罗马尼亚人遭受着残酷的民族压迫。

不言而喻，罗马尼亚统治者是不会关心特兰西瓦尼亚人的幸福和繁荣的。他们所关心的是把这个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并入罗马尼亚国家，以扩大他们的剥削范围和增加数百万新的纳税人。他们的欲望并不局限于大部分是罗马尼亚人居住的那些领土，而且还扩大到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的土地。但是，他们在酝酿自己的侵略计划时，自然是注意到了喀尔巴阡山两边的罗马尼亚人渴望重新统一为一个国家的这种要求。

罗马尼亚统治者曾得到保证：如果罗马尼亚公开反对自己正式的同盟者——德国和奥匈帝国，他们就能得到更大的好处。他们也看到，这样做就能把自己装扮成实现罗马尼亚人民夙愿的人。因此，1914年7月21日在锡纳亚的佩列什城堡举行的王室会议便拒绝履行盟国义务。

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尼亚很快就会加入协约国。因为战争的结局还很难预料，德国军国主义的声望还很高，所以，反复盘算千万不要失算和不要加入必遭失败的一方这种思想，使罗马尼亚的

政治寡头们忐忑不安，犹豫不决。因此，他们便采取了随机应变的策略，以便在交战的两个营垒之间给自己留下一条应变的出路

但是，这种一般化的公式并不能掩盖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在罗马尼亚统治阶层中形成了三派：第一派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主张采取观望态度，它是由布勒蒂亚努首相领导的；第二派主要是由向德国和奥匈帝国销售谷物的地主以及同地主有联系的商业资产阶级组成的，他们仍然相信普鲁士的武力是不可战胜的，因而坚决主张站在中欧列强一边；第三派主要是资产阶级，他们的结论是胜利必将属于协约国。各派的政敌们不仅在报刊上进行争辩，激情沸腾，甚至他们举行的集会和群众大会也往往以同警察发生武装冲突，或以与会者之间的搏斗而告终。

各种观点上的分歧，是在两个主要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内部，而不是在两党之间发生的。在自由党内，布勒蒂亚努一般来说还能维护党纪，而在保守党内则充满了各种纠纷。反对亲德派地主的，是主张支持协约国的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派。在1915年5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如果对于一

场从早晨一直持续到傍晚的吵架可以用“代表大会”这个名词的话），该党终于分裂成两个党。

罗马尼亚的战略地位、自然资源和人力贮备，140 使它变成了两个对立的强国集团都想争夺的一块令人垂涎的肥肉。德国和奥匈帝国认为，把罗马尼亚引诱到自己的阵营里来，就能够与土耳其保持畅通的联系，并把黑海海峡（俄国渴望得到的目标之一）变成无法攻克的要塞。相反，协约国则企图分化自己的敌人，打算使土耳其同德国和奥匈帝国分开，把它变成一个易于掳获的对象。英国、法国、特别是俄国，则竭力想同孤军作战的塞尔维亚建立联系。而从这一观点来看，罗马尼亚参战就会使协约国占很大的优势。最后，这个国家可能提供的60—70万军队，在衡量战争的秤盘上也是一块不可忽视的筹码。

这就说明，为什么中欧同盟和协约国的外交当局都尽力讨好罗马尼亚统治者，竭力争取他们的支持。

外交上的交易进行了两年。1915年夏天，布勒蒂亚努政府同英、法、俄的谈判已经进展到如此深刻的程度，仅仅剩下在参加协约国的条约上签

字这一步了。但是，在最后一分钟，罗马尼亚方面改变了主意。前线的局势发生了不利于协约国的情况。由于俄国的落后，俄军遭到惨重的损失。俄军缺乏武器、弹药和装备。俄军没有任何办法对付德国炮兵飓风般的轰击，因此，在德军的打击下，俄军向东节节败退，死伤达百万人之多。

俄军军需总长达尼洛夫写道，局势是这样的："战略部署现在可以完全取消了。我军战士现在唯一能作的事情就是考虑用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能阻挡敌人的进攻。希望只能寄托在德国人的疲惫，寄托于偶然机会和圣尼古拉显灵了。"

一些讲求实际的罗马尼亚政治家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命运同那个已经流干了鲜血的北方巨人联系在一起是极不明智的。因此，布勒蒂亚努很灵活地拒绝履行自己应许参加协约国的诺言，又继续了一年的随机应变政策。

1916年，局势变得有利于协约国了。在西线，德国人寸步难进。德军在凡尔登战役中，数十万士兵葬送了生命。在东线，战局也处于相持状态。俄军已治愈了头一年所遭受的创伤，武器装备的供应也有了一定的改进。这年春天，当俄军在布

鲁西洛夫将军指挥下在战线南段发动著名的进攻时，就显出了俄军力量并未枯竭。在卓越的将领统率下，战士们的进攻热潮竟这样强大，一举就消灭了与他们对峙的奥军。奥军伤亡和被俘者达150万人。奥匈军队直到战争结束时也未能恢复它这次所受的打击。它在意大利战线上展开的胜利进攻也被阻止了，而德国人企图再夺取凡尔登的攻击也削弱了。中欧同盟所拥有的全部兵力都被调到东线堵缺口，结果阻止了布鲁西洛夫的进攻。但是战争的战略主动权已转到协约国方面了。于是，协约国的外交官们在布加勒斯特说话就更强硬了。他们直接了当地告知布勒蒂亚努说，他们并不需要迟误的盟国。8月初，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关于罗马尼亚参加协约国的协定。同时，罗马尼亚统治者还取得了协约国方面的许诺：在订立和约时将规定，罗马尼亚不仅将得到罗马尼亚人占优势的地区，而且还将得到布科维纳北部乌克兰人居住的地区，蒂萨河流域匈牙利人居住的地区和巴纳特西部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地区。①

141

① 协约国各国政府背着布勒蒂亚努秘密商定：所有这些问题将在战争结束后根据具体情况再决定。

工人阶级的反战斗争

在几个月的长期观望、动摇和反复衡量的过程中，罗马尼亚统治者不仅要在外交领域进行斗争，而且在国内战场上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事。工人阶级坚决反对把罗马尼亚拖入战争的企图。无产阶级虽然非常珍视罗马尼亚民族重新统一的思想，但它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来实现统一，而不是在反动透顶的“怪诞联盟”的庇护下来实现。

1914 年 7—8 月间，罗马尼亚各地都多次举行了群众大会和集会，与会者谴责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者，要求实行中立政策。1914 年 8 月紧急召开的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也表达了同样的情绪和要求。

工人阶级经历着严重考验时期。战场完全包围了这个国家。旧的商业命脉被截断了。多瑙河上展开了军事行动；随着土耳其的参战，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很快就被封锁了。罗马尼亚十分之九以上的对外贸易是依赖这些道路的，现在

都不通行了。许多大港口，如布勒伊拉、加拉茨、朱尔朱、苏利纳、康斯坦萨等城市死气沉沉，数以万计的人成了失业者。战争沉重地打击了生产出口物资的工业部门。例如，罗马尼亚的优良木材已没有销路，因而许多锯木厂都停工了。金属加工企业缺乏原料，因为罗马尼亚自己不能炼钢，而以前的外国供应者现在都在为战争服务。据工会统计，到1915年2月，布加勒斯特以前有3,600名金属加工业工人，现在只有1,150名工人在业。甚至石油工业也受到了战争气息的侵袭。布勒蒂亚努政府由于正在进行关于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的谈判，因而就不能允许毫无限制地向德国和奥142 匈帝国输出石油。虽然“禁令”是容易回避的（由于政府不希望同力量很雄厚的石油资本家搞坏关系，它本身就纵容违禁者），石油的出口量还是显著缩减了。结果，普洛耶什蒂、坎皮纳、朱尔朱、康斯坦萨的油库都因贮藏量过多而不胜负担，在采油业中也开始裁减工人。①

失业人数增加的同时，生活费用也空前上涨。

① 石油资本家并没有因为出口下降而受到损害，因为石油价格的暴涨绰绰有余地抵偿了减少出口的盈利。

战争给罗马尼亚的地主、富农、谷物商人以及与食品工业有关的资本家开辟了神话般的发财之路。由于奥匈帝国和德国的粮食情况异常紧张，居民已按吃不饱的定量实行配给制，所以谷物价格猛涨。每年都有数十万节车厢的小麦和玉米沿着通过喀尔巴阡山脉的铁路运往奥匈帝国。同时还向那里运输大量的牲畜，输出蔬菜、酒、油、肉，总之一句话，运走了一切可以赚钱的东西。黄金象水一般地源源流入地主、商人和粮食投机家的腰包。政府由于征收高额出口税也获得了巨大的收入。在铁路上工作的官吏，因提供车厢而受的贿赂也塞满了腰包。国内的粮食贮备急剧减少，粮价飞涨。政府曾试图对一些最重要的食品规定最高限价，它已远比和平时期的价格高出很多。但实行这一措施之后，马上就出现了市场供应中断现象，在罗马尼亚这样一个被誉为欧洲谷仓之一的国家里，商店里都见不到面包、肉、鱼、蔬菜和植物油了（奶油被视为奢侈品，劳动人民几乎都吃不起）。然而，在黑市上却什么都能买到，当然，价格异常昂贵，比政府所规定的“最高限价”还要高出很多。资产阶级报纸《时代报》（«Enoka»）写道：“饥饿正

在敲我们这个农业国家的大门。”情况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城市里常有成群的饥民抢劫面包房。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反战斗争同反对贫困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了。罢工运动没有一天停止过。群众不断举行示威游行、各种集会和群众大会，其口号是：反对战争，反对生活费用高涨，要求推翻这个准备战争和庇护投机商的政府。1916 年 6 月，局势特别紧张，因为情况很明显，政府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以便把国家投入席卷整个欧洲的战争大动乱中。

社会民主党和总工会决定进行“反战的反击”。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会上选举了卡尔·李卜克内西为名誉主席。布泽乌、布勒伊拉、克拉约瓦、加拉茨、土尔努—塞维林、皮亚特拉—尼亚姆茨、普洛耶什蒂也召开了群众大会。6 月 13 日，加拉茨工人的示威游行因横遭镇压而造成了惨案。被运动规模吓坏了的政府，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进行武装镇压。这次大屠杀的结果是 10 人被杀害，50 人受伤。政府在夜间偷偷地把尸体掩埋了。但它无法掩盖其罪行。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向无

产阶级发出号召："工人所流的鲜血必须偿还！"、"打倒杀人犯的政府！"。

许多城市都举行了示威游行和罢工，表示抗议。布加勒斯特有2万工人参加了罢工，尽管政府为了阻止这次罢工采取了许多坚决措施，直至派兵占领一些重要工厂和把大炮运进了工人住宅区。

六月惨案标志着无产阶级反战运动已达到更高阶段。这一事件显示了无产阶级粉碎寡头政权罪恶阴谋的决心、大无畏的气概和不惜流血牺牲的精神。罗马尼亚工人还力图把自己的斗争同欧洲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社会民主党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它的代表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代表大会。1915年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召开第二次巴尔干国家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倡议。他们同塞尔维亚和希腊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保加利亚的"紧密派"一起，愤怒谴责战争，谴责"社会爱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并宣誓要"为反对巴尔干各国统治阶级所制造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黩武主义潮流，反对各大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而进行不懈的和无情的

斗争”。

但是，这些光荣的事迹不应该使我们看不到无产阶级运动中薄弱的方面和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不善于把反战运动同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教条严重束缚了理论思想的发展。年老的多布罗加努一盖里亚公开站到了“保卫祖国”的机会主义立场上，并为第二国际领导人的叛卖行径进行辩护。他宣称，各国社会党是无力阻止战争的。当时，社会党人把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归咎于挑起战争者，都拿起武器走上前线了，他们的口号是：“一个公民的天职是哪里召唤就到哪里去，让我们去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完整和生存吧！”按盖里亚的主张，罗马尼亚社会党人也完全应当这样做，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喝下这杯天职的苦酒”，步“我们西欧兄弟”的后尘（即指那些社会爱国主义者。对盖里亚来说，这些人确实是他的兄弟，但他们同罗马尼亚的革命工人之间在思想上却毫不相干）。

当时在党内有很大影响的赫利斯蒂安·拉柯144 夫斯基采取了错误的中派立场。在他的言论和演

说中发表了不少革命的声明，但是在解决具体问题时，拉柯夫斯基却提出了党的活动基础是争取实现改良：争取普选权、改革土地关系等等。革命的准备工作被推迟到战后时期去了。他号召无产阶级举起铁拳，以便“在将来、在战后去迎头痛击那些为了私利而牺牲人民利益的罪犯和无耻之徒”。这种号召意味着：在战争期间要维护“国内和平”，在罗马尼亚一旦参战时要采取“护国主义”立场。

列宁在读了拉柯夫斯基所著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之后写道：“拉柯夫斯基（见他的小册子）赞同保卫祖国。我认为我们同这些人走不上一条道路。”①

社会民主党领导提出了“保卫中立”的口号，但不号召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制度，所以这种口号便失去了效用和力量，无异于在群众中散布这样一种幻想：毋须进行革命就能保持和平。

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运动中有许多舍己忘身、忠于革命理想和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理论修养和思想上的锻炼，因此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6 卷，第 335 页。

便不能清除第二国际从青年时代就灌输给他们的那些定律。

在许多集会和群众大会上，他们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把侵略和压迫的战争变成消灭统治着我们的寡头政权的手段。”但是，如何去实现这一目标，就连工人领袖中最优秀的分子也不清楚。他们只知道，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是不足以防止卷入战争中去的。一位持有这种看法的领导者——伊·克·弗里木，于1915年1月11日在“达契亚”大厅举行的一次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上警告与会者说:“单凭鼓掌，单凭到这里来开会是不够的。你们用这种方式是不能完全尽到自己的义务的，而且是什么也得不到的，需要的是采取坚决的实际行动。”群众对党的领导采取的策略所抱的不满情绪已相当严重，以致在1915年的代表大会上，党的执行委员会没有对各国社会党对待战争态度的报告进行讨论；这个报告引用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揭露性材料，但是报告的结尾却提出了国家一旦遭到攻击就应“保卫祖国”的号召。值得注意的是，《斗争日报》编辑部由于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模棱两可的声明”，遭到尖锐的批评，因此不

得不对此进行辩驳。

党内逐渐地形成了一个革命派。报刊上发表了列宁的某些著作，这对革命派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在列宁著作的影响下，阿列库·康斯坦丁内斯库于1916年2月在全国最大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布加勒斯特市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宣布以武装起义作为反对战争的手段。这项决议案差不多得到与会者一半人的支持，它证明了党内革命派的增强。但是，就在革命派中间，对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还是不清楚的。他们只不过刚刚开始理解列宁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思想，因此，就是这位康斯坦丁内斯库在提出关于武装起义的正确观点的同时，他的决议案里还写上了拒绝服兵役这一最有害的主张，这个主张实际上，就是在武装到牙齿的寡头政权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 145

毫无疑问，由于缺乏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由于党的部分领导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而革命派内部在理论上又模糊不清，这些因素就使罗马尼亚统治者易于把国家拉入战争之中。

在战火中

罗马尼亚军队在参战时是没有什么准备的。这支在1877—1878年战争中表现很好的军队，其数量是很充分的。至于军队的物质供应，情况就非常糟糕了，而且由于机器制造工业很不发达，当时没有任何希望能改善这种落后状况。本国生产的炮弹只能满足军队需要的十分之一。想从国外进口大量武器装备的打算也没有实现。因为各交战国本身已经感到武器非常缺乏。而布勒蒂亚努政府的所谓"灵活"政策，既欺骗中欧同盟，也欺骗协约国，结果无论在巴黎、伦敦，或者在柏林对它都不信任，自然，谁也不愿意向一个采取非常可疑的立场的国家提供武器和弹药。结果，罗马尼亚军队几乎是在没有重炮和山炮的情况下参加战争的（而这是在喀尔巴阡山地条件作战）。野炮也很不够用。指挥部只得把布加勒斯特城防要塞上的大炮和福克夏尼—纳马洛斯防线炮台上的大炮卸下来安到炮架上使用。但这些都是四十年以前的、用浓烟火药发射的老炮，从外表看来似乎威力

还不小，在战场上用起来却无论如何也抵不上速射炮。机枪的情况也很可怜：一个团只有2到6挺，而奥德军队每个团配有50挺机枪。罗马尼亚士兵几乎没有手榴弹，钢盔和防毒面具在战争开始时也没有配备。罗军司令部把师编为庞大而不便行动的军，并把希望寄托在向特兰西瓦尼亚进行轻而易举的进军上。除此以外，罗军总参谋部还有一种警惕癖，但遗憾的是，这种警惕性不是对待敌人的（敌军通过它的间谍网很容易搞到所需要的情报），而是针对自己的俄国同盟军的，他们很不愿意向俄军提供有关前线的真实情况的情报。

罗军四分之三的部队都集结在靠近特兰西瓦尼亚的要冲上，在南部，用来对付那里的保加利亚、德国和土耳其军队的，却只留下较少的兵力，它们主要是由后备役人员和正规军中战斗力很弱的部队组成的。 146

在开始阶段，向喀尔巴阡山进军的罗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他们从山隘要道赶走了奥匈军的一些阻击部队，推进到平原区，占领了奥尔沙瓦、布拉索夫和锡比乌。但就在这时，他们遭到了来自

南方的马肯津将军的打击。

经过顽强的战斗之后，马肯津指挥的德、保、土联军于8月底占领了图尔图开；不知什么原因，罗军指挥部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就放弃了巴扎尔吉克。俄军当时离这里还有几天路程的距离，来不及援救。情况很严重，但还没到悲惨的程度：敌军被阻止住了。

然而，罗军总参谋部却已惊惶失措了。它停止了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攻势，并抽出很大一部分部队由火车向南线转运。调运部队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北线罗军的上空又乌云密布了：调到那里的德军和奥匈军增援部队在9月初转入了进攻。于是，罗军司令部又急忙由南线再向北线调运几个师。当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军队还在列车上运行。

这时，罗军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几个师被迫退到喀尔巴阡山中。军队分散在几个山上，彼此失去了联络，由于通讯联系很不好，他们陷入了困境。

为这些胜利所鼓舞的奥德军队，立即顺着几道山口向前猛攻，但是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他们

只好放弃了自己的原订计划，把超过罗军数倍的兵力集结到日乌河谷一带。只是在这以后，敌军才把罗马尼亚人逼退到南部，夺取了克拉约瓦城，10月底渡过了奥尔特河，进入通向布加勒斯特的平原。11月初，马肯津的部队在济姆尼恰附近强渡多瑙河，也向罗马尼亚首都推近。罗军的将领们和前来"援助"的、笨拙无能的法国战略家贝泰罗将军在尼亚日洛夫战役中遭到了失败。12月初放弃了布加勒斯特。接着开始了全面向北往摩尔多瓦的仓惶退却。铁路运输车辆不足，当然，抢先享用车辆的是那些"高贵人物"——部长、参议员、众议员和大庄园主。大工业家和金融巨头整列车地装运他们的财产。首相布勒蒂亚努"以身作则"：他把自己弗洛利克庄园里收藏的各种酒和整套暖花房设备都运到东北去了。大部分有军事意义的工业设备也转移了。但是调运军队却没有车辆。成千上万名伤员被弃置，让命运任意摆布。络绎不绝的士兵行列同难民们混杂在一起，艰难地沿着大道缓缓撤退。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饥饿和伤寒病，横尸途中。许多未到应征年龄的青年（16—17岁的孩子）被驱往北方补充兵员，他们只有一半人

147 到了摩尔多瓦。罗军伤亡和被俘者达25万，损失了大约30万枝步枪、250挺机枪和将近500门炮，这就是1916年这次罪恶的、无能的战役的可耻结果。罗马尼亚军队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了。据俄军大本营的统计，到1916年底，罗军正规部队只剩下7万人（这比五个月以前动员起来的总数的十分之一还少些）。

在罗马尼亚发生这场悲剧的时候，俄军指挥部没有及时去援助自己的同盟者。俄军统帅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万万没有想到罗军这么迅速就被击溃，他只是劝告当时已陷入惊慌失措的罗军将领们要冷静和谨慎。同时，俄军本身的预备队在科韦尔附近的毫无进展的浴血进攻中也消耗殆尽，只是在罗军溃败以后，才把50万人的兵力调往南线。这支部队阻止了德军和奥匈军的前进，并在摩尔多瓦设防固守。在400公里长的战线上，只有40公里有罗马尼亚军队防守，而其余的部队都拉到后方改编去了。

罗马尼亚军队虽然遭受了这些失败，但它还是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从西线把大量敌军吸引到这边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英法军指挥部当然

是满意的。

罗马尼亚的大部领土被占领了。起初是过往的士兵到处抢掠，这可以说是无组织的抢劫。然后就进入了“整顿就绪”后的横征暴敛时期。占领军以德国人特有的细心对一切东西都进行了清查：粮食、饲料贮备、牲畜头数，对尚未收割的作物的估量，石油、煤和其它原料的贮备量，森林资源等等，连农民的最后一只老母鸡（禁止杀鸡）也进行了登记，而且还计算它能下多少蛋。铁路上到处是满载着从罗马尼亚运出的谷物、石油和牲口的列车。国内驻扎着贪婪无厌的占领军。

值得注意的是，从布加勒斯特逃走的罗马尼亚政府在它所有各部、各县和乡的行政机关里都留下了几名管理人员，各地都留下了警察。他们受命要同占领军合作来维持“秩序和安宁”，这就是说，罗马尼亚统治者在世界上最害怕的是革命运动，为了镇压革命他们准备同敌人携手合作。经国王同意和内阁认可，以保守党领袖马尔吉洛曼为首的一些著名的亲德派分子也留在布加勒斯特。这些人组成了一个所谓预备政府。假如罗马尼亚寡头政权一旦需要从协约国倒戈投向中欧同

盟阵营中去，那末“骨干”就是现成的了。

未遭侵犯的一些地区，情况也变得困难了。农民的一切贮备几乎都被搜刮去供应军需。牲畜也被征用了。一些迁移走了的工厂的工人，离开了他们的老家，也处于战时状态中。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被迫转入了地下。但尽管有宪兵的一切预防措施，国内的革命形势还是有所发展。

148 人民群众的苦难和贫困的加剧，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这个革命运动特别有力地开展起来了。当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时，无论在摩尔多瓦北部或在战壕那边，人们都欢欣鼓舞。

1917年2—3月间，罗马尼亚人也参加了俄国士兵举行的许多热烈的群众大会。社会民主党雅西分部举行了秘密集会庆祝俄国的二月事件。同时，不但在国民中而且在军队中也加紧展开了革命宣传活动。

1917年的五一节，在加拉茨、巴克乌、罗曼、皮亚特拉—尼亚姆茨以及其它城市都举行了工人示威游行和罢工。特别是在罗马尼亚的临时首都

雅西，罢工和示威游行达到了炽热程度。这里的工人响应社会民主党的号召，同俄国士兵一起参加了游行。游行群众把被关押的政治犯都解放出来。惊恐万状的国王斐迪南急忙从雅西逃到军队的总司令部去了。

1917年7月，在敖德萨（这里已超出了罗马尼亚特务机关所能达到的范围）建立了社会民主党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普鲁特河以东摩尔多瓦地区和军队里大量散发的宣言中，揭露了这次战争的侵略性质，号召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地主土地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委员会的参加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各项任务，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宣言中提出的要求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措施的范畴。

农村里的反抗运动也高涨起来了。农民拒绝给地主种地，拒服大车运输役，反对各种形式的征用和苛捐杂税。军队里开小差的人大大增多，成队的逃兵隐藏在山里和多瑙河三角洲难以进去的一些地方。

在被占领地区，保存下来的社会民主党的一些秘密小组，散发了祝贺俄国二月革命的传单。3

月，布加勒斯特妇女举行了反饥饿示威游行。农村里反抗占领军的斗争往往发展为武装冲突。

如果说，罗马尼亚城乡的“下层群众”已不愿意再按老样子生活下去，那末，“上层统治者”也不能再使一切事物保持原状了。

极度惶恐的罗马尼亚寡头政权决定作一些让步。3月，国王发布公告，许诺分给士兵土地和扩大选举权。4月，他在巡视前线时发表的演说中也谈到了这一点。6月，议会开始讨论关于在战后将限制地主的土地占有量和实行普选权的法案。

无疑，正是由于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和害怕这一革命扩展到罗马尼亚，统治集团才采取了这些许诺许多东西的措施，而这些措施便影响了事态的发展。罗马尼亚农民对于君主政权还抱有幻149想，兵士实际上就是穿了军服的农民，他们对国王的许诺信以为真，因此，罗马尼亚寡头政权的地位，虽然是暂时的，但又稳固下来了。

1917年夏季，前线的战斗又激烈起来了。在梅雷什蒂、奥伊图兹、默勒谢什蒂的战役中，刚刚改编好了的罗马尼亚部队与俄军配合行动，顽强

地作战。战斗从7月底持续到10月，奥德部队寸步未进。相反，他们却放弃了发起进攻时的阵地，后撤了几公里。重新整编了的罗马尼亚军队，虽然伤亡了4.7万人，在这里却显示了它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德国将军们始终未能挫败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特兰西瓦尼亚

战争给特兰西瓦尼亚人、巴纳特人和布科维纳南部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14年7月进攻塞尔维亚的奥匈军队中，有许多士兵是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和塞尔维亚人。奥匈帝国的那些笨拙无能的战略家们企图借助战争的胜利来挽救奄奄一息的君主政体，数十万战士的生命便成了他们冒险计划的牺牲品。有一个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团，两年之中在塞尔维亚战场上损失了1万人，换句话说，这个团曾三次补充了它的全部兵员。

被派去对俄军作战的部队，其损失的数量也是惊人的。例如，在1914年8—9月间俄军第一

次进攻喀尔巴阡山地区时，萨士—马雷第12团的350万人（原书如此，显系排印错误，可能是3,500人——译者）中只剩下550人。情况更惨的是克鲁日第51团，在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中它就损失了3,400名官兵。应征入伍者一批接一批地被送到部队。全部农业人口的20%左右，即几乎全部可以拿枪的男人都被赶到前线去了。

农业处于破产的境地。当局不断地征用马匹，在特兰西瓦尼亚，虽然粮食非常缺乏，播种面积还是缩小了，因为既没有人力也没有牲口农具进行耕种。各地行政机关呈报说：从三月份起，三分之一的农户的粮仓里就既没有玉米也没有小麦了。1917年，情况发展到灾难性的地步：军事当局下令没收所有不适于“供人食用的”玉米。就在这种极端伪善的所谓“关心”农民健康的借口下，把他们所有的玉米贮备都没收了。

在这种情况下，粮价上涨得简直象发酵一样快。在三年战争期间，生活费用上涨了三倍半。

工人阶级被各种动员令搞得孱弱不堪。政府为了增产前线需要的物资，采取了一切手段：禁止罢工，大大延长了劳动日，使许多企业转入战时状

态，把这些企业的人员编为工人连队。稍有反抗 150
企图，“肇事者”就立即被送到战壕里去。儿童和十六岁以下的少年大批被招募到工厂甚至煤矿里劳动。

但是，所有这些非常措施都没有达到目的，生产还是不断下降。采煤量下降得特别严重：在战争开始后的两年中，煤的产量只有战前水平的40%。在民用工业部门中，失业现象非常严重。

1916年8月，罗马尼亚军队进入了特兰西瓦尼亚。当地的居民（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友好地欢迎了罗军，为此，当罗军又被赶到喀尔巴阡山以南之后，他们受到了惩罚。250人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受到了审判，800多人被拘禁。在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交界地区，建立了所谓的文化区，这里的学校教学一律改用匈牙利语代替罗马尼亚语，只有讲授圣经除外。

罗马尼亚民族党的领导人丝毫没有对这些迫害行为表示抗议。他们仍然打算同哈布斯堡王朝进行勾结，对奥皇竭力表示忠诚，号召自己的同胞为“年老的皇上和长老”（指弗兰茨—约瑟夫）的荣誉去战斗；而东正教和天主教联合会的主教们都

虔诚地祈祷，请求上帝赐给“高尚的皇帝”以胜利。

这一政策直到罗马尼亚参加战争以后还在继续执行。民族党的代表在匈牙利议会中宣布，它充满了“保卫祖国”（反对罗马尼亚人！）的决心；而亚历山德鲁·瓦伊达—沃耶沃德则公开表示，希望战争的结局是罗马尼亚王国列入哈布斯堡王朝的版图。

民族党领导集团中的另一派采取了依靠协约国的方针。以卢卡奇神甫和诗人奥克塔维安·戈加为首的该党几个著名的活动家被派到布加勒斯特去了。他们参加了竭力鼓吹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的喧嚣一时的宣传运动。

* * *

特兰西瓦尼亚的劳动群众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斗争的。居民中最积极的一部分力量被送上了前线，警察的白色恐怖，罗马尼亚上层资产阶级推行的出卖民族的政策，最后还有奥匈帝国社会民主党许多领导者的沙文主义背叛行为，所有这一切给工人和农民运动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特兰西瓦尼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右翼领导人，公开指责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拒绝庆祝

"五·一"节。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真理报》也停刊了。

但是工人和农民的斗争仍在日益高涨地发展 151 着。1916年,一系列的罢工震动了特兰西瓦尼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日乌河谷的11,000名煤矿工人(包括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塞尔维亚人)的罢工。这次罢工从5月底到7月中旬持续了将近两个月,给军工生产带来了很大损失。地方当局宣布特别戒严,逮捕了400人,但却被迫满足了矿工们的一些基本要求。虽然罢工是在经济要求下展开的,但它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实质上是反战行动。

1917年春天,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了特兰西瓦尼亚,接着,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激烈反对战争的革命文件开始直接从东线的战壕里传来。这便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活动。1917年5月1日,特兰西瓦尼亚的各城市举行了战争开始后第一次无产阶级的游行示威,要求实现公正的不割地的和平,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5月,铁路工人举行罢工,火车停开了。同时日乌河谷的煤矿工人又掀起了新的斗争。5月29日蒂米什瓦

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战和反饥饿的游行示威。

6月，阿拉德车辆制造厂和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宣布罢工。7月，又举行了一次罢工。

社会民主党又活跃起来了。该党的罗马尼亚人分部举行了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扩大的代表会议。

7月，阿拉德举行了有许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要求缔结和约和实行普选权。同月，克鲁日工人召开的大会向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表示了热烈的同情。

在东部前线，奥匈军士兵和俄军士兵到处举行联欢，同时，开小差的情况更多了。司令部报告说，驻守在特兰西瓦尼亚边界上的士兵的纪律和战斗力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广大群众很快地便走上了革命化的道路。

第七章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罗马尼亚的革命高潮(1918—1921年)

152

1917年底到1918年初的罗马尼亚状况 罗马尼亚前线的革命事件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罗马尼亚革命斗争的高涨发生了迅速而直接的影响。1917年11—12月间，在罗马尼亚前线，在驻扎着近一百万俄国军队的摩尔多瓦，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当时罗马尼亚前线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代表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宣布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组成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即以弗·伊·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会后回到各地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开展了宣传伟大十月革命思想的工作。在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领导下粉碎了罗马尼亚前

线俄军反革命指挥部妄想派军队去支持已被推翻的临时政府的企图。士兵们要求实现列宁的和平法令，并且威胁谢尔巴乔夫将军的反革命司令部，如果它拒绝服从彼得格勒革命政府的决定，士兵们就要离开前线，各自回家。罗马尼亚前线发生的事件，促进了罗马尼亚工人和农民革命主动精神的发挥。在有俄国革命军队驻扎的摩尔多瓦的一些城市（如加拉茨、博托沙尼、特尔古—尼亚姆茨等）和乡村，许多工人、农民参加了士兵大会，听布尔什维克宣传鼓动员们的演说，阅读革命传单。由于苏维埃领土上有许多在1917年从罗马尼亚疏散到敖德萨、赫尔松、尼古拉耶夫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他们在这些地方亲眼看到和亲身参加了革命事件，并且还有10万多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和南布科维纳人——他们是奥匈军的战俘——这些因素在教育罗马尼亚劳动人民提高革命觉悟方面，也起了促进作用。所有这些条件便产生了这样的结果：1918年初已在俄国燃起的革命斗争的火焰，用列宁的话说，“蔓延到了罗马尼亚”。①

153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8页。

地主资产阶级的罗马尼亚由于战争和接踵而来的部分领土被中欧同盟军队所占领而濒于破产，这时已处于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1917年底，国内的粮食供应情况严重恶化了。从11月下半月起，城市的粮食供应量大大减少，官方正式宣布取消肉类供应，而居民每周有两天既得不到面包，也得不到玉米面。被德国人占领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饥饿威胁着各个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了妇女和儿童，他们被占领军搞的名目繁多的征用弄得贫困不堪。正当大多数居民在贫困中挣扎的时候，那些靠战争大发横财的特权阶层却穷奢极欲，因而，引起了劳动人民对他们的更加仇恨。经济状况的恶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为罗马尼亚的社会革命创造了客观前提。革命的俄国军队带到这个国家里来的无产阶级起义的种子，已经撒在了良好的土壤里。

1917年底到1918年初，在东部地区，主要在摩尔多瓦，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加强了。罗马尼亚的工农群众同俄国士兵结成联盟，要求和平，并以无视官方法纪的革命行动取消了战时各种反工人法。斗争最坚决的是1917年12月雅西铁路职

工和工人的示威游行。1917年秋天，摩尔多瓦的农民提出了分配地主土地的要求。他们拒绝为地主干活。许多被动员入伍的人都跑到革命的俄国部队里去了。在这个地区，经济斗争已经同直接反政府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了。

这时，地主资产阶级上层统治者面对着罗马尼亚很可能重演俄国事变的这种形势，非常恐惧。1917年11月，罗马尼亚内政部长写道："我们在这里就象坐在火山上一样……我担心我们都会被烧死……。"罗马尼亚反动派由于害怕革命运动，因而准备采取一切办法，直至让德军来占领全部国土。1917年11月26日（12月9日）①，罗马尼亚政府在取得协约国的同意后，在福克夏尼同德国和奥匈帝国签订了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协定。

罗马尼亚统治集团希望借助签订停战协定，154 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幻想：似乎政府将会满足他们一些最主要的政治要求，从而制止他们进一步为

① 1917年11月到1919年3月在罗马尼亚改用新历法前，新旧两种历法同时并用。

争取民主的和平而斗争。罗马尼亚反动派在签订这一停战协定时，还打算把革命的俄国部队从罗马尼亚领土上撵走，而把反革命的白军队伍和谢尔巴乔夫将军的司令部留下来，以便利用他们以后进行反苏武装干涉。罗马尼亚反动派的这种行动，既得到协约国各国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德国的怂恿。德国这时一方面极力拖延同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的关于缔结停战协定的谈判，但同时却更迅速地同地主资产阶级的罗马尼亚签订了福克夏尼停战协定，这是因为他们都有力图扼杀俄国革命的共同愿望。停战的条件对罗马尼亚本身来说也是很苛刻的。因为它规定让中欧同盟的军队继续占领罗马尼亚的很大一部分领土。

反苏武装干涉的开始和1918年1—2月间罗马尼亚劳动人民为保卫革命的俄国而斗争

1917年12月下半月，罗马尼亚政府在协约国各国政府代表的怂恿下，通过了关于同乌克兰

中央拉达[1]和谢尔巴乔夫将军组织联合行动共同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决议。于是，反动的罗马尼亚军队与谢尔巴乔夫将军的白卫军相勾结，开始解除在摩尔多瓦境内驻扎的、受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影响的俄国革命部队的武装。接着，他们又转入进攻，侵入了苏维埃比萨拉比亚境内。12月16日（29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警告罗马尼亚政府，对于侵犯比萨拉比亚的敌对行动是决不能容许的；而1917年12月31日（1918年1月13日）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会向罗马尼亚提出正式抗议照会[2]。罗马尼亚反动当局竟不顾苏维埃政府的要求和警告，于1918年1月继续在比萨拉比亚采取军事行动。这一侵略行动是在帝国主义各国的直接唆使下进行的。入侵比萨拉比亚的行动是在美国派驻雅西的罗马尼亚政府的代表直接赞同下开始的。在罗马尼亚的德国占领军总司令马肯津将军，也鼓动罗马尼亚政府去"动员和利用比萨

① 乌克兰中央拉达是乌克兰反革命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政府(1917—1919年)，曾将德奥帝国主义军队引进乌克兰境内来扑灭革命。——译者

②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66—67、79页。

拉比亚的罗马尼亚人军队”。占领比萨拉比亚实际上完全是协约国支持的：在侵犯比萨拉比亚劳动人民的革命成果时，除罗马尼亚的正规军部队外，还有罗马尼亚前线的俄国白卫军以及在基辅155组织的、由协约国和中央拉达供给物质装备的其他军队参加。后来，在1918年10月，美国官方解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众所周知的“十四点方案”时，公然把比萨拉比亚许诺给罗马尼亚反动当局了。

在比萨拉比亚和乌克兰南部地区，1917年12月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还在12月10日（23日），罗马尼亚前线、敖德萨州和黑海舰队的士兵与水兵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简称为“罗一黑一敖”）就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是俄国唯一合法的政权。12月底到1月初，在比萨拉比亚的许多城市（如基什尼奥夫、宾杰里、别尔策、霍亭、卡古尔、伊兹梅尔等）和乡村，实际上都已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然而，罗马尼亚的入侵，使比萨拉比亚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受到了威胁。

1月13日（26日），罗马尼亚反动军队占领了基什尼奥夫，当天就决定建立所谓独立的摩尔达

维亚共和国。此后，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会决定同罗马尼亚断绝外交关系。1918年1月18日(31日)，在基什尼奥夫召开了比萨拉比亚省第三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不顾罗马尼亚占领军在场的情况，一致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比萨拉比亚从革命的俄国分裂出去。大会主席共产党员B·M·鲁季耶夫被捕，并在次日被占领军当局枪杀了。

在"宣告成立"所谓"独立共和国"之后，比萨拉比亚劳动人民仍手执武器，继续为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反对罗军占领而战斗。早在1918年1月底，在蒂拉斯波就组成了革命志愿军，同占领军展开了斗争。这支队伍有好几千人。它的领导者是内战时期的著名英雄Г·И·科托夫斯基、И·Э·雅基尔等人。他们到处打击占领军。在被占领的地区展开了游击战，斗争规模越来越大，有时则发展为人民起义。这个时期，农民运动也大大增强了。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H·伊奥尔加在1918年的日记中记述比萨拉比亚事件时不得不承认："情况很严重，农民憎恨这个制度。甚至连10%的居民对我们都没有好感……。"

从反苏武装干涉一开始，那些对俄国革命热

烈同情的罗马尼亚人民的先进代表，就积极展开了反对这种干涉的斗争。1917年在许多城市（布加勒斯特、普洛耶什蒂、布勒伊拉、布泽乌等）建立起来的秘密共产主义小组，于1918年1月领导了罗马尼亚劳动人民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运动。

156 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在1918年1月印发的传单里写道："……他们想把我们派到俄国去，让我们去扼杀工人和贫农的共和国。我们不应该去。权力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有武器"。当时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土地上（如莫斯科、哈尔科夫、敖德萨和其他城市）从事活动的罗马尼亚革命小组，也积极参加了反对反苏武装干涉的斗争。1917年12月底，在敖德萨成立了罗马尼亚革命军事委员会，它领导了建立罗马尼亚士兵和水兵革命营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领导者是罗马尼亚革命的社会主义者：M·布若尔、И·迪切斯库—迪克、A·尼古劳、A·扎利克、Г·斯特罗伊契乌等人。委员会的机关报《斗争报》在1918年1月10日（23日）一期上号召说："同志们、公民们，拿起武器来！为了保卫俄国革命和比萨拉比亚共和国，为了推翻腐朽制度和罪恶的寡头政权，我们必须建立罗

马尼亚革命军!”

1918年1月中旬，停泊在俄国南部几个港口的一些罗马尼亚商船和军舰举行了起义。这些军舰和船只转归革命政权指挥，反革命的军官和指挥人员均被逮捕。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在舰上飘扬。连这些舰只的名字也改了。“图拉真皇帝”号改为“社会革命”号,“罗马尼亚”号改为“罗马尼亚共和国”号,“达契亚”号改为“1907年”号等等。这些起义舰艇的全体人员最积极地参加了肃清反革命和反对罗马尼亚占领比萨拉比亚的斗争。罗马尼亚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了这一斗争。

在德军占领地区处于秘密状态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代表,也参加了1918年1月保卫革命俄国的斗争活动。革命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发表了宣言,向劳动人民介绍俄国革命情况,并号召他们为使各国之间的战争变为“阶级之间的战争”而斗争。1918年初,被占领地区(布加勒斯特、普洛耶什蒂等地)的社会主义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是由杰出的罗马尼亚革命者阿列库·康斯坦丁内斯库领导的。1917年底到1918年初，在罗马尼亚和俄国境内活动的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组织

和小组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157



1918年在敖德萨的罗马尼亚革命营。

摩尔达维亚和罗马尼亚的革命力量在反对反苏武装干涉的顽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刚刚诞生的红军革命部队，粉碎了乌克兰中央拉达，打退了罗马尼亚占领军，对摩尔达维亚人民反对罗马尼亚占领的斗争，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援。由于反革命势力在乌克兰的失败和罗马尼亚进步力量反对侵占比萨拉比亚的积极斗争，罗马尼亚反动当局被迫接受了苏维埃政府关于从比萨拉比亚境内撤出占领军的要求。根据 1918年2月20—24日（3月5—9日）签订的俄罗协定，罗马尼亚必须

在两个月内把军队撤出比萨拉比亚，不得在被占领地区行使任何行政权力，并同意不采取“任何军事的、敌对的或其它行动”来反对苏维埃共和国①。

布加勒斯特和约的签订
（1938 年 3—5 月）

罗马尼亚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在同德国缔结和约的问题上意见不统一。他们动摇的原因，是由于在 1918 年初前线的战况还没有定局。但是罗马尼亚统治者认为，“内部的敌人”比外部的敌人更危险，由于希望巩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同时也希望德国统治集团能承认他们对比萨拉比亚的 158 占领，所以就决定接受德国帝国主义强加于罗马尼亚的苛刻的和约条件。

同时，这也是罗马尼亚资产阶级以其惯有的预见性为他们投入协约国阵营留下了一条后路。布勒蒂亚努放弃了政权。以塔凯·扬涅斯库为首

①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俄文版，第 1 卷，第 210—211 页。

的与英法资本有密切联系的一些集团的代表人物前往巴黎，以表明他们对协约国“始终不渝的忠诚”。于是，由阿维雷斯库将军主持的“无党派政府”同中欧同盟进行了谈判，并于1918年2月20日(3月5日)在布弗蒂亚城签订了预备条约。根据这个对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和约的条件，罗马尼亚同意把多瑙河以南的多布罗加地区全部领土交给保加利亚，并答应了奥匈帝国提出的关于奥匈罗边界划分的要求。罗马尼亚统治集团还同意让德国占领军留驻国内，指望借助德军力量来镇压革命运动。条约中还有一项条款，它实质上承认了罗马尼亚并吞比萨拉比亚。然而，这一点并没有妨碍罗马尼亚统治者就在同一时期〔1918年2月20日(3月5日)〕签订关于罗军从比萨拉比亚撤出的俄罗协定。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一切办法来控制住非法侵占的比萨拉比亚。1918年3月上台的保守党政府首相马尔吉洛曼宣称:“如果统一不成(指比萨拉比亚与罗马尼亚——作者)，那就进行吞并。”1918年4月在德军占领乌克兰之后，比萨拉比亚被地主资产阶级的罗马尼亚吞并了。作为交换条件，罗马尼亚

政府必须保证盟国军队经由摩尔多瓦和比萨拉比亚运往乌克兰。

1918 年 3—4 月间，在布加勒斯特讨论了对德国单独媾和的和约草案，4 月 24 日（5 月 7 日）签订了和约的最后文本。布加勒斯特和约确认了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的吞并。罗马尼亚则把拥有将近 50 万人口的领土让给了中欧同盟各国。条约规定德军对罗马尼亚大部分领土继续占领，在占领区内实行战时状态，并规定在发生特殊情况时德军可以对非占领区摩尔多瓦的铁路实行军事管制。地主资产阶级的罗马尼亚统治者在同德国签订和约时，并没有放弃与协约国各国合作的想法。他们希望把罗马尼亚变成对俄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的前哨阵地，从而使自己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不仅得到德国的支持，而且也能得到协约国，首先是法帝国主义的支持。1918 年 3 月，阿维雷斯库向法国政府作出秘密保证，要在战后为法国在罗马尼亚的投资创造优势地位。

159

布加勒斯特和约签订后罗马尼亚的经济和政治形势

罗马尼亚积极参战的时间虽然只不过一年多一点，但是，在这个时期它所遭受的损失确是异常惊人的。战争使罗马尼亚所受的物质损失，就超过310亿金列伊。罗马尼亚战前三分之二的领土被德、奥匈和保加利亚军队所占领，他们对当地居民不断地进行掠夺。

战争破坏了罗马尼亚的主要经济部门。从1919到1920年，耕地面积由1,370万公顷（1911—1915年间的平均数）减少到830万公顷（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在内）。1919—1920年期间，农产品甚至不能满足国内需要。大部分工厂都停工了。1917—1918年间，在845个工业企业中，只有200多个厂进行生产。工业生产的总水平比战前要低30—50%。1918年的石油开采量，比战前年代几乎减少了一半，采煤量也下降了，钢产量大大降低了；由于原料缺乏，纺织业几乎全部停产了。交通运输陷于瘫痪状态。战争结束后，国内

只剩下250辆能用的机车(原有1,060辆)。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由于日用必需品缺乏,物价飞涨。1918年,国内纸币的流通量比1914年增加了三倍多。1920年,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比战前减少了43%。甚至工资收入最高的一些部门的工人(如冶金工人、石油工人等),也不能维持其家庭的最低生活费用。

尽管国家已被战争弄到了破产的地步,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但是,罗马尼亚和外国的垄断组织却继续从罗马尼亚榨取巨额利润。他们肆意剥削已经变得更为便宜的劳动力,疯狂掠夺该国的民族资源。在战后经济凋蔽,以及商品奇缺而严重影响劳动人民的一般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商业和金融业中的诈骗之风和投机倒把现象达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银行和工业公司的利润大量增加。这几年,银行的年利率高达20—30%,甚至达到60%。因此,银行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多起来就不足为奇了。从1919年到1923年,银行从486家增加到了756家。

大部分工业公司的利润,以1918年同1913年相比,也增加了一倍到两倍。例如,石油垄断组

160 织“阿斯特拉罗马尼亚”公司(属英、荷资本),据显然缩小的官方统计,获得了2,400多万列伊的利润,而另一个石油垄断组织“罗马尼亚之星”(属英、法资本)获得了近2,200万列伊。罗马尼亚上层统治集团在战争年代大发横财,使得国内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了。正当罗马尼亚统治者利用人民的苦难大发横财,背着人民进行罪恶勾当以镇压国内和国际的革命运动,并左右逢源一方面与中欧同盟,同时又与协约国进行可耻的交易时,人民——工人、农民、士兵——越来越坚决地走上了罗马尼亚的政治舞台。

1918年3—10月间罗马尼亚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

1918年春季和夏季,罗马尼亚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是本国东部的一些地区,首先是摩尔多瓦;战争期间,许多工业企业都迁移到这里来了。在统治集团签订了那个对罗马尼亚极为苛刻和不利的单独和约(它使罗马尼亚统治者在人民心目中名誉扫地)之后,摩尔多瓦无产阶级的斗争特别高

涨起来。劳动人民等待并要求实现统治者在战争期间所许诺的改革。

1918年3—4月间，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首先是从摩尔多瓦的铁路员工开始的。3月16日(29日）他们举行了席卷主要铁路中心（雅西、帕希卡尼、加拉茨等）的总罢工，使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在罢工期间，摩尔多瓦总共只有三列火车的机务小组工作。罗马尼亚铁路员工的三月罢工，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性质。这次罢工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它阻碍了往被占领的比萨拉比亚运送军队和武器的工作。工人们有组织地反对那些禁止罢工的战时法令。在铁路工人三月罢工的日子里，政府被迫"屈尊"同工人进行谈判，这在罗马尼亚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首相马尔吉洛曼同劳动部长一起来到了机车修配厂直接进行谈判。结果满足了工人们的部分要求。

1918年4月2日(15日)，雅西的一些军事工厂的工人展开了罢工斗争，这里单是一个军械制造厂就有8,000—10,000工人。他们在提出许多经济要求的同时，还提出了政治要求，其中主要的是要求复员罗马尼亚军队。科梅内什蒂的煤矿工

人，也在同样的口号下展开了斗争。在三月和四月罢工斗争期间，工人们还要求恢复战时被禁止的工会组织。

1918 年雅西的“五·一”游行示威，对于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团结起了特殊的作用。工人们不顾社会民主党（该党于 1918 年 4 月在摩尔多瓦境161 内恢复了公开活动）的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劝阻，在主张国际无产阶级大团结的口号下举行了游行示威，并要求恢复工会组织。1918 年 5 月摩尔多瓦铁路工人和其他一些企业工人接连的罢工，迫使企业主和政府接受了工人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要求。1918 年 6 月，铁路工人举行了七天总罢工；这次罢工具有进攻性，终于迫使政府取消了在工厂企业中实行的军事体制。在六月罢工之后，各地便开始真正恢复了工会组织。

1918 年夏季，罗马尼亚工人进一步提出的一个最重要要求是承认八小时工作制。1918 年 7 月，雅西的印刷工人争得了八小时工作制。1918 年 8 月，铁路工人在革命的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为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再次宣布了总罢工。这一次，政府出动了军队来镇压罢工者。警察当

局逮捕了各罢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由于其他许多企业的工人声援这一罢工，迫使政府部分地满足了工人的经济要求，同时也被迫承认了他们的工会，并把劳动日缩短到9小时。由此可见，1918年的春季和夏季，摩尔多瓦工人通过顽强的罢工斗争，终于使他们提出的一些经济和政治要求得到了满足。

在被占领地区，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在更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1918年5月1日，布加勒斯特召开了各工人组织的秘密会议。会议参加者被警察跟踪探出而被逮捕了。他们在布加勒斯特广大工人经过两个月顽强的、持续的斗争之后才被释放。1918年春夏期间，在被占领地区也开始秘密地重建了工会组织。

罗马尼亚其他阶层的人民也参加了革命斗争。农民爆动越来越多。无论在摩尔多瓦还是在被占领的地区，农民几乎到处都拒绝给地主种地，而有些村庄则动手分地主的土地。在1907年爆发起义的摩尔多瓦弗列门兹村，农民以举行新的起义公开威胁地主。因此在资产阶级地主中间经常谈论要把德国占领军引到摩尔多瓦来镇压农民

骚动。1918年5月，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农民必须搞好农活，但即使用这样的法令也未能迫使农民给地主干活。农业部长于1918年7月在国会发言时被迫确认："农民只愿给自己干活。"在德国人占领的地方，农民的斗争不仅反对地主，而且也反对占领军。

162 1918年夏天，在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公务员中间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这些人因经济破产和通货膨胀而遭受的痛苦特别大。1918年7月，资产阶级报纸承认："成千上万个手工业者和小业主没有活干，这部分由于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居民急需救济。"手工业者提出了缓期纳税和延期还债等要求。1918年春夏期间，对政府来说特别危险的是，士兵中间的动乱不断增多，无论是现役军人或不久前复员的士兵以及残废军人的斗争都越来越具有组织性。士兵们要求按布加勒斯特和约所许诺的条件进行复员。

罗马尼亚劳动人民1918年春季和夏季的斗争高潮，大部分是自发的。但是，社会民主党左翼和构成左翼基础的秘密革命（共产主义的）小组，这时已越来越多地影响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在

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当德国侵占了乌克兰但还没有截断罗马尼亚和俄国中心地区的联系时，这些革命小组同在苏维埃俄国境内活动的罗马尼亚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之间，首先是同敖德萨的革命中心之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1918年春季和夏季，秘密革命小组的数量显著增多了。这些革命小组是在罗马尼亚（包括被占领地区）和摩尔多瓦的大多数大城市里建立的。秘密革命小组的积极参加者有罗马尼亚著名革命家和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阿列库·康斯坦丁内斯库、列昂特·菲利佩斯库、康斯坦丁·伊凡努什等。在他们散发的宣言和传单中，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阐明了当前的政治事件的意义。尤其是他们正确地揭露了对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布加勒斯特和约。罗马尼亚的革命社会主义者通过保加利亚和德国军队的士兵还同“斯巴达克同盟”及保加利亚的“紧密派”建立了联系。

但是，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组织水平，在1918年春季和夏季仍然落后于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形势。在德军占领时期，那些主张维护“秩序”和“法制”的社会民主党领导

中的右翼分子，实际上停止活动了。因此，当1918年4月革命浪潮高涨时，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左派的力量就越来越占优势。根据阿列库·康斯坦丁内斯库的倡议，1918年春建立了一个秘密行动委员会，有组织地领导罗马尼亚革命运动中的左派力量。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主张进行公开革命斗争的立场，遭到了党内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之一——康斯坦丁（蒂泰尔）·彼特雷斯库在1918年4月28—5月1日在163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党的秘密会议上发言时，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纲领和策略。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为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组织、反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而进行斗争的最初几天起，中派（伊利耶·莫斯科维奇、格·克里斯特斯库等人）便采取了妥协主义立场。

德国占领军撤出罗马尼亚和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　特兰西瓦尼亚并入罗马尼亚　1918年12月13(26)日事件

1918年秋天的国际形势对罗马尼亚革命斗

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10月29日(11月11日)德国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宣布投降。1918年11月,德国国内几乎同时爆发了革命,德意志帝国君主制度也垮台了。根据十一月停战协定的条件,布加勒斯特和约被废除了,德国占领军必须在十五天内撤离罗马尼亚领土。马肯津将军的部队在撤离罗马尼亚时混乱不堪。德军官兵急忙从罗马尼亚掠夺和运走了一切可能抢到和运走的东西。连马肯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我带来的是士兵,而现在带走的是强盗。"

当罗马尼亚地主资产阶级集团明白了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时,亲德的马尔吉洛曼政府立即辞职了;11月初,由科万德将军组成的所谓"超党派"政府掌握了政权,这个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国内平静"和同协约国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勾结,以便取得在罗马尼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们许诺给罗马尼亚的那些领土。为了求得西方列强在实现这一目标时给予协助,罗马尼亚统治集团准备让罗马尼亚继续充当反对俄国和中欧地区革命的反革命前哨的角色。这个反革命的角色是帝国主义各国强加给罗马尼亚的。协约国的代表在同

罗马尼亚统治者举行的谈判中，特别坚持要罗马尼亚动员军队并组织一次新的反苏武装干涉。德国占领军撤出罗马尼亚后，协约国的部队便在法国将军贝泰罗统率下进驻罗马尼亚。1918 年11月，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鼓动下，罗马尼亚占领了北布科维纳地区；而在此之前不久，北布科维纳人民议会已通过了同苏维埃乌克兰重新合并的决定。因此，苏维埃政府坚决抗议非法侵占北布科维纳。

在德国占领军已经撤离罗马尼亚中部各区及164其首都布加勒斯特，而协约国军队尚未开进罗马尼亚之际，在这两、三周的时间里，在以前德军占领区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形势。这些地区，直到国王和政府在协约国部队护送下于 11 月 18 日（12 月 1 日）回到布加勒斯特之前，实际上处于没有政权的状态。11 月中旬，体现布加勒斯特政权的只是 220 个宪兵和非武装警察。这一切就为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创造了良好条件。在这些日子里，许多企业都建立了工厂委员会、工人苏维埃和用德国占领军丢下的武器武装起来的“工人近卫队”。布加勒斯特的印刷工人对资产阶级的

出版物建立了“红色书报检查制度”。弗·伊·列宁在评论这一时期的事件时写道：“目前发生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罗马尼亚和奥匈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①

1918 年 11 月，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转为公开活动，并根据大多数革命派党员的要求，从这时起改称社会党。11 月 1 日（14 日），党的公开报纸《社会主义报》创刊号出版了。工会组织也正式恢复了。1918 年 12 月，仅布加勒斯特一地的工会会员就达到了一万人。

1918 年 11 月份，罗马尼亚的农民运动出现了新高潮。德军撤走后，几乎到处都出现了农民分地主土地和谷物的情况。他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分散的。尽管如此，对罗马尼亚统治集团来说，这一斗争仍是可怕的。由于农民革命情绪的高涨，罗马尼亚政府遵照西方帝国主义指示动员新兵入伍，以便再次组织对苏维埃俄国武装干涉的企图彻底破产了。当时被征的大部分是农民，但是，在适龄的应征者当中，到兵役站去报到的人不过 2—5%。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8 卷，第 179 页。

1918年10—11月间，在属于奥匈帝国版图的特兰西瓦尼亚，劳动群众的斗争达到十分高涨的程度。这时奥匈帝国内部已经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里，阶级斗争同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许多城市（如蒂米什瓦拉、阿拉德、锡比乌、克鲁日等）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族劳动人民提出在成立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把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合并的要求。1918年11月，蒂米什瓦拉的一位工人在表达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期望时说："我们愿意同罗马尼亚合并，但是我们还必须向它提出一个条件，以便使它跟上时165代的步伐前进并赶走贵族。那时，罗马尼亚人民将象我们现在一样成为自由的人民，并把手伸向我们，而我们定将共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大国。"1918年12月1日，由特兰西瓦尼亚各城市来到阿尔巴—尤利亚的十万多劳动人民的代表，表达了他们在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上同罗马尼亚合并的愿望。罗马尼亚民族资产阶级也提出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合并的要求。

罗马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在1918年11—12月间作了很大努力，妄图镇压特兰西瓦尼亚的革命运动，并在保存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条件下实现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的合并。1918年12月1日，主要由统治阶级的代表组成的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合并的决议。特兰西瓦尼亚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由于他们富有政治经验，便利用了劳动人民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保持了地主资产阶级制度。同君主制的罗马尼亚的合并，并没有解决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问题，也没有消除民族压迫。就在1918年12月，罗马尼亚军队便开进了特兰西瓦尼亚，伙同匈牙利反动势力镇压了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

德军撤走后罗马尼亚发生的全部事件，暴露了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矛盾的尖锐化程度，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这一时期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的主要弱点是缺乏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1918年11月，在德军撤离之后，由于国家机关陷于混乱状态，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了。但是，社会党的机会主义领袖们根本没有

认真组织劳动人民去进行革命斗争。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导和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重要活动家(如阿列库·康斯坦丁内斯库、康斯坦丁·伊凡努什、潘代勒·贝克亚努、扬库·奥尔蒂亚努、Г·瓦西列斯库—瓦西亚、Д·法比安、A·多布罗加努—盖里亚、Г·尼古列斯库—米齐尔等同志)，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和中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未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便争取将党的名称改为社会党，同时为把工人阶级团结在党的革命核心的周围而进行斗争。根据他们的倡议，1918 年 12 月，在罗马尼亚社会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了一个革命的纲领，它把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纲领称为“原则宣言”。

1918 年 11—12 月间，社会党左派直接参加了组织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工作，这一斗争越来越明显地带有政治性。11 月 17 (30) 日，布加勒斯特的罢工工人(4,000 人)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和废除君主制而进行了斗争，并且还在王室由雅西返回布加勒斯特那一天，同贝泰罗将军的法国士兵一起举行了反君主制的游行示威。1918

年11月26（12月9）日，布加勒斯特各企业的工人举行了政治罢工。他们要求出版和集会自由、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政府满足了工人们的最后一项要求。从此以后，工人们的斗争更加公开和更具有进攻性了。普拉霍瓦河谷的石油工人也加入了这一斗争。

1918年12月初上台的以扬·布勒蒂亚努为首的国家自由党政府，与英法军司令部共同制定了镇压劳动人民斗争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还专门组织了一支部队，由卡罗尔亲王和一些最反动的罗马尼亚将军指挥，准备对工人进行屠杀。

12月13（26）日，聚集在圣伊奥尼克街工会中心大楼附近的布加勒斯特工人，在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之一伊·克·弗里木的带领下，高呼着“社会主义万岁！”、“共和国万岁！”、“打倒国王！”、“打倒资产阶级！”等革命口号，进行了游行示威。这一天，布加勒斯特几乎所有的无产者都罢工了。当游行群众走到剧院广场时，早已在这里布置好的军队奉命向工人开了枪。一百多人被打死，其中有些是妇女和儿童，大约二百人受伤，五百多人被警察逮捕。被捕者当中，有罗马尼亚工人阶级

的卓越领袖之一扬·弗里木。他在狱中遭到了凶残的毒打，于1919年2月被打死。12月13日（26日）事件之后，在全国开始大规模地迫害工人阶级。警察当局封闭了许多大城市（如雅西、巴克乌、福克夏尼、罗曼等）的工人俱乐部，对很多工厂实行军事管制。

反动派的嚣张使劳动人民的斗争暂时处于低潮。

罗马尼亚反动派对革命运动的镇压，是同国际帝国主义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计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罗马尼亚统治集团暂时稳定了自己在国内的地位之后，便把本国领土提供给协约国军队和俄国白匪部队使用，他们在1919年1月又在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左岸地区转入了进攻。

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反动派也清楚，单靠镇压是遏制不住已经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的劳动人民的。因此便决定作一些个别的、引人注意的"让步"，终于着手进行某些改革，首先是实行土地改革，这是国王在1917年4月就向罗马尼亚士兵庄严许诺过的。就在剧院广场枪杀示威工人的第二天，即12月14（27）日，政府颁布了关于在本国旧

有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法令。在特兰西瓦尼亚只是到1919年9月才开始广泛实行土改。

土改法在国会里被延搁了很久，到1921年在作了很大修改和删节之后才被批准了。而实现这项改革却拖延了许多年。 167

1918年12月下半月又颁布了关于“普选权”法令的补充规定。政府同时还宣布了一项决定，将原定于1918年12月进行国会选举的日期，推迟到对它有利的时候再举行。

1918年的十二月改革是被迫的。其目的是为了把劳动人民引入迷途和分裂他们的队伍。

巴黎和会召开期间的罗马尼亚
1919—1920年间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了。罗马尼亚有两名代表——扬·布勒蒂亚努首相和科万德将军——参加了和会。罗马尼亚统治集团根据1916年与协约国缔结的秘密协议，提出了领土要求。

协约国的代表们在这个时期打算更积极地利用罗马尼亚来镇压中欧和东欧各国的革命运动，

首先是利用它来充当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和匈牙利的组织者。因此，他们极力以罗马尼亚反动军阀是否镇压邻国的革命运动为罗马尼亚实现其领土要求的直接条件。同时还使罗马尼亚明白，它的参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巴黎和会开幕前夕，法国代表就宣称："现在还不清楚，是否应该把罗马尼亚作为盟国来看待。"可见，这个帝国主义的和约是用讹诈和威胁的办法订立的。罗马尼亚反动统治者也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并利用了它。因此，在1919年春天，他们加倍狂热地镇压苏维埃俄国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1919年4月，扬·布勒蒂亚努说："这个时候在我国国境的东西两侧进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要冒很大的风险，我国的国界将根据这一斗争的结果而定。"

1919年初，罗马尼亚当局在被占领的比萨拉比亚境内加强了镇压措施。一月末，比萨拉比亚北部的农民起义（霍亭起义）被占领者镇压在血泊中。根据官方显然缩小了的统计，在霍亭起义时有七个村庄被捣毁，数千人被杀害。2月，罗法联军企图攻占苏联的蒂拉斯波城，但没有成功。1919年4月，罗马尼亚军队开始对匈牙利苏维埃

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

正当罗马尼亚反动派按照国际帝国主义的计划镇压欧洲革命运动时，成千上万的罗马尼亚人民的优秀代表，却参加了保卫邻国革命的斗争。苏俄境内的许多罗马尼亚志愿人员在恰巴耶夫（即夏伯阳——译者）师中、在东方战线的国际师中、在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和南方战线上参加作战。他们当中有卓越的罗马尼亚革命者和共产党员：И·迪克—基切斯库，他曾担任土耳克斯坦前线政治部军事委员，Г·斯特罗伊契乌，Ф·内尼赫，М·安德烈，А·图里和1919年7月在西伯利亚被白匪残酷杀害了的米哈伊·乔治乌等等。在苏维埃俄国的许多罗马尼亚共产党员，积极地参加了俄共（布）中央附设的外国共产主义小组联合会的工作，并在1919年1—3月间和从罗马尼亚来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们一起，参加了第三国际的组织工作。 168

从罗马尼亚军阀对苏维埃匈牙利发动武装干涉的第一天起，罗马尼亚的革命共产主义小组就同社会党的革命左派一起，为保卫匈牙利革命而进行斗争。他们印发了许多传单和宣言，揭露武

装干涉的组织者——以扬·布勒蒂亚努为头子的罗马尼亚统治集团——是受国际帝国主义头目威尔逊、劳合一乔治和克里孟梭的鼓励的。这个时期，各共产主义小组在准备开往匈牙利去的罗军士兵中进行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1919年春季和夏季，罗马尼亚工人组织了一系列的斗争，给武装干涉造成了困难。1919年4月，铁路员工举行总罢工，迫使反动派无法向匈牙利边界运送军队。在此以后几个月里，铁路员工又多次举行罢工并在铁路线上直接进行怠工，给罗马尼亚反动当局在调车方面造成了困难。1919年4—6月间，由于共产主义小组宣传解释工作对士兵的影响，驻扎在德日、奥拉迪亚、阿尔巴—尤利亚等城市的一些罗马尼亚部队的士兵拒绝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1919年"五·一"节时，国内所有的大城市都举行了由共产主义小组组织的政治性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如布加勒斯特有一万五千多工人参加了群众大会，在坎皮纳、雅西、加拉茨、锡比乌等城市也举行了集会）。

1919年7月21日，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工人们举行了政治总罢工，抗议罗马尼亚军队对俄

国和匈牙利进行反革命的武装干涉。7月21日前夕，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了《社会主义革命》报的一期专刊，阐述了表示各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总罢工的特殊意义。罢工那天，布加勒斯特的所有工人都停止了工作。整个城市的活动都停顿下来了。工厂都停工了，发电厂停止供电，市内交通也中断了。罗马尼亚大部分大城市的无产阶级都参加了 169 7月21日的罢工。资产阶级报纸《晨报》承认，这次罢工"规模之大是任何人都没有料到的"。

然而，罗马尼亚劳动人民还是没有阻止住罗马尼亚和国际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匈牙利的反革命武装干涉。1919年8月初，罗军开进布达佩斯，协助匈牙利的反革命势力镇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1919年秋天，协约国同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签订了圣－日耳曼和约和纳伊和约，1920年6月又同匈牙利订立了脱利亚农和约。根据这些条约，罗马尼亚得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和多布罗加（包括被罗马尼亚军阀非法占领的北布科维纳和南多布罗加）。总的说来，凡尔赛和会的结果是有利于罗马尼亚统治集团的。一方面，这是因

为帝国主义列强想把罗马尼亚更深地拖入反苏武装干涉中去，而另一方面，它们希望巩固自己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首先是希望在罗马尼亚的石油工业中取得优势地位。

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刊物，从一开始就正确地指出了凡尔赛和约的帝国主义掠夺性实质。1919年8月在敖德萨出版的《火星报》向读者报导凡尔赛和约签字的消息时强调指出，这个帝国主义和约“不仅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造成了许多深刻的矛盾，而且在战胜国阵营内部也造成了许多矛盾”。

1919—1920年间，苏维埃政府多次向罗马尼亚建议，通过有关方面直接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关于比萨拉比亚的冲突问题。但是，罗马尼亚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对苏维埃政府这一和平倡议却报之以对弗兰格尔进行援助，并允许协约国军队通过罗马尼亚领土去同弗兰格尔会师。1921年，罗马尼亚反动当局还把被打败了的彼得留拉和马赫诺匪邦隐匿在国内，同时不断在苏俄边境上进行挑衅。罗马尼亚对苏维埃俄国的破坏活动，受到西方帝国主义

强国反动集团的赞赏。因此，1920年10月，英、法、意、日四国代表签订公约，承认罗马尼亚占有比萨拉比亚。他们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鼓励罗马尼亚反动派去进行新的反苏冒险。但是，这些国家在签署了这个公约之后，却没有一个国家马上批准它，从而他们就为自己保留了进一步利用所谓比萨拉比亚问题对罗马尼亚统治者施加压力的机会。

罗马尼亚政府的对内政策和1919—1920年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高潮

170

1919—1920年间，罗马尼亚的国内政局动荡不稳。政府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1917—1922年间，任何一届政府都未能阻止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和解决对外政策上的难题。政府领导不断更迭，这一时期政府辞职和改组将近有五十次。在革命高潮的暴风雨般的年代里，罗马尼亚统治阶级为了有更大可能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企图在人民中造成一种似乎要实现"民主化"和革新地

主资产阶级政党的幻想。1919—1920年间，这类政党的数量明显地增多了。出现了许多带有蛊惑性名称的新的政治组织：如阿维雷斯库将军的人民党，它实际上是由贵族和从别的政党跑过来的反动分子组成的；农民党，该党的领导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农村资产阶级手中；劳动党等等。显然，这些新颖的"革命的"名称只不过是一种掩饰那些旧的罗马尼亚地主资产阶级政党反人民实质的幌子而已。在这个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里，地主资产阶级上层还广泛利用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1919年11月，罗马尼亚举行了战后第一次大选，这次大选是在1918年12月13（26）日革命事件之后经过多次推延才举行的。为了进行这次选举，1919年9月，罗马尼亚反动派组成了以反动的瓦伊托亚努将军为头子的所谓"将军政府"。这次选举由于将军政府事先进行了"组织"便保证了由国家自由党、国家农民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上台执政。1920年3月，由于罗马尼亚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结果，阿维雷斯库将军的政府又上台了，它在统治阶级阵营中被看成是一个"铁腕"政府。由这届政府在1920年5月

进行的选举，使阿维雷斯库的人民党得到了多数选票，因此，在选举之后他又组成了新政府，参加这个政府的有许多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反动政客（如塔凯·扬涅斯库、阿尔杰托亚努、特兰库一雅希等）。

然而，上层统治集团所玩弄的手腕，并不能阻止1919年已经开始的罗马尼亚劳动群众斗争的新高涨。这个时期的斗争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1919年4—7月间，罗马尼亚工人阶级发动了多次斗争，反对罗军对苏维埃匈牙利进行罪恶的武装干涉。派往匈牙利的一些部队的士兵，在工人们的鼓动下拒绝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1919年 171 11月3日，在战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日里，罗马尼亚的许多城市举行了总罢工，工人们在罢工中提出了政治要求。1919年12月13日，为纪念革命事件一周年，布加勒斯特和罗马尼亚其他一些城市的工人，举行了反战示威游行，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我们要学校，不要大炮！"1920年初，当罗马尼亚反动当局为了挽救邓尼金免遭彻底毁灭、而给俄国白匪以全面的援助时，罗马尼亚许多大城市的劳动人民多次发动

了政治斗争，要求停止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

在1919—1920年间的阶级搏斗过程中，工人们在提出政治要求的同时，还提出了许多经济要求。战争结束后，他们的生活状况没有任何改善。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1919年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比1915年提高了九至十四倍，而在同一时期内，名义工资却只增加了三倍。战后，由于经济崩溃和工业主要部门生产下降，使失业人数大量增加。按最保守的估计，1919年的失业人数有十万人。退伍军人和残废军人因在工厂中找不到职业也不断补充到失业大军中来。而1920—1921年出现的经济危机又使劳动人民的状况更加恶化了。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工人阶级起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在罗马尼亚的旧有地区，共发生了200多次罢工，而1920年自3月至9月就发生了267次罢工。从1919年1月到1920年10月，特兰西瓦尼亚共发生了115次罢工，尤其在1920年的下半年，这个地区的罢工斗争特别激烈。

规模最大的一些工人罢工有：日伊乌河谷煤

矿工人的总罢工，武装起来的矿工1919年1月同军队进行了搏斗；铁路员工的三月罢工，这次罢工中有许多工人被捕或连同家属一道被驱逐；还有普拉霍瓦河谷石油工人的两个月（7—8月）的罢工等。1919年3月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民斗争对革命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农民运动的浪潮席卷特兰西瓦尼亚中部的许多村庄。农民用暴力夺得了地主的地产，自己分了地主的土地、耕畜和农具。

1920年，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继续发展。1920年4—6月间，铁路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这次罢工共损失了94万个劳动日。日伊乌河谷的矿工、布加勒斯特兵工厂的工人、加拉茨的码头工人和布加勒斯特的"火山"冶金工厂、"勒莫特尔"钢铁厂、"沃尔夫"钢铁厂的工人以及国内其他一些地区和城市的工人都再次举行了罢工。布加勒斯特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发挥了先锋作用。1920年，从3月1日到10月20日在全国发生的345次罢工中，有112次是首都无产阶级发动的。罢工浪潮的迅猛高涨，是1920年10月总罢工的前奏。

172 在这样的形势下，统治阶级被迫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并作出一些让步。1919到1920年，大部分工厂企业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1920年3月，设立了“劳动与社会保障局”，而在1920年4月，罗马尼亚有史以来第一次设立了劳动部。

政府在采取这些办法的同时，也采用了镇压手段。政府由于害怕爆发革命运动的新高潮，仅在农村里就保持着35,000多名宪兵。1920年4月公布了一项法令，要把兵士派到那些举行罢工的工厂企业里去充当工贼。同年9月，颁布了一项“关于解决劳工冲突的详细规定”的反工人法，这项法令是与反动的劳动部长特兰库—雅希的臭名分不开的，它实际上取消了工人的罢工权利。

对罗马尼亚无产阶级领导者的迫害也加强了。1920年4月，政府逮捕了社会党左派的领导者之一米·格·布若尔，并判处他终身苦役。1920年7月，罗马尼亚特务机关逮捕了共产主义小组最积极的领导者之一阿列库·康斯坦丁内斯库，他在1918年12月事件之后就被缺席判处死刑。但是，在同志们的营救下，阿列库·康斯坦丁内斯库逃出来了，在此之后，他被迫流亡国外。

1920年总罢工 共产党的成立

1920年夏季,罢工浪潮此起彼伏。6月3日,在布加勒斯特的"达契亚"大厅举行了一次首都无产阶级的大会。在会上发言的布加勒斯特各工厂的代表表示,为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工人们准备进行坚决斗争。工人们在提出总罢工的口号时还表示,在必要时他们准备进行武装斗争。《社会主义报》评述这些发言时写道:"这些备受压迫的劳动者的普通语言,已经变成了愤怒的呼号:'对压迫者的挑衅,我们还要忍耐到何时呢?'因而一致的意见是:'举行总罢工和街头战斗!'"。到1920年秋,举行总罢工已成为罗马尼亚大多数工人的迫切要求了。社会党的一位领袖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写道:"那时候反对是不可能的。在工人大会上,你还来不及张嘴说话,工人们就打断你的话高呼:'我们要求总罢工!'"。促使工人阶级进行有组织斗争的直接原因是非常多的:政府夏天和秋天颁布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工人法,利用各种借口把军队派到工厂企业中去,并且越来越顽固地拒

绝履行它原来答应过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承认
173 各企业中的工人委员会的诺言，等等。在特兰西瓦尼亚工人的处境特别艰苦，这里到处实行着军事管制和警察的白色恐怖。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左翼和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康·伊凡努什、列·菲利佩斯库、Г·瓦西列斯库一瓦西亚（阿列库·康斯坦丁内斯库和米·格·布若尔当时都在狱中）支持了工人总罢工的要求。《阶级斗争》杂志在1920年10月的一期上写道："斗争将是很艰难的，因此，应该成立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共产党，并立即展开工作。"在无产阶级斗争不断高涨的压力下，根据社会党左派领导的倡议，1920年10月10日召开了社会党总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将全国各地区的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社会党的决定。在统一的社会党党章里，写入了关于必须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10月11日，在出席总委员会会议的大多数左派的坚持下，通过了关于举行总罢工的决定。机会主义首领伊里埃·莫斯科维奇等人，竭力反对这项决定，但也不得不服从多数。

由总委员会起草并向阿维雷斯库将军政府提

出的一系列条件是：要求政府承认工人组织，从工厂撤走军队，废除1920年9月颁布的关于解决劳工冲突的详细规定的法令，完全取消在全国各地（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实行的特别戒严和书报检查制度。文件指出，如果政府拒绝满足工人的要求，“就将号召全国有组织的无产者，采取总罢工的方式去夺取这些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权利和自由”。但是，阿维雷斯库首相拒绝接见代表团，以此表示他拒绝满足委员会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到10月20日，大多数工厂的工人都罢工了。

总罢工开始了。

和从前一样，站在罢工斗争最前列的是铁路工人。10月18日，政府发布了动员铁路员工的命令。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工人到营房去，许多人都躲藏起来了。于是，政府下令逮捕那些积极参加罢工的人，首先逮捕了许多从外省来的工人代表。布加勒斯特调来了许多军队，他们在大街上操练步伐，以示威吓。很多最重要的工厂和火车站都由军队守卫着。10月20日，政府报刊上登出了直言不讳的声明，扬言“任何敌对行动（指工人的罢工斗争——作者）都将招致为维护社会秩序所

必需采取的一切措施”。换句话说，就是以重演1918年12月13日事件来威胁工人。

社会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机会主义领导们，174 还在10月20日事件爆发之前，就用尽一切办法阻止和瓦解罢工。他们没有通过报刊向工人报导谈判的情况，因此直到最后时刻，工人连罢工的具体日期还不知道。在被政府派往一些最大的无产阶级中心区去的那些士兵中间，他们也没有进行应有的解释工作。机会主义首领们号召工人采取消极的斗争方式。他们在一篇宣言中说：“在罢工期间，大家都应该呆在家里，而不要举行任何游行示威，以免使挑衅者有机可乘。”以叛徒伊·莫斯科维奇为领导的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在直接出卖工人方面并不就此停步，它在刚一宣布总罢工后，立即就同内政部长克·阿尔杰托亚努进行谈判，并卑躬曲膝地央求他答应“仔细研究工人们的需求”。伊·莫斯科维奇保证，如果阿尔杰托亚努同意这一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条件，那末社会党领导就将停止罢工。

罗马尼亚无产阶级不顾机会主义者的劝阻，大多数都参加了罢工。罢工席卷了布加勒斯特

（该城约有五万人停工）、普洛耶什蒂、普拉霍瓦河谷矿区、雅西、加拉茨和日伊乌河谷等地。还有特兰西瓦尼亚的铁路员工和冶金工人，穆列什河谷伐木工人和康斯坦萨、布勒伊拉、加拉茨的港湾工人也都停工了；在被占领的比萨拉比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起来参加了斗争。罢工的总人数大约有40万人。虽然社会党和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中的机会主义者在10月28日就决定停止罢工，但罢工却一直持续到11月上旬。由于社会党领导机构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推行瓦解工人斗争的叛卖政策，结果使1920年的十月总罢工失败了。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委员会书记阿列库·康斯坦丁内斯库指出："总罢工的失败给工人运动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总罢工失败以后，罗马尼亚无产阶级又失去了在艰苦斗争中争得的很大一部分权利，尤其是先前已经实行的八小时工作制现在到处都延长了。在雅西、克鲁日、蒂米什瓦拉、克拉约瓦、布拉索夫、锡比乌和其他城市对总罢工的各地领导人进行了非法审讯。在这些城市里，这一时期大约有一万人被捕。

罗马尼亚工人阶级从1920年总罢工的经验

中得出的基本教训，就是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1920年10月之后，社会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首领们（卢普·科斯塔凯、杜纳里亚努等）便急急忙忙向政府表示他们的忠顺，在议会中宣布，他们将尽力保持“社会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与此相反，实际已转入地下状态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党左派的领导从十月事件中作出的基本结论，是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

175

十月总罢工之后，为建立罗马尼亚共产党而采取的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是1920年11月16



参加1920年总罢工的铁路工人。

日举行的共产主义小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必须建党的决定。会议参加者还声明，他们拥护第三国际的原则。会议选举了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委员会，其任务是在各地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向工人们解释了总罢工失败的原因，并说明了建立革命的共产党的必要性。大多数罗马尼亚工人听到准备建立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消息都十分高兴。1920 到 1921 年初这一时期，工人中最流行的一个口号是“拥护第三！”（指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作者）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和社会党左派的立场，在社会党代表团（A·多布罗加努、Д·法比安、E·罗兹瓦纳 176 等）于 1920 年 11 月访问了苏维埃俄国后更加坚定了。这个代表团本来是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但是，由于政府当局的阻挠，它来晚了，没能参加大会。罗马尼亚代表们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会上讨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以及摆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运动面前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特别有意义的是，罗马尼亚社会党的代表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会见。列宁在同他们的谈话

540 名，他们代表 45,000 名党员。在代表大会上，革命的多数派和中派主义少数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党的领导中以原总书记伊·莫斯科维奇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拒绝向大会作总结报告。尽管如此，党的领导中的妥协主义和改良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仍然受到了尖锐的批判。代表革命的多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有 Г·尼库列斯库一米齐尔、Д·格罗福、А·多布罗加努、Е·罗兹瓦纳、Э·卡托尔、Г·斯托伊卡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工作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运动的老前辈 Г·瓦西列斯库一瓦西亚，也是站在革命派立场上的。代表大会在对工人运动的一些原则问题进行讨论之后，于 1921 年 5 月 12 日就加入第三国际和成立罗马尼亚共产党这个根本性问题进行表决。428 名代表赞成无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谈到了新的共产主义政党——罗马尼亚共产党的诞生，她从这时起，便成了罗马尼亚工人阶级唯一的真正代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建立，是罗马尼亚工人运动中列宁主义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历史性的胜利。”

会党左派根据总委员会决议，为在工人报刊、工会和其他组织中建立优势而进行了斗争。

1921年3月3—6日召开的雅西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会议，在建立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这次代表会议表明，共产主义小组的数量增加了（1921年初，在罗马尼亚旧有领土和巴纳特地区，有50多个这样的小组在进行活动）。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内各个地区以及被占领各省（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南多布罗加）共产主义小组的统一领导的决议，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联络中心"。三月代表会议以后，社会党左派和共产主义小组领导在思想斗争方面的主要方向，就是在为党代表大会起草纲领性文件这个问题上反对中派。这一斗争在各地选举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时表现得特别尖锐，177 结果是左派在各地都取得了胜利。例如，在布加勒斯特，在总数7,652票中，就有6,818票赞成社会党左派和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

1921年5月8日，社会党代表大会开幕了。大会以压倒的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加入第三国际和成立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决议。出席大会的代表有

540 名，他们代表 45,000 名党员。在代表大会上，革命的多数派和中派主义少数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党的领导中以原总书记伊·莫斯科维奇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拒绝向大会作总结报告。尽管如此，党的领导中的妥协主义和改良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仍然受到了尖锐的批判。代表革命的多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有 Г·尼库列斯库—米齐尔、Д·格罗福、A·多布罗加努、E·罗兹瓦纳、Э·卡托尔、Г·斯托伊卡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工作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运动的老前辈 Г·瓦西列斯库—瓦西亚，也是站在革命派立场上的。代表大会在对工人运动的一些原则问题进行讨论之后，于 1921 年 5 月 12 日就加入第三国际和成立罗马尼亚共产党这个根本性问题进行表决。428 名代表赞成无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谈到了新的共产主义政党——罗马尼亚共产党的诞生，她从这时起，便成了罗马尼亚工人阶级唯一的真正代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建立，是罗马尼亚工人运动中列宁主义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历史性的胜利。”

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大会未能完成其工作。在表决关于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之后的第二天，警察就包围了代表大会开会的会场，逮捕了赞成加入第三国际的代表，把他们关进了日拉瓦和瓦卡雷什蒂监狱。过了几个月之后，对这些共产党领导者策划了所谓“270 人案件”的审判丑剧。但是，统治阶级采用白色恐怖和残酷迫害的办法并不能扼杀共产党。随着罗共的诞生，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178

第八章　资本主义暂时和局部稳定时期的罗马尼亚(1922—1928年)

罗马尼亚资本主义暂时和局部稳定的不巩固性

到1922年初,罗马尼亚地主资产阶级上层终于镇压了十月革命后的革命高潮，克服了世界大战带来的后果，国内的局势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很多原因促使国内矛盾得到暂时解决。

统治阶级之所以克服了战后的经济危机，首先是依靠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资产阶级采取种种蛊惑人心的欺骗手段和直接镇压办法，制止了战后工人阶级斗争的不断高涨之后，便对工人转入进攻。在整个二十年代里，工人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与战后年代相比，劳动时间到处都延长了。正如许多文献所证明的，在二十年代

里，大的企业当中没有一个企业遵守八小时工作制，而许多企业的劳动时间竟延长到12—16小时。劳动强度也增加了。因此，在各工厂和矿山中发生的工伤事故也增多了。例如，在石油工业中，从1923年到1929年所发生工伤事故的总数比战后年代增加了一倍。在这些年代里，垄断资本家们在没有增添什么新设备和几乎没有增加工人的情况下，就使石油产量差不多增加了两倍（即从每年1,512,000吨增加到4,282,000吨）。

1918到1921年的土地改革也促使了二十年代中期局部稳定的到来。这一改革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向罗马尼亚士兵许诺的。在战后革命运动高涨的年代里，当统治集团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来镇压逐渐增强的农民斗争和不让农民运动同工人运动联合起来时，颁布了国王关于实行土改的法令。1921年7月17日，议会通过了最后确定的土改法。实行土改的条件比较好的是直接与苏联毗邻的那些地区。例如，在被占领的比萨拉比亚，规定分给农民的土地数量就比其他地区多，这是因为在十月革命后的年代，这里曾非常炽烈地燃起过农民起义的火焰，同时也因为比

萨拉比亚的地主往往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摩尔达维亚人，他们不承认罗马尼亚政权。显然，这些情况就使得土改比较容易进行。根据土改法的规定，应予分配的土地总共有六百多万公顷。应该首先获得土地的，是退伍军人和残废军人。但是，实际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土地改革并没有消灭大地主土地占有制，也没有把土地分给农民，虽然土改法制定者曾宣布解决这些问题是土改的主要任务。土改以后，罗马尼亚还保存了大约三千个拥有500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庄园，这就足以说明土改不彻底的情况了。从地主手中收买来的大部分土地也没有落到那些最需要土地的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手里，因为赎金很高。分得土地的主要是"富裕农民"，这就促进了罗马尼亚农村中富农上层的发展和巩固。大地主由于得到农民赎买土地时付给的大量金钱而加强了自己实力，并终于促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把经济转入了资本主义轨道。因此，土改并没有使农民基本阶层的状况得到彻底改善。但是，它却促进了罗马尼亚农村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发展。

二十年代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增加了领土造成的。全国的工业潜力增长了1.3倍。大型企业的数目差不多增加了2倍。主要钢铁厂如雷希察、阿尼纳和第旦—纳德拉格—加朗钢铁公司等都集中在国内西部地区，这些工厂拥有的工人占罗马尼亚全部冶金业工人的一半以上。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的工业区的合并，使罗马尼亚的国内市场更加扩大和趋于统一，这就有助于二十年代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罗马尼亚地主资产阶级在他们非法侵占的领土——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 180 和南多布罗加等地推行的压迫政策，对实现二十年代罗马尼亚资本主义的稳定也起了特殊作用。最后，罗马尼亚在战后从西方帝国主义各国以国家贷款形式和从战败国以赔款方式得到了大量的援助，也促进了罗马尼亚二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的稳定。

所有这些因素都促进了二十年代中期罗马尼亚工业经济的发展。它的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扩大了，工业投资增加了，同时还建设了许多新企业。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集中过程大大加快了。原有的那些工业垄断组织巩固了，势力扩大

了，同时又建立了一些新的垄断组织。例如，1925年建立的“索科梅特”托拉斯组织就把各大钢铁企业联合起来了。1923—1928年间，银行数量增加了48%，其资本增加了135%。主要工业部门实行的生产集中化，使得大垄断组织增加了利润。例如，1919年借助“罗马尼亚银行”的资金而成立的石油公司——“矿业信贷公司”，后来发展成为最大的石油垄断组织之一。在成立那年，该公司的资本仅有170万列伊，而到1920年，便达到2,500万列伊，1921年为5,000万，1922年16,500万，而1923年则拥有50,275万列伊。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年代，工业和金融资本对罗马尼亚政治生活的影响也增强了。尤其是那些由国家自由党（该党在这一时期是国内最有力量的政党）的主要政客所把持的垄断组织，特别加强了自己的地位。

二十年代罗马尼亚的经济发展，尽管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但它的特点是暂时的和不巩固的。战后工业的恢复是很不平衡的，首先投资恢复的是那些对本国和外国垄断组织具有特别利益的部门。垄断资本对罗马尼亚无产阶级加强

剥削和二十年代中期经常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工人，这种情况隐藏着爆发新的阶级斗争的严重危险。对被侵占地区和领土的肆意剥削以及在这些地区加强实行民族压迫，促使这些地区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发展起来。由于土地问题未得到解决（1918—1921年的土改始终没有完成），经济发展也缓慢下来了。经济矛盾决定了国内财政状况的不稳定性。战后的通货膨胀一直继续到二十年代。所有这些情况便决定了二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稳定是不能持久的。

战后时期外国资本大量渗入地主资产阶级的罗马尼亚的工业，对于罗马尼亚的经济发展以及在它的经济中造成新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起了很大作用。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更加依附于各帝国主义强国。战后年代，帝国主义围绕着罗马尼亚而激烈争夺的主要目标是它的石油工业。据当时的罗马尼亚首相扬·布勒蒂亚努供认，还在巴黎和会期间，战胜国列强对罗马尼亚就是“用匕首对准喉咙”，坚决要求给予他们开采石油的优先权。克里孟梭要求把过去德国资本在罗马尼亚石油工业中

181

的股份转给法国垄断资本，作为罗马尼亚获得法国贷款的首要条件。而美国代表巴鲁枢则对布勒蒂亚努说，美国不容许给予其他国家以优先开采罗马尼亚石油资源的权利。巴鲁枢声明，如果不遵从这一要求，罗马尼亚就不能指望获得美国的任何援助。这一斗争的重要阶段，是签订关于分配德国过去在罗马尼亚的石油资产的圣累摩协定的时候（1920 年 4 月）。这个协定形式上把德国石油公司一半以上（51%）的股票给了罗马尼亚，其余部分由英国和法国分配。但是，圣累摩协定只是大略规定了外国资本参与罗马尼亚石油工业的比例。因此，帝国主义争夺罗马尼亚石油的斗争仍在继续加剧。至于“民族”资本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外国银行和垄断组织，那就更不用说了。后来积极参加开采罗马尼亚石油资源的大国际石油垄断组织有：英荷壳牌石油公司（通过罗马尼亚阿斯特拉公司经营），美孚石油公司（罗马尼亚之星”石油公司），英国凤凰石油公司（“罗马尼亚之星”石油美公司），比利时石油公司（协和公司）等。所以，圣累摩协定使外国资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二十年代时，在其他工业部门中依附于外国

帝国主义的情况也进一步加深了。1924年由英国的“维克斯公司”参加投资，在冶金工业中成立了后来颇为有名的雷希察钢铁公司和第旦一纳德拉格一加朗钢铁公司。1920—1925年间新建的一些冶金和飞机制造企业以及别的企业，有法国和意大利资本的大量投资。

由于国家在经济上受外国资本的奴役，结果，它在政治上也日益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

1922—1926年期间国家自由党政府的对内政策

182

二十年代中期是国家自由党的政府执政，它的历届政府首相一直是没有更换过的扬·布勒蒂亚努。1922年1月，布勒蒂亚努上台，按照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罗马尼亚已形成的法律的惯例，他解散了议会，并在1922年3月“组织了”选举，确保他的党在国会中占据绝大多数议席。在保守党分裂和它的领袖塔凯·扬涅斯库和马尔吉洛曼死去以后，国家自由党便成了罗马尼亚统治阶级的堡垒。罗马尼亚国王斐迪南也供认，国家自由党的

领袖布勒蒂亚努家族已形成为“第二王朝”。

国家自由党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针，是在于巩固地主资产阶级制度，阻止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并为了罗马尼亚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同那些掠夺本国民族资源的外国帝国主义进行勾结。

国家自由党为了掩饰它同外国资本的密切联系，为了在小资产阶级中间保持“民主主义”和“为民族理想而斗争”的幻想，又提出了“自力更生”这个蛊惑人心的号召作为它的基本口号。这个口号是企图让广大群众相信，国家自由党似乎象它在1921年11月通过的经济纲领中所说过的那样，是要保护“罗马尼亚人的劳动、主动精神和资本”的利益。而实际上，国家自由党的蛊惑人心的政策，仍然只是对罗马尼亚和外国的最大垄断资本家有利；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只不过是用来欺骗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为了保护“罗马尼亚人的主动精神”，政府于1923年11月颁布了一项决定，规定在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条件下保证国内贸易完全自由，并取消了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法令。实行这项决定对垄断资本家、商人、高利贷者

和投机商非常有利，但却沉重打击了罗马尼亚广大阶层的人民群众。1923年11—12月间还颁布了几项有利于大地主和工业资本家的法令，规定谷物和石油产品自由出口。但为了发展炼油工业使罗马尼亚和外国企业家获利，当时严格限制出口原油。

但是，国家自由党想巩固罗马尼亚地主资产阶级上层的经济力量的企图终于遭到了失败。国家自由党政府经济政策的破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实行所谓"矿藏法"（1924年）的过程中，这项法律规定将国内一些从开采地下石油资源的观点看最有价值的地区转归国有。尽管国家自由党政府发出一些蛊惑人心的诺言，这项法律却丝毫没有触动最大的国际石油垄断组织的特权地位，因为后者坚决反对这种要把力量对比变得即使是稍微有利于罗马尼亚企业家的尝试。不仅如此，在国家自由党执政的以后几年中，外国资本还得到了一些新的租让权。英荷石油公司的企业在这几年里显著扩大了，而美国的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则于1925年通过意大利资本在罗马尼亚建立了一个新的石油公司。共产党的报刊在评论国家自由

183

党二十年代中期的经济政策结果时指出："这是一个借口'自力更生'，实则是只让罗马尼亚资产阶级来剥削罗马尼亚工人阶级和我国丰富资源的政策。这项政策遭到了失败，因而资产阶级……又重新请求外国资本来剥削罗马尼亚无产阶级和掠夺我国自然资源了"。

政府在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大地主的利益。1923年底取消了出口谷物的限制，为大地主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但是关于实现在劳动人民革命斗争高涨年代所宣布的1918—1921年的土地改革问题，却被无限期地拖延下来了。1922到1926年间，政府设立的审议委员会曾多次审查了要求分配土地的人的名单。这个"审查"的结果使1921年的土改法范围更缩小了，并且被歪曲得对地主及农业资产阶级有利了。在根据1921年土改法有权获得土地的291.5万农户中，到1925年时总共只有83.6万户得到了土地。国内许多地区的农民感到等待实行土改是无望的，于是，到二十年代末便又采取了用暴力分地主土地的行动。但他们的斗争照例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土改也就这样半途而废了。到1934

年1月1日，即在土改法颁布十五年之后，在被列入名单并有权获得土地的农民中，只有64%的人得到了土地，远不是每人都分给了土地。按官方的统计资料，在三十年代，拥有10公顷到500公顷或更多土地的富农和地主，共占有全部耕地面积的52%，而他们的人数总共只占农户总数的8%。土改后，象以前一样，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仍然很显著，它们同在罗马尼亚农村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错存在着。由于土改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结果使大土地占有制通过部分转入资本主义轨道的途径而更加巩固了。同时，地主资产阶级上层以宣布实行土改为诱饵，把无产阶级方兴未艾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和运动分裂开来了。

国家自由党还竭力巩固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治地位。二十年代中期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是颁布新宪法（1923年3月）。宪法在字面上宣布了罗马尼亚所有居民，不论其种族、语言或宗教信仰如何，一律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承认民族平等和社会平等，形式上保障劳动自由和在生病时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同时还宣布了一些基本 184

的公民自由权。但是，实际上这些大吹大擂的宣言，每日每时都在遭到破坏。资产阶级的许多民主自由直接就受到宪法本身的限制。例如，宪法规定国王有权解散不合他心意的议会。1923年宪法后来又由1925年6月颁布的行政法规加以补充，后者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使地方政权更加从属于中央政府机关了。

国家自由党政府，一方面推行各种许愿和改革的拢络人心的政策；另一方面却照例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1922年1月，扬·布勒蒂亚努一上台执政，首先就对"270人案件"进行了政治审讯，迫害共产党人，加给他们的罪名是，因为他们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主张成立共产党和拥护第三国际的原则。案件是由军事法庭秘密审讯的，基本权利和政治原则完全遭到了践踏。在审讯中表明，被监禁者遭到了残酷的拷打。当人们向布勒蒂亚努首相报告说，被监禁者已宣布绝食表示抗议时，他回答说，这"感动不了他"。在"270人案件"审讯期间，当时共产党最积极的领导者之一列昂特·菲利佩斯库牺牲了，他是1922年4月13日在日拉瓦军事监狱在

所谓“企图逃跑”的罪名下被打死的。

此后，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害一直在继续进行。在以后几年中，警察当局曾多次袭击了许多工人俱乐部和共产党的报纸《社会主义报》编辑部。1924 年 1 月，政府禁止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为悼念国际无产阶级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而召开的隆重大会。1924 年 4 月初，议会通过了一项非常法，宣布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活动以及出版《社会主义报》，均属非法。同时，在国内一些大城市里实行戒严。1924 年 6 月通过了反共的“梅尔泽斯库法”，再次确定禁止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一切活动。这项法律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者要处以监禁。根据这些反共法，罗马尼亚工人阶级的许多优秀儿女被抛



帕维尔·特卡琴科——罗马尼亚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进了监狱和遭受了残酷的折磨。1926年9月，英勇的共产党员帕维尔·特卡琴科也以"企图逃跑"为名被打死。1928年11月，监狱当局把已经病得要死的康·伊凡努什"释放出狱"，但是他当月就在柏林死去了。1929年3月，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和后来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最老的活动家瓦西列斯库-瓦西亚在监狱医院中死去了。与此同时，罗马185尼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二十六岁的哈娅·利弗希茨绝食牺牲了。

从党转入地下时起，一直到1944年8月国家获得解放和开始进行人民民主革命为止，这二十年是党的历史中最艰苦的一段时期。

资本主义局部稳定时期劳动人民的斗争

罗马尼亚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特别是在它被官方禁止以后，一直受到残酷的迫害。但是，这些残酷迫害并没有搞垮这个无产阶级政党。1922年10月，在普洛耶什蒂召开了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临时党章和明确了

党的名称(在此以前称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与罗马尼亚共产党不同，它是在公开条件下活动的，但在很长时期里却一直不能把自己的队伍团结起来。1921到1922年间，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正式宣布成立所谓“罗马尼亚社会党联盟”。这个联盟一直存在到1927年，最后又恢复了社会民主党。 186

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相反，共产党从它成立的最初年代起就为争取实现工人阶级的革命统一而斗争。还在1921年它就向社会民主党联盟建议采取统一行动，但是这一努力立即被对方拒绝了。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共产党还为争取工会运动的统一而进行了斗争。在工会组织中进行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二十年代初期，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在业工人都参加了工会。工会的改良主义领导由于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于1923年9月采取了分裂行动。此后，于1923年10月底在罗共领导下又建立了统一的革命工会。

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统一工会在1924年4月被禁止。在此以后，它们的活动条件更加困难了。

尽管如此，罗马尼亚共产党为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从未停止过。1924年9月召开了罗共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党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活动和组织工作的任务。代表大会关于把党的组织机构按工厂企业为单位进行改组的决定，是争取各地采取统一行动的非常重要的步骤。代表大会分析了罗马尼亚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问题，强调指出，必须经常和具体地领导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

二十年代初期，尽管反动派加强了迫害，革命浪潮普遍低落，但工人阶级仍在继续进行斗争。1922年4月，卢佩尼煤矿爆发了罢工浪潮。这次工潮是由于煤矿设备陈旧，不予更新，因而伤亡事故不断增加所引起的。在一次爆炸事故中有120人伤亡。三天以后，就在同一矿井中因升降机断了绳索又死了12个工人。工人们的愤懑情绪如此强烈，以致使当时正准备作为“大罗马尼亚”君主而加冕的国王费迪南不得不亲自到矿区来进行安抚。1922年8月，阿拉德的阿斯特拉和马尔塔两个工厂的3,800工人举行了罢工。尽管政府当局在这里极力推行煽起民族仇恨的政策，但罗马尼亚族和匈牙利族工人却团结一致地同企业主进

行斗争。

在以后几年里，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一直处于高潮中。即使根据资产阶级显然缩小了的统计资料，在1923到1928年间就发生了1,954起劳资冲突事件，参加这些冲突事件的大约有47.5万工人，而因此损失的劳动日达120万个。1923年罗马尼亚无产阶级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斗争是穆列什河谷伐木工人的三月罢工。这次罢工有4,000人参加。共产党的报纸《社会主义报》在罢工期间为工人组织了募捐。这次罢工在工人中间影响很大，很得人心，企业主们尽管作了一切努力，却未能收买到一个工贼。最后工人们取得了胜利，增加了工资，其他一些要求也得到了满足。1923年的春季和夏季，蒂米什瓦拉、布加勒斯特、布勒伊拉、锡比乌、特尔古一穆列什和其他城市举行的罢工也都取得了胜利。农民也起来斗争了。二十年代，在洪尼多阿拉、雅西、阿尔杰什、苏恰瓦、特列奥尔曼、普拉霍瓦、多尔日、伊利福夫等县发生了一系列农民运动和斗争浪潮。农民要求分配土地，反对不断增加捐税和债务。

劳动人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斗争，是在

被罗马尼亚军阀占领的比萨拉比亚的塔塔尔布纳雷爆发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在二十年代中期罗马尼亚阶级斗争的一般水平上，留下了自己深刻的印迹。起义几乎席卷了整个比萨拉比亚南部。起义是在1924年9月15日爆发的。起义的中心是塔塔尔布纳雷村，这里的起义农民举着红旗走上街头，解除了宪兵的武装，杀死了占领军扶植起来的代理人——乡长。起义波及到阿克玛格尼特、尼古拉耶夫库、米哈伊洛夫库等村庄。起义者的口号是："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万岁！""工农苏维埃万岁！""打倒罗马尼亚寡头政权！"。对起义者实行的镇压，是比萨拉比亚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一页血的记录。为了镇压起义，罗军司令部从阿克尔曼、伊兹梅尔和博耳格勒调来军队。派到塔塔尔布纳雷去镇压起义的共有九个团的兵力，其中有两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多瑙河舰队的军舰也开去了，这些军舰先用大炮轰击沿岸村庄，然后派出陆战队进行镇压。塔塔尔布纳雷村和其他几十个村庄完全被夷为平地。几千名起义者被屠杀，他们的尸体被抛入德涅斯特河，几百名与起义有关连的农民被捕。苏联人民奋起保卫塔

塔尔布纳雷起义者。1924年10月26日，莫斯科举行了一次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抗议罗马尼亚占领者在比萨拉比亚进行血腥屠杀。1925年8月，在基什尼奥夫对塔塔尔布纳雷起义的参加者开始进行审讯。审讯消息广泛地在国外传开了。在开庭审讯那天，巴黎无产阶级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抗议对比萨拉比亚农民进行审判。受法国各界民主人士委托出席听审的昂里·巴比塞说："如果有人责难我，说我到罗马尼亚来是带有政治偏见的，我要回答他说：假如我还不是一个革命者，那末我在离开那里时一定就会成为一个革命者的。"

共产党在转入地下之后，便把主要力量用在组织劳动人民继续进行斗争的工作上，同时还竭力把公开斗争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1925年，党建立了一个合法的工人组织——工农同盟。同盟的任务是：反对警察的白色恐怖，争取大赦政治犯，实行自由选举，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土地分给农民，施行累进税制，反对用暴力强使比萨拉比亚殖民地化。在《社会主义报》被查封以后，这几年里除了在罗马尼亚秘密出版的 188

少数刊物(如《青年列宁主义者》、《阶级斗争》和其他一些刊物)外，还有1925—1928年间在巴黎出版的工人报纸《劳动者的罗马尼亚》在组织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合法活动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个报纸的积极撰稿人是二十年代初期到法国去的阿列库·康斯坦丁内斯库。

罗马尼亚共产党同时还继续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1925年8月，雷希察钢铁公司的3,000名冶金工人举行了罢工；9月，布拉德城的煤矿工人举行罢工。1926年，科林金纺织厂和布胡希纱厂的纺织工人罢工。同年，雷希察钢铁公司各联合企业的工人又举行了总罢工。然而，这几年的无产阶级罢工运动总的来说是处于守势。由于在白色恐怖不断加强的条件下，共产党不能充分组织其他工厂的工人进行声援，罢工工人不得不接受劳动部官员们在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赞同下所强加给他们的一些不利的仲裁条件。“雷希察”的总罢工失败以后，工人大批地被解雇，他们的生活境况更恶化了，他们丧失了订立集体合同等权利。为了用革命的统一工会来对抗改良主义工会领袖们的妥协政策，罗马尼亚共产党于1927年2月在

锡比乌召开了统一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这次代表大会被警察驱散了。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处境困难的这些年代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予它很大的帮助，并在1926年6月通过了关于罗共情况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决议中对罗马尼亚的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虽然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年代罗马尼亚没有直接出现革命形势，但是总的来说，摆在这个国家面前的任务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金融资本的政权，推翻君主制度等。决议肯定了罗共进行的一些实际活动，如建立工农同盟，同时指出，必须在组织上巩固党，反对党内的右倾派别活动①。

罗马尼亚资本主义暂时和局部稳定时期的终结

在二十年代后半期，罗马尼亚的政治和经济情况越来越不稳定了。列伊的行情在整个二十年 189

① 《罗马尼亚共产党历史文献，1923—1928年》（«Documente din istoria PCR. 1923—1928»），第444—460页。

代中一直不稳，而到二十年代后半期更加贬值了。在许多重要工业部门，如煤炭业、采矿业（开采铁矿石）以及在某些加工工业部门，生产也开始下降。只有石油开采和炼油厂仍在全力进行生产，为帝国主义者增加利润。随着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加深，地主资产阶级阵营内部的斗争也尖锐起来了。在统治集团中，反对国家自由党施政方针的反对派势力也逐渐增强了。这种反对派势力最明显地表现在一部分垄断资产阶级竭力要求放弃国家自由党提出的“自力更生”这一欺骗性口号，转而采取公开的、毫不掩饰的同外国资本进行合作的方针。参加反对派的有民族党和农民党的一些政客（如尤·马尼乌、亚·瓦伊达、Г·尤尼安），还有由工业资本家克·阿尔杰托亚努领导的一个政治团体，以及一些最反动的将领和军阀。反对派在它的实际活动中是把希望寄托在王位继承人卡罗尔亲王的身上，打算在他即位时取得全部国家政权。而卡罗尔自己则打算由他的亲信组成一个有势力的政治团体，建立独裁政权，以满足同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上层的利益，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

1925年底，国家自由党的领导人和接近他们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如扬·布勒蒂亚努和文蒂拉·布勒蒂亚努、巴尔布·什蒂尔贝伊等人)利用卡罗尔不在国内(他这时住在英国)的机会，借口他同艾列娜·卢佩斯库的暧昧关系败坏了声誉而废除了他的王位继承权。卡罗尔年幼的儿子米哈伊被宣布为王位继承人。同时，还由国家自由党的领袖们组成了一个摄政委员会。卡罗尔的被废黜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在建立摄政委员会问题上的失败，致使国家自由党人的地位又暂时得到了巩固。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影响却由于这些年来一贯推行反动的施政方针而完全丧失了。1926年2月，在市镇选举和县的选举中，尽管采用了恐怖手段、弄虚作假和公开收买等伎俩(在选举时发现首相的兄弟杜·布勒蒂亚努亲自向选民行贿)，执政党获得的选票却比反对党的票少一半。市镇选举对国家自由党的领袖们来说是一次警告。议会给予他们权力的期限已满，新的议会选举大有使他们遭到失败之势。

因此，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扬·布勒蒂亚努便采取了随机应变的策略。1926年3月底他的政 190

府辞职了。接近国家自由党人的阿·阿维雷斯库将军上台执政。他面临的任务是修改选举法，实行过半数选举制，按照这种选举制，凡获得40%的选票的党，就可以在议会中得到半数议员席位。在阿·阿维雷斯库和巴·什蒂尔贝伊两届政府先后执政很短一段时间之后，扬·布勒蒂亚努又重新上台执政了。布勒蒂亚努政府于1927年7月"组织"了大选，并在这次选举中获得了多数(60%以上)选票。然而，国家自由党的胜利却因下述情况而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这次选举中，尽管罗马尼亚地主资产阶级如往常一样采取了恐怖手段，但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同盟却获得了三万多张选票，而在国家自由党之后占第二位的，是1926年春天成立的国家农民党；这个党的领导人正是卡罗尔反对派的首领们。

国家农民党是由特兰西瓦尼亚民族党和旧王国的农民党合并组成的。它的领导人大部分是一些著名的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该党的首脑是最大的资本家兼地主尤·马尼乌。他所拥有的工厂企业，都通过他的代理人进行领导，这些企业的资产价值在三十年代初期共有75亿列伊。马尼乌

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而直到今天，西方一些资产阶级著作还是这样吹嘘他。然而，“爱国主义感情”丝毫没有妨碍他同外国垄断资本联系在一起，他为这些外国资本掠夺本国的民族财富提供了机会。国家农民党的另一个领袖亚·瓦伊达—沃耶沃德曾多年担任美国石油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的分公司——罗美公司理事会的理事长。三十年代末期著名的国家农民党的领袖阿尔曼·卡利内斯库是意罗银行和英罗银行的领导人之一。国家农民党也象罗马尼亚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一样，是由最大的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控制的，但它比其他政党却有优越之处，因为前农民党的一些领袖——伊·米哈拉凯、恩·卢普等人，用一些民族主义的和似乎“亲农民的”蛊惑人心的口号，把罗马尼亚广大阶层的农民欺骗到了这个新建的党里来。随着二十年代初期革命转入低潮，农民党的领袖们在1918—1919年时所卖弄的那些“激进的”言词，被他们忘掉了。但是，他们进行的那种厚颜无耻的蛊惑宣传，却长期毒害了农民意识，并妨碍了农民同先进的社会阶层，首先是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1926 年国家自由党经受的政治危机和它的不稳固状况，使得国家农民党成了它的一个劲敌。特别在 1927 年 7 月国王斐迪南死后以及 1927 年 11 月扬·布勒蒂亚努死后，国家自由党的政治地位更加动摇了。年幼的米哈伊被宣布为国王，在191他下面设置了一个摄政委员会。首相是扬的弟弟文蒂拉·布勒蒂亚努。斐迪南死后，以马尼乌为首的国家农民党人采取了直接讹诈的手段。他们以把卡罗尔亲王请回国相威胁，要求执政。为此目的，他们在自己的党员，即农民中间进行蛊惑宣传，甚至宣称，他们准备组织农民向布加勒斯特进军。马尼乌宣布 1928 年 5 月 6 日将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阿尔巴一尤利亚城召开农民群众大会。但是，这次大会的结果，恰好同它的组织者的意志相反，竟发展为罗马尼亚劳动农民显示自己力量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有些工人也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1928 年 5 月 6 日在阿尔巴一尤利亚举行的反政府的群众游行示威有二十多万农民参加，虽然政府当局曾禁止举行游行示威。这一天，国家农民党还在布加勒斯特、雅西、布勒伊拉和其他一些城市也都组织了劳动人民的规模巨大

的群众大会。

统治集团被这些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吓得惊慌不安，但他们很快就懂得了，马尼乌和他的追随者的目的不是要发动革命，而是要取得政权；并且他们是有力量的，西方垄断资本也在支持马尼乌。因此，1928年底，国家自由党被迫把政权让给了国家农民党人。1928年11月，以尤·马尼乌为首的新政府上台执政。在1928年12月举行的选举中，国家农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77.9%）的选票。以尤·马尼乌为首的国家农民党政府，是西方和罗马尼亚垄断资本的傀儡。这个政府后来执行的全部对内对外政策，同国家农民党的领袖们在上台之前所慷慨答应的那些蛊惑人心的诺言毫无相似之处。

二十年代罗马尼亚统治集团的对外政策

二十年代罗马尼亚统治集团的对外政策方针，是根据国际舞台上各种复杂和相互矛盾的力量对比以及帝国主义各国在东欧和东南欧人为制

造的经常的紧张局势确定的。由于罗马尼亚反动统治者非法侵占的许多土地(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和南多布罗加)得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赞许，因而他们在外交关系方面，完全面向西方列强，首先是面向在凡尔赛和会后力图成为欧洲霸主的帝国主义法国。在凡尔赛和会以后的若干年内，西方帝国主义在东南欧的政策是建立一道反苏的“防疫线”，而在这个勾当中，地主资产阶级的罗马 192 尼亚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在二十年代，罗马尼亚同外国签订了一系列具有露骨的反苏性质和违背本国民族利益的条约。

1921年3月3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罗波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双方在对待“东方邻国”、即在对待苏维埃俄国的关系方面，要互相协商和协调两国的政策。法国帝国主义企图利用罗波条约，以便借欧洲小国之手，实现它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新的破坏阴谋。法国代表坚持要在条约的文本中写进一系列对苏维埃国家提出的威胁性的政治要求。

罗马尼亚统治集团还最积极地参加了建立小协约国的活动。小协约国是以罗马尼亚同捷克斯

洛伐克（1921年4月23日）和同南斯拉夫（1921年6月7日）订立双边条约的形式而组成的。这三个国家以军事政治联盟方式结成为小协约国，它的矛头在二十年代与其说是针对德国和匈牙利的复仇主义，不如说是为了反对苏维埃国家和镇压东欧的革命运动。小协约国把保障各缔约国的“国内和平”作为它的一项政治任务，这绝不是偶然的。缔结双边条约和结成帝国主义的地区性集团，都是同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民族利益背道而驰的，因为这将促使它们更进一步依附帝国主义大国，首先是依附于法国。尽管如此，罗马尼亚反动统治集团却顽固地沿着这条路线继续滑行。

罗马尼亚是苏联邻国中唯一拒绝参加1922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裁军会议的国家（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芬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波兰的代表）。罗马尼亚政府还拒绝批准根据苏联政府的坚决要求而签订的关于防止和解决在德涅斯特河上发生冲突的办法与措施的协定。1923年12月，罗马尼亚统治集团破坏了两国关于建立贸易关系的谈判。苏联政府坚持主张合理解决苏罗

领土冲突，多次建议在被罗马尼亚军阀占领的比萨拉比亚进行全民投票，并终于争取到了于1924年3月在维也纳召开苏罗会议。苏联政府在向会议提出的声明中指出，苏联政府关于比萨拉比亚问题的立场，首先是基于比萨拉比亚的大多数居民都感到自己隶属于地主资产阶级的罗马尼亚是
193 深受痛苦的这一情况而确定的①。但是，罗马尼亚统治集团拒绝了苏联政府的一切合理建议，并破坏了会议。在这个时期，帝国主义法国的阴影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背后。正是在苏罗会谈期间，法国议会批准了关于承认罗马尼亚非法侵占比萨拉比亚的1920年巴黎协定，这一行动绝不是偶然的。在以后一些年里，罗马尼亚反动统治集团仍继续推行反苏的对外方针。当1925年苏联同日本的外交关系正常化以后，罗马尼亚便成了苏联邻国中唯一没有同它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在二十年代后半期，罗马尼亚和其他巴尔干国家一样，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各国激烈对抗的舞台：一方面，法国竭力想在东南欧称霸，另一方面，

①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莫斯科1944年版，第2卷，第854—856页。

意大利和英国又力图把法国从这个地区排挤出去。意大利为了促使罗马尼亚脱离小协约国并使它摆脱法国的影响，于1926年5月同罗马尼亚签订了“友好和真诚合作”条约。往后不久，意大利也承认了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的侵占。法国在东南欧的影响之所以不断地下降，还由于二十年代末期已经恢复了力量的德国对这一地区的国家（包括对罗马尼亚）的经济渗透的加强。1926年9月，德国国会议员——工业家代表团访问了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统治集团渴望从德国获得贷款，以稳定列伊的不断贬值，因此它对德罗亲近的尝试非常重视和欢迎。

不但罗马尼亚统治集团，而且小协约国其他成员国也采取了这种两边讨好的政策，这就使法国在东南欧的联盟体系有瓦解的危险。法国为了巩固它在罗马尼亚的影响，便于1926年6月签订了法罗条约；这项条约再次承认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的非法占领，具有明显的反苏性质。苏联政府在正式照会中评述这一条约时指出，这项条约“使得在遵重民族自决权利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比萨拉比亚问题的可能性减少了，同时却加强了

对东欧和平的威胁”①。

罗马尼亚统治集团也是疯狂鼓吹战争歇斯底里的积极参加者。从1926到1931年，罗马尼亚的军费预算增加了一倍，达到了102亿列伊的惊人数额。军费开支的沉重负担完全落在劳动人民的肩上，而给帝国主义上层集团带来了新的利润。乌云又重新笼罩在巴尔干的地平线上了。

① 引自《外交史》(«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莫斯科1945年版，第3卷，第364页。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罗马尼亚近现代史　　（上册）
作者=（苏）弗·恩·维诺格拉多夫
页数=384
SS号=10532395
出版日期=1974年12月第1版